

大逆转¹

——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

威廉·韩丁

目 录

前言	3
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	5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6
进一步，退两步	7
责骂的典范	10
精明而可怕的特色	11
天安门事件之后	12
中国的一个小城镇：1978 年的张庄	13
凤阳之行 1983	19
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村的变化 1984	30
倒退到 60 年代？	30
鼓励分工	31
经济成果	31
资源的破坏	32
雇佣劳动	32
可怕的风俗	33
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	33
草原现状	35
聚焦过度放牧	35
改变管理制度	36
改变价格体制	37
通常的一些误解	38
减少汉族移民	39
解读改革：1986 年农村的变化	40
贸易问题	40
农民减负	41
一个仍然正常运行的集体经济	42
合作化的成功	43
草原上的两极分化	44
荒野山地，未开发的草地	45
改革所绕过的：农业机械化 1986	47
失业问题	48
比例和范围的问题	49

¹ 又名《大回潮》，1990 年纽约《每月评论》出版。

应当具备的多样性和弹性 50

适当的社会组织 51

政府支持的形式 51

重访大寨：1987 年53

 充满偏见的比较 53

 下滑的农业 55

 待拯救的煤矿 56

 诽谤的背后 57

 过去和现在，充满讽刺意味的教训..... 58

毛泽东农村政策再思60

 粮食战线 60

 剪刀差 61

 命令主义（COMMANDISM） 62

 私有化风潮 63

 形“左”实右 65

 文化革命 66

 可疑的政策主张 67

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69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 69

 饭碗：金的，铁的，瓷的 70

 小土地的保障 72

天安门屠杀：1989 年的 6 月74

 广播哑了 75

 夜里开火 75

 午后的死亡 76

 给人民一次教训 77

 对强权说真理 77

 被糟蹋的统治权 78

 广大的进步联盟 79

前言

大
回
湖

前言

1989 年的“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改革”时代的独一无二了：向天安门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它像一道闪电照亮夜空，揭示出中国当前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

早在 1989 年 6 月之前，“改革”的本质已被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所洞察。然而，西方的传媒和学术界却几乎都被改革的花言巧语和市场的“蓬勃发展”所催眠，以致看不见事实在自己眼前展开的真相。概因私有化合于他们的偏见，而改革带来的消费的繁荣又证实了其正确性，所以他们不再细致观察分析潜在的趋势：经济混乱、基础败坏、环境恶化、社会瓦解、文化萎靡，以及不断上升的可能撕裂中国社会的阶级对抗。

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20 多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指出邓小平、杨尚昆、和他们的“铁杆”同伙是走资派。他准确的预见到，如果这样的人上台，他们就会把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

令人惊讶的不是毛的预言何等准确，而是这预言的应验何等迅速！邓把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开始“改革”不过是在十一年前。大的变动，例如在农村全面实行分田单干，允许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雇工剥削，仅仅是在五年前。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无法预料的苦痛却使得中国人民疏远了邓，特别是最受改革“恩惠”的城市居民，在 89 年的五、六月间，全国各地的示威者占据了大街小巷。

邓以枪炮和坦克做出了回应，给劫难后长安街留下数以千计的死伤者。凶残的军事镇压宣告邓在道义上的破产，随后在全国展开的政治犯大搜捕更明确无误的揭示出改革究竟是什么颜色、从来是什么颜色。

不要犯糊涂了。北京的头头脑脑们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不再是革命的策划者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是新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忙于将经济划归于巨大的家族采邑，做好准备按照买办的模式把中国完完全全卖给出价最高者。在广场的屠杀并非什么过失，不过表明他们窃据领导位置以来所推行的路线达到了一个顶点。他们着手拆除解放后中国人民耗费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和习俗。他们这样做却使得他们站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邓是怎样从一个倍受尊崇的英雄、与“万恶”的四人帮做不屈的斗争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腐烂堕落的独裁者和一个满身血污的刽子手的呢？

部分答案可以从席卷中国的改革中找到。我的这些文章，把从农村解散农业合作化开始的改革历程编年记录并加以分析。这本文集将作为有力的案例，对资本主义道路能发展中国做出质疑，并提出这样的疑问：改革的领导者们，在选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是否已经蜕变了一小撮官僚资本家如同解放前从政治和经济上操控着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四大家族”一样。

6 月 3 号和 4 号发生的一切，指向这样一个结论，邓和他的同伙们已经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家集团。他们通过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贸易的开放政策，使得官僚们可以控制经济命脉，并形成了与大的跨国集团分享利润的买办性质的伙伴关系。这就足以解释，为何当学生们提出要求要平等对话、自由言论、真相报道和官员财产公开时，邓断然拒绝毫不让步。在天安门，最重要的并非革命的未来，而是统治集团的信誉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任何泄漏高层不择手段的统治秘密的行为都对邓和他的“四人帮”意味着“红色警戒”。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邓在 1960 年代早期所说的。正是这句话使他得以闻名。

到了 80 年代，人们观察到这个大人物的社会实践之后，对他的名言做出了适当的修改：“白猫黑猫，抓不住老鼠不要紧，只要没被抓住就是好猫。”

当中国的学生和市民对“猫”的所作所为追究不放时，情况发生了逆转。不顾可能带来的后果，他给予了回击。

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

简介： 中国的农村改革

1988 年是所谓中国“改革”²的第 10 个年头。因为改革家们最先在农村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农村的改变是彻底而深远的。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短期后果已经充分显现，而且长期的趋势也日益明确。一开始，中国和西方对农村改革是赞不绝口的，尤其是从粮食的增产上来看。但最近的资料却显示已经有一些忧虑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了。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关于农业的当年投入和长期投资都下降了。农业的基础设施已被破坏，环境在严酷的冲击下日益恶化。国内，从上到下，自夸开始被痛苦的重新审视所取代。

每个人都在猜测中国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但从频繁和迫切的要求公众耐心，理解和稳定来看，这冲击无疑是深刻的。连篇累牍的各色文章，要求读者理解中国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变革：前景美好但需要付出辛劳和牺牲，困难和反复难免而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文章的作者没有丝毫的悔悟，也没有任何的提示现在走上的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不断尖锐的矛盾，持续上升的代价被一句“一切都是过渡性的”所勾销，所有的麻烦都能够而且终将即使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均衡态特性”借用一下政治学家 John Elster 的话，它们并非新政策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后果，仅仅是凯歌高奏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泛起的短暂的涟漪。这样，当问题不断涌现时，出现的是要求改革全面深化的呼声。问题并非来自“太多，太快”，而是“太少，太慢”。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必须缓解，需要一段强制时间来调整，但那仅仅是生产和流通领域向私有化全面进发的征程中的一小步后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批的中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大小官员都忙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都忙于重新发明“车轮”——“自由市场”的伟大奥秘。对他们而言，从 1840 年以来，中国所接受的深刻和苦痛的教训都烟消云散，无需理会。海外媒体的博学家们也都毫无例外的同声附和，并敦促他们以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迈出新的步伐。

有人也许期待着国内外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反应，但自从邓上台并从 1978 年开始推行改革之后，五湖四海，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批评。许多中国人，也确实质疑过甚至抗议过，激起了持续的挑战和争议，但冲突并没有表面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控制在改革支持者手中，无论是国有的、国家资助的乃至私人的。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缺少来自海外的批评声音。

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又遇到了与 50 年代相似的境况，不过是以倒像出现的：那时我在参加到中国革命七年之后回到了美国。那时我是屈指可数的少数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实践公开辩护的人之一。这些年来思潮慢慢发生了变化。各处的青年学者发出了越来越多的赞同中国革命的声音。到了 1972 年，甚至是尼克松这样的死硬分子也转过来了，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亲自到北京访问并承认毛的政权的合法性。从此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直到 1978 年。当邓上台并掉转方向时，他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专家们很快中国的声明中从得出结论，新的过程表明改革是“资本主义式”的。

当邓的政策得到普遍的赞誉时，我发现我自己又退回到“光荣的孤立”之中了。在我看来，中国正在走上一条与前三十年不同的、可能是多灾多难的道路，我成了这一切的一个孤独的批评者。如果不是完全孤立的话。

我也并非一夜之间就从拥护者变为了批评者。作为在海外的新中国的老朋友，我当然可以自由的

² “改革”这个词用以指代中国当局推行的这些（事实上是反动的）措施已被广泛接受，我也接受这一用法，此后对此也不加引号。但是从我的分析中可以明确无误的看出，这并非改革，这些新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复辟。

表达我的见解。不过改革开始时，我有意避免草草做出结论。我决定以极大的耐心来等待和观察这个新时期。当然，我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 1980 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会被邓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东北民谣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这一过程。除了一年外，从 1978 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 5 到 6 个月时间在中国。从 1980 年开始，为期五年，我作为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的顾问呆在离北京东北约 600 英里的内蒙古 chao 区，翁牛特旗³。在那里，我们寻求草原沙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长治市的张庄，在那里我帮助农民们发起了空前的全面机械化的实验。

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 - 集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

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 4 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民个人。到 1984 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 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 200 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 12 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 15 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这两个实验的失败使我震惊。并不是我没有付诸努力，为了这两个项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劳，我知道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们的成功对中国的为了是多么重要啊！但是，这两个实验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国营 - 集体合资的牧场是非常少见的，而看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机械化的农庄。不能因为两个流产的实验就怪罪改革，但显然可以归罪于当地的官员们教条的不假思索的推行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 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 3 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

³ 位于赤峰县境内。

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有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长远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进 一 步 ， 退 两 步

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

——山西农村关于实用主义的民谣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同往市场之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从图表上看是这样（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的利用产量数据，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他特产，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1984年，政府宣布并庆贺粮食产量有了历史性的增长——粮食总产达4万吨。因为大量商品粮出现，在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降到接近国家供应粮的结构。改革带来的丰收给了多少人幸福和快乐啊。有关部门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贸易商们甚至开始商谈饲料粮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看起来确实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新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

救中国，“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的支持——而同时“辩证”的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含义。（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定义降低为，1）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2）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8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通过一切的方式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 Archie Wright 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这一点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谈到。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党组织内部的堕落同社会风气的倒退一样严重。一旦党叫农民开始自己致富，党员怎么能不带头呢？否则，就没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国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效）。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的规定也无法执行。

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邓集团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 50 年代初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工业、运输和贸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来自私营部门。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通过将国有企业承包给经理，政府也在为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虑到已经全面完成私有化的农业，结论就再清晰不过了：1）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按自由企业的方式运作了；2）除农场外的农村，实质上将很快实现私有化；3）通过承包和向管理层的让步政策，公有经济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这些看起来是难以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从 1985 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 1985 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 3 千万吨。从其它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是下降了接近 5 千万吨。最后他们达成共识，粮食产量下降了 2 千 5 百万吨，数据如何得来却已无从考证。因为全年天气并不太糟，减产没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权威人士将其归结为价格波动，84 年的大丰收使得国有粮仓囤满了粮食从而导致国家承诺的粮价下降。

现在可以看到，问题并非来自于 85 年的粮食产量，倒是 84 年的粮食产量有问题。84 年的收成并没有打破记录，仅仅是个普通的年成。增产的粮食中，其实大部分来自集体的粮仓。合作社解散分产后，农民们将分得的粮食卖到了市场上。而且，因为害怕家庭责任制带来粮食减产，国家同时也从国外进口了数百万吨的粮食，这样造成了市场上粮食的“涌流”和粮价的下降。“那个冬天我们吃的都是加拿大的小麦。”一位北京居民告诉我。

实际上 1984 年的粮食总产量并没有 40500 万吨，因此他们此后也无法再重复这一创纪录的“大丰收”。改革家们脍炙人口的胜利不过是个幻影。持续粮食短缺的忧虑使得人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1985 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年与日本贸易中入超达 150 亿美元，大量进口也挤跨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

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如城市高层住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的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度被取消后无法无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

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

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 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 10 月，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学生游行，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

从此，中国内部的混乱持续上升。虽然重新主张中央加强控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贸易的不平衡，但非生产性的资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新高，1988 年末一度出现了挤兑的狂潮。其它问题也每况愈下，诸如不断增高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传染病发病率，环境的急剧恶化，还有粮食的减产等等。1988 年，粮食据报道减产 9 百万吨而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此归结为受天气的影响。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粮食配给份额接受部分粗粮。农民杀光了鸡、猪乃至奶牛，因为没有足够的粗粮作为饲料。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以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责骂的典范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骗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山西农村民谣

本书中收集了我的一些文章，都是针对从 1978 开始的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改革的。十多年来，这些感觉和想法日臻成熟。

我决定本书从张庄的故事开始。故事发生在 1979 年，在中共中央开始确立伟大的“改革”（实质是大回潮）几个月之后。这个故事对这本揭批“改革”的书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描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农庄，按照毛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在中央提出的五业之外，张庄又加上了颇为成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

张庄的故事，在 1982 年 12 月开始执行改革前，很好的阐明了农民们是怎样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建设一个先进的公社的。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决不会分田单干或是把集体工业承包出去。他们不得不屈从于上级的压力。从此，张庄也同整个地区一样经历了改革带来的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增长，虽然一些方面变好了，另一些方面却越来越糟，尤其是土地问题。改革七年过去了，却很难估量现在的情形，是否会比一直保持集体化好。

“凤阳之旅”写于 1983 年，应当时的副总理万里之邀访问了安徽省之后。在那里我看到了改革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最好的一面，但我也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和“零散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端出现了“先富”的私营企业主，一端则是廉价的雇佣工人。

从那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改革给农村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增长。我试图用两篇文章来总结这些“新问题”，一篇最初是演说，一篇是一封长信，在本书中的标题分别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解读改革”。第一篇提出了这条道路是否通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篇则质疑改革家们是否有能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增长——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尤其是他们能否在美欧日资本主导的世界上建立一个富强、独立、自主的中国。

另外两篇文章写于 1980 年代中期，即“草原现状”和“农业机械化问题”，探讨自主发展的技术性问题。它们并未直接质疑改革的政策，但也揭示了改革给资源保护和农业机械化带来的严重阻碍。

“再访大寨”写于 1987 年秋，为了回应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毛领导的农村集体化道路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夸大并丑化公社的发展，因为在 1983 年它们就不再按集体化方式运作了。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媒体一贯的歪曲大寨，一方面蔑视集体化时代取得的任何成就另一方面却醉心于改革的成果，无视两者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在 1987 年根据官方报道的数据，大寨人甚至不能收获足够的口粮。

对大寨的攻击其实就是对毛的攻击。因为农业学大寨是毛的农业政策的核心之一，这些无端的谴责不过是全面背离毛的政策的一部分罢了。这个结论，Herb 和 Ruth Gamberg 发表在每月评论 1988 年 9 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给予了支持，也引发了二战曾作为中国通讯记者并担任中美友好协会领导的休·迪恩（Hugh Deane）的回应。他承认大寨遭到了错误的诽谤，尽管如此，毛时代的农业政策的失败却大于其成功，有些失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宣称大跃进后的饥荒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并罗织、控诉毛的罪状——他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可以当作改革集团全面否定毛以及毛的政策、毛的功绩的一个样本。“毛泽东的农村政策反思”原本是为毛辩护的，也驳斥休·迪恩对毛在解放后中国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偏见。在“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我尝试总结和更新毛提出的命题，资本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的可行之路。

精明而可怕的特色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1989 年北京的顺口溜

回顾迄今为止的十年，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在十年前不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属于改革家们惯用的手段。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他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为名大规模的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变。

邓首先用这套渐进的办法实现了农业的私有化，然后又用同样的手法解决了私人雇工剥削的合法化问题。禁止一切私人雇工的政策被修改为允许“个体”企业雇用 8 名以下的工人，后来又放松为批准私营企业雇用成百上千的工人。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从禁止剥削转变到全面允许剥削。最高领导们为私营企业正名，称其为新近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经济成分。到 1988 年底达到的目标是，私人所有已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30%，而职业经理人也通过承包逐渐占据着残留的国有部门。与此同时，国家计划在工业领域将其所持有的国有资产以股票的形式出让给工厂职工、个人经营的国有单位以及私营企业。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们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声称的那样——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可以看到的第二个特色，是改革又给中国带来了似曾相识的一幕：上层腐败糜烂，特权飞涨，而严峻的通货膨胀使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的处境日艰，难以为继；就像 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初的曾经苦难的重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革命瓦解了，早于共产党获取政权另一个革命党——国民党蜕变了。

共产党在 49 年革命胜利后有效的压制了腐败，但从来没有根除过。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的复苏。腐败的大跃进始于 1985 年，那一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这种形式，正如被流放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⁴所说的，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高级官员通过官倒投机得以“先富”，同时大量的高干子女也投身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尤其

⁴ 1. 方励之，“中国的困境与中国的希望”，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 1989, pp.3-4.

是是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业务（法律禁止官员做生意）。这两者合在一起，表明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就像解放前统治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样）正在日趋成熟。

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其中有被流放的记者刘宾雁⁵。“很多中国人担心，”刘这样写到，“在中国大陆又将出现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的买办集团。这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既然中国事实上已经对世界敞开了大门，那么国际资本与国内腐败官僚相勾结，是否将像刘宾雁预计的那样产生一个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威胁到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呢？一旦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后果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

毛主席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

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山西东南部顺口溜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根据我关于中国前民主运动的一次公众演讲修改而成的。其中特别强调了广大的北京市民挺身而出、阻拦军队进城驱散学生。这样历史上罕见的势不可挡的群众参与，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全国各地上演（无论是在北京的大屠杀之前还是其后），反映出群众对国家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改革后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抗议。

无论是遍及全国的广泛的抗议还是邓对其血腥的镇压，都表明邓的实用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危机。人民不能接受邓刮起的私有化风潮导致的结果；而邓及其党羽也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民主的妥协，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会限制他们为所欲为主宰中国的权力。结局是愤愤不平的群众和一小撮失去了任何统治的合理性独裁者之间的僵持对峙。大量的共产党员，政府官员，军人现在都和要求变革的人们站到了一起。但是没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那些引发抗议怒潮的学生）站出来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解释究竟是什么地方错了，或是提出一个扭转局面的可行的政策。即使被资本主义道路带来的结果所震惊，很多人仍然无法把现实和产生它们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联系起来。

但是，天安门的大屠杀迫使每一个人去分析和重新评价我们近十年的历史。作为对自封的改革家们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的回应，仅仅要求民主、自由和进一步改革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反抗和揭露假社会主义者们掩饰资本主义道路的花言巧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赞同复兴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变革，并为持久的斗争做好准备。

⁵ 2. 刘宾雁，政治与经济的关系，The Alexander Epstein Memori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ctober 20, 1988, p. 5.

中国的一个小城镇：1978 年的张庄⁶

中国的一个小 大回湖 城镇：1978 年的张庄

三十年前，在张庄听到的是乡村的声音：拂晓前黑暗中公鸡的啼叫，手推碾磨滚过石床时吱吱的响声，村长在没收来的天主教堂塔楼里通过扩音器开会的嘶哑的声音。至今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的最响亮的，是负重的大车驶过冬天路上冻结的车辙时，笨重的木制车轮和横梁对撞的声音，从远处听好像是不知疲倦的阴间鼓手的声音。

今天，火车站上驶过的蒸汽机车发出尖锐的叫声，似乎要用自己的怪诞噪音跟 Great Ridge Hill 侧的试验场上军用坦克咆哮着碾过的背景音较量一番，这一切驱除了原来笼罩在张庄上的乡土旧调。还有高速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和吉普喇叭等的杂音，因为受阻的司机想穿过手推车、驴车、大货车、自行车和步行者流前进。

在村子里面，相对低些的背景音，是生产队的水泥厂里巨大的研磨机发出的声响，夹杂着旧时作为会议室的长棚底下传来的砂轮研磨钢铁撕破空气的尖厉叫声。年轻的女人们按点轮班抛光锯齿，这些锯齿将出口坦桑尼亚。

教堂塔楼很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毁了。队里的领导在他们办公的地方的屋顶上装了一个扩音器，在很远的地里都能听见他们的巨响。多年来，他们依赖喇叭广播来管理在 1958 年创建完备的生产队。喇叭早晨起来叫人们起床，中午召集人们从地里回来，晚上通知一天的工作完毕。但是多年来播放的歌曲不是东方红，一曲对领导人毛泽东的赞歌，而是用双簧喇叭和几把中国的蛇皮小提琴演奏的活泼的山西民歌调子。村子里面，被放大的干扰让耳膜发痛。在半英里外的一队的菜园子里，声音活象侏儒、妖精、木精和狐狸精的婚礼舞曲。

1979 年，个人收入基本和付出成正比，物质奖励成了努力工作的动机。同时，扩音器的规劝和命令已经不起作用。村子里面又恢复了拂晓的鸡鸣声和小巷里面步行者的叫卖声，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到处是铁路换车场机动车的噪音。

和以前一样，人们可以从 Great Ridge 山顶上俯视，像在地图上一样看到张庄在平原上延伸。村子里两极分化相当明显，穷苦农民和雇佣劳动者的坯房，屋顶上是泥和稻草，而老板和富农则是砖房，屋顶上是瓦片，对比鲜明。富裕家庭利用整个庭院，而穷苦农民只能在他们能找到的有墙的地方铺床睡。这是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前的状况，土地改革 1945 年在山西进行，1950 年遍及中国北部。

今天从山上看到的是一片绿意。1954 年土地集中运动导致了合作化，同时特派工作队开始植树，种了 250000 多棵。居住环境大变，以前土地荒凉、干裂、半荒废，现在则凉爽、荫凉的像公园：错落有致的院子、街道和可以提供保护以抵抗各种极端情况的小路。

新种植的绿意之下，中国北方农村普通砖的生机勃勃的棕褐色是主导的颜色。张庄不是这样，1971 年村领导听说外国客人要来，动员大家把街道两边的墙壁粉成白色，耀眼的白色成了主导。在这种背景下红色的标语像三维模型铸出的一样醒目。粉白色很明显赢得了村民的欢迎，因为他们一直保留至今。

1971 年张庄实施了另一项改进。所有沿街修筑的厕所——出于积肥的考虑——都被拆除了。现在厕所都搬到了院子里，自从队里水泥厂建成后，深水池盖上了水泥板防蝇，至少可以防下面的蝇蛆。后者要求更多的空气使水泥板下空气流通，甚至比有缝的的水泥板所需的还要多。这项改进曾使张庄赢得了良好公众卫生的表彰。水泥板的确改善了公共卫生，部分是因为那种得奖之后充满每个人的喜

⁶ 本文首次刊登在 Geo 杂志上，1980 年 8 月，经允许再版。

悦，尽管这也无法完全去除整个中国乡村特有的那种粪便味道。

赫赫有名的大寨大队，位于太行山顶上，人们说：

崇山峻岭石满坡，出门上山复下山。

张庄流行的韵律强调的自然特点和它相反：

平地上，好灌溉；迈出门，看五里。

但是，大寨农民每英亩可以收 100 蒲式耳，而多年来，张庄农民甚至都不到 30。尽管毛说“灌溉是农业的生命线。”张庄的农民没能利用他们充足的水资源。每年冬天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张庄人种好地以灌溉，但是到了春天发现没有什么进展。政府对这个行动迟缓的公社失去了耐性，称之为“老大难地方”。

行动迟缓的真正原因在于土地。农民浇的越多，土地越难弄。水带来了盐而不能把它冲走。太阳把水蒸发了，土地裂成块，扯开了植物的根。人们用脚投票反对灌溉，对丰收不抱希望，并将注意力转到副业上，在邻近的工厂签合同工作，甚至做投机买卖。

一个名声不好的投机倒把的例子是李宏昌 (Li Hongchang)，一个单身汉开着货车到湖南，在那里他用干甜土豆等重量的换小麦运回张庄，然后以两倍的购价卖出。到湖南往返四天挣的钱比在地里干一个月活挣的都多。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 1/3 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锯片厂。队里得到了相当于三年土地收入的现金补偿，可是锯片厂毁了一个灌溉工程，这个工程花费了农民成千上万的劳动日。这些劳动没有被补偿。

太行锯片厂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从滨海城市天津搬过来的。在 1977 年，村里面的知识青年有 90 多个——男女比例是一比一，因为政府停止了向农村中迁移城市居民，结果到了 1979 年只剩下很少了。他们中的多数都是“锯片”人——他们这么称呼它。他们自认为是大城市天津人，尽管他们长大的地方离张庄只有几百码。他们对村子的影响很深很广。他们中有学过科学的，音乐家，演员，舞蹈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他们画了巨幅的壁画，使张庄的墙很活泼。他们在八一建军节时做讽刺画嘲笑四人帮。他们组建了近半的研究组，帮着张庄逐渐克服土地的碱度。

在过去几十年里外界影响改变着张庄的社会生活，带着天津特色的知青们只是这外部影响的一个方面。在公路和铁路之间，又很多芦苇和坯搭建的临时住房和成千上万的临时居民，他们是修建东西铁路及其附属的工人。他们匆忙搭建的帐篷充满了张庄，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伙外来人，来自吉林的少数民族朝鲜人，来自抚顺 (Fuxun) 的采煤工人和开滦 (Kailan) 的技工。他们大都在非洲铁路建设中干过，带回家一些录音机，磁带和计算器，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这些房客穿衣、发型、唱的曲调及说的话都和张庄当地人不一样。亲密接触悄悄地影响着张庄地风俗。几年后，张庄人发现他们和距离公路几里的人相比比较时尚了，后者被认为是穷乡僻壤。

这种混合的结果之一是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这些电影有的是间谍恐怖片，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发生的历史剧，其中有男女在建设工程中相遇的浪漫情事，要不然就是来自越南、朝鲜和南斯拉夫的外国片。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一些张庄的孩子决定反对扩大的当地学校。生产队某领导的女儿，转学到了建设总部为铁路职工开设的学校里，她独立性很强。她父亲打她直到胳膊都倦了，她还是拒绝转学回来。

如果一个人不想搬进村里，是不可能娶得张庄的女孩的，因为老成的年轻女孩不愿离开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一刻钟一路到长治市的公车，两天一路通往北京和郑州的火车。

原则上，中国农村的年轻人婚姻自由，但实际上这很难实现，年轻人相遇的机会太少了。既然大部分人的公社是相联的，在求爱开始前，必须遇到外面的某个人。既不去学校也不上班的人是很难遇见合适的对象的，必须依靠父母做媒。

但是张庄通常很特殊，年轻人可以遇见并且和外面的人结婚。一个例子是李灵巧 (Li Lingchiao)，尽管退学了，长相极好，麻花辫垂到腰身 (在 1978 年她剪掉之前至少是这样)。她的嘴唇老是张着，好像很渴甚至气喘吁吁。她是妇女组织的副主任和队里党支部成员。作为一个党员，她应该等到 25 岁结婚，她的丈夫应该等到 28 岁，但是她在 20 岁的时候和一个年龄相仿的男青年结婚了，他们是北面一里的马场中学的同学。

当我问及此事的时候她脸红了，她解释说当时丈夫的父亲病得很厉害，想让他的儿子在他死之前结婚。她不想违反制度，但是丈夫是如此的可怜，她很同情，就答应和这个年轻人结婚。结婚后他的父亲从草席上跳起来再也没有生过病。

“你怎么被允许的呢？你年龄不够呀。”

“我们没有去马场公社，我们去了东边的 Congdao 公社，他们不介意。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各地的行政部门都垮掉了。”

如果遇见不相关的人是自由择婚的必要条件，受过教育的张庄的年轻人很令人羡慕。他们都住在一个大的曾经被北塔人占据的二层楼上，男的住下面，女的住上面。但是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我问了一个和我面对面交谈的代表“住这样的宿舍里，一起工作，难道你不想谈恋爱吗？”

他们脸红了，都否认脑子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说他们都太年轻了，不能考虑恋爱婚姻之类的事情。尽管我在三逼问，也没能打破他们坚固的防线。

张（Chang）以前是在湖南当兵，自从大队总部改成客房后，就任命在这里看大门。他总是以“我发现”开始谈话，好像他的每个发现都值得调查。

他说：“我发现，这里仍有一些令人憎恶的地方。”

他所说的憎恶是指文革遗留下来的痛苦的感觉，文革开始于 1966 年，结束在 1970 到 1976 年，取决于询问的对象。公社里数年关于谁掌权的党派争斗造成的伤害很难痊愈。

晚上，张（Chang）和我走出住宅区的大门，像农民一样蹲坐在地上，看着来往景象。张（Chang）有一台沙哑的便携式收音机，花了他 13 块钱。他常常把它调到湖南歌剧，来自山西南部边界的广播。张庄人在街上走时，有些人会停下来听听，聊上几句。

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开始咒骂小李宏恩（Li Hongen），1967 年他们取得政权统治村子南部的人民。取得政权意味着占据了队办公室，接管官方印章。印章在手，一个人可以签发队里文件使之生效。总之，一个人可以动用队上的钱。

老一辈共产党员有一些支持“海燕”“上甘岭”——他们以那些在全国范围内造反夺权的学生红卫兵为榜样——的人，小李就是其中一位。

海燕（取名于高尔基的暴风雨中的海燕之歌）和上甘岭（取名于朝鲜战场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接管了队办公室，推翻了队书记石双贵（Shi Shuanggui）和他的弟弟，副书记王金红（Wang Jinhong）。但是造反者不能执政，人们不听从他们的命令。一周之后，他们被迫交出政权给接管委员会，由五个其他的类似的草率组建的村组织像真理战斗队和揭露战斗团组成。一个月后政权回归，王（Wang）当上了新的党支部书记。

为了巩固政权，五个“忠臣”有必要把造反者置于死地。他们不得不让造反者和他们的祖先遗臭万年。小李和暴风雨中的海燕、上甘岭的领导者被称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和黑五类”，想翻土地改革的案恢复封建主义。他们没有粮食、粮票和外村的亲戚的款待时，他们回到了张庄，只会被逮捕、殴打并再次撵出去。直到 1969 年他们才可以回来呆在家里，直到 1971 年政府才去掉了他们反革命的帽子。到那时，指控已经深入人心很难被擦除了。数年后，街上的老人仍然指责小李试图翻土地改革的案。

文革中山西被杀的一个人死在张庄第四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他不是张庄的成员，而是滦中（Luan）中学的学生，家住在老天主教孤儿院。他带着他的小集团袭击学校以获取所需的粮食和粮票。他被铁路工人的流弹杀死，当时粮食袭击已经升级为争夺铁路调车场的夜战。

“每次一想起它，我就害怕。”王金红（Wang Jinhong）说。王金红（Wang Jinhong）现在是张庄的队长，不是党支部书记。“战争中，我们很容易杀死一个人。队里的成员可能会像那个学生一样死掉。我们很幸运，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它使我很怕想起这件事。”

我问：“你真的认为那些造反者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黑五类’吗？”

“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是那样。我们让自己确信。全地区流行着告发风，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对头是反革命分子。”

王金红（Wang Jinhong）的职务起伏很频繁，他的事业很像国家的副总理邓小平。1966 年后，他两次被赶下台，三次被提升为队里的最高职位。身体上，很突出因为身材魁梧和有些驼背。他小时候承担的担子如此之重，腰弯了，头不变的向前凸着。这使他走路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走不到他要去的

地方并且在焦急的寻求着达到目标的捷径。这种印象和他的性格很符。金红 (Jinhong) 的确非常渴求、好奇、不耐烦并且很聪明。

1967 年他重新执权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他领导着人们度过了文革的后几年。后来认为他对破坏了团结和生产党派的过激行为负有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人能控制的了。当时该地区负责调和党派的人民解放军将军，陷害和他竞争职位的人并称之为国民党密探，一个队领导者还会怎么被指责呢？

不管他承担什么样的指责，1971 年王金红 (Wang Jinhong) 被免职了，长治市派来工作队来整顿文革后的混乱状态。突然翻案使得对手复职，让王金红 (Wang Jinhong) 很失望和压抑。小李、金红 (Jinhong) 和其他几个相关人逃跑了。正如小李在逃跑途中发现的，没有配给证农民是无处可逃的。几天后，金红 (Jinhong) 回家了。有一段时间，他靠给邻近村民盖房谋生，后来他同意掌管队里面在铁路旁边设的修理自行车手推车驴车和托运货车的店铺。当队里其他生产萧条时，这个铺子由于金红 (Jinhong) 的手艺而繁荣起来。工作队把金红 (Jinhong) 和他的朋友成为黑帮，因为他们路过的时候，金红 (Jinhong) 等人拒绝向他们低头。他们为这个称号自豪，黑帮共同斗争，分享着一些东西像金红 (Jinhong) 的很肥的母猪下的小猪仔，藐视队里的其他成员，有力的破坏了当时在队里掌权的工作组的权威。

事实上，金红 (Jinhong) 是张庄技术最熟练和政治上最有远见的人。1958 年作为电工学徒应征入伍，作为能源建设厂工人花了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北部修建工程。这些年成了他的“大学”。他学到了很多关于电配线、电焊接、发动机修理和设计方面的知识。他还学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大多数年轻人希望金红 (Jinhong) 领导，不管他是不是在职。当他不在职的时候，他们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试着从他那里学习一些技能。

1973 年，王金红 (Wang Jinhong) 再次就职。他自我批评，承担了六十年代党派之争的一些责任，并发誓团结其他人改变张庄的现状。这是一个转折点。王金红 (Wang Jinhong) 和临时取代过他的人言归于好，集中精力获取生产上的突破。他们成功了，1970 年粮食每英亩稳产 28 蒲式耳，前二十年的平均水平，1973 年 48 蒲式耳，1974 年 60，1979 年达到了 100 蒲式耳。

产量的激增让我着迷。显然，它也期待着一个可以使得队里团结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是，一旦队里团结了，仍然存在着技术问题——张庄土地的碱度怎么解决？

金红 (Jinhong) 说，到现在我们为工业失去了很多土地，我们一直在种植经济蔬菜。为了它们的生长，我们获取粪便，厨房废物和工人家的煤灰。我们发现将煤灰施入土壤可以降低碱度。它会被冲走，不会被吸收。

他接着说：“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在黄碾镇 (YellowMill) 附近的电力厂，大烟囱向村子周围喷洒着灰烬，厂子周围庄稼全变得灰白。人们抗议，厂主并不理睬。但是每年庄稼都长得比一年比一年好。是灰烬对粘土起了作用，它们增加了渗透作用。”

“所以我们让学校的孩子们在 Shen Majin 研究组的指导下做实验。他们从电力厂的废物堆里获取灰烬，然后放到他们的试验田里，每英亩超过 100 吨。地上覆盖了三四英尺厚。确实有用，产量提高了一倍。后来，我们让所有的生产队收集灰烬，每年，每个队都会改良一些土地。”

“土地一旦改良，我们就可以灌溉了。我们必须打更多的井，抽更多的水，从水库里面转移更多的水，修理灌溉渠道。这需要花费很多的劳动力。我们最优秀的人以前都是外出挣钱——在火车站卸载货物，在钢铁厂切割齿轮，给水泥厂用手推车运石头。我们必须得把他们叫回家。”

“二十几年来，我们首次将农业放在首位，而且真的赢利了。”

“你们的副业也很兴旺。”我说。

“是的，我们集中精力发展副业以利用部分劳动力，像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抛光锯齿，给锯厂制把手。我们需要木材制把手，因此我们买了锯磨，当然需要熟练操作的人。我们需要磷肥，但是只能买到原料，因此我们办了粉碎厂，进而把它转化成水泥厂。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原料铺建灌溉管道。这些工程都很有收益，远远超过了外出挣的钱。12% 从事副业的人制造了我们 70% 的收入。”

王金红 (Wang Jinhong)，队长，[0]爱工作也爱玩儿，喜好传统也热衷于变革。例如，当人们去长治市庆祝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conclusion of a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闭幕时，他参加了张庄的踩高跷队。那时，金红 (Jinhong) 扮成骑着毛驴回家探望母亲的新娘。纸制的驴脖子和头从他的腹部突出，相应的屁股和尾巴从他的背部伸出，他跳着响应由同事扮成的马夫挥舞的鞭子。另一个扮少女的从鱼

钩末尾摆动着蝴蝶，同时她的求婚者徒劳的想抓住它。还有其他的踩高跷的扮演解放军、少数民族少女、农民、工人和当时的政治批判对象——四人帮，在四人帮的影响下踩高跷被禁止了很多年。

踩高跷是山西的传统，但是只有张庄有踩高跷的人耍杂技，跳桌子和爬斜坡。村里人从抗战大学的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国民党军官那里学到的这些活动，当年林彪做校长时，学校从延安迁了过来。这些舞者站的很高以至于最矮的都得低着头看晃动的四轮拖车上表演的乐师，这些拖车由拖拉机牵引着穿过城市。吹喇叭的双颊疏松的像两个肿胀的膀胱。他的手上下移动很快以至于人们看不清楚。有时他把喇叭从他的脸移开只吹簧片。声音好像森林里两只火鸡在开战。其他演奏者的竹管、蛇皮小提琴和膨胀的红鼓都停下来让火鸡吵架，突然随着喇叭低了两个八度和簧片齐奏，他们又恢复了狂乱的节奏。

乐车和它的两队欢快的舞者，穿过密集的人群缓慢前行。在看不到尽头的队伍中，乐车前后是其他的彩车，演出者，舞者和杂技演员，有一部分人还在高跷上。他们的活动在街道上扬起了很多灰尘，外围变得模糊不清。透过灰尘，可以看到前面用软杆撑起来的穿戴一新的孩子，后面是工人们上下舞动的纸画。另一辆拖车上面是歌剧明星们的叠罗汉，象征八个世纪以前被逼上梁山的水浒英雄。这是十年来传说中的人物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用锄耕地是中国最久远的传统。

过去我们都在地里挥舞着锄头，鹤嘴锄。熟练的把刃伸进去，把土翻过来，把最大的土块粉碎，再把刃伸进去……没有使用其他的任何方法把土壤弄得细密。

“这将会持续多长时间？”金红（Jinhong）问。

“什么会持续多长时间？”

“使用锄头的日子。我们使用锄头已经几千年了。该扔掉这些古董了。”

“是呀。”我说。

“我不怕吃苦。我愿意跟着别人一样锄地，可是我不喜欢。在美国你一个人可以耕种 250 英亩土地，可我如果能耕种 1 英亩已经是不错了。该改变一下了。”

“两种庄稼一起种的话，很难在地里使用拖拉机。”

“两种庄稼没有关系。在我们学会使用机器之前我们只种玉米。同时我们要不断提高产量。”

“你指的是这个？”

“是呀。”

“这是个问题。在美国你尝试什么，你有机会。如果失败了，你不能偿付贷款。你在拿你的土地冒险。这里没有任何风险，但是大部分事情我还是不敢尝试去看它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过去些年都是这样，公社决定一切 - 种什么，在哪里种，种多深，间距多大。如果你想尝试新东西障碍很大。”

“那你打算怎么办？以你自己为中心？技术问题转变成了政治问题。你在违背民主集中制。”

“这就难办了。你怎么实验一种东西呢？”

“不容易。事实上，在队里我们比其他人在实验方面处于更有优势的地位。实现机械化，我们有土地，劳动力，钱和材料。我们有的材料一般也能找到。其他的谁能这样调剂？供应部有材料没有劳动力。工厂有劳动力没有材料。机械办公室除了门上有个标志什么都没有。这些人除了说说还能做什么？”

王金红（Wang Jinhong）不满足于仅是说说，他不顾后果，怎么想就怎么去做了。1977 年，他问我，怎么把粮食弄到办公室楼二层的顶上？怎么灌溉玉米地？怎么使粮食干燥？我推荐了粮食推运螺旋，有中心轴的灌溉系统和以煤做燃料的粮食干燥机。（粮食推运螺旋像一个长的没有被破坏的螺杆或者钻子，运着粮食沿旋转罗纹形成的螺旋上升。中心轴的灌溉系统是一个至多半英里长的管子，每隔几码装在轮子上，在井中心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给管子提供水向外面喷射。）

不像中国的很多人那样只说说而已。金红（Jinhong）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有那些东西。明天我就开始做。”十天后，他建造了 26 英尺长的粮食推运螺旋。一个月后，他建造了一中心轴灌溉系统，管子长约 100 码，水在自身的能量下沿着管子环形前进。冬天过后，他克服了数年来折磨队里粮食处理的重重阻碍，制出了一粮食干燥机。

1979 年，他耕种了 100 英亩土地进行玉米机械化实验。使用从省机械所借来的和张庄已有的设备，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建议下，他的特别队每人生产了 25 吨粮食，一年的生产能力增加了 14 倍。

这项成就意义深刻。它意味着每一个人留下种地，就有 14 个人可以离开土地去做别的。在张庄，他们可以去操作打谷机，灌溉系统和干燥粮食，如果国家给这个想法一定的支持的话。

但这只是“如果”。让我觉得压抑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正视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即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此的支持也是越来越少。新疆和东北土地的联合收割机，国营奶牛场的挤奶机可以算是政府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正面的例子。但是，用于山西农村玉米播种机、收割机和除草机等等，就不一定得到政府的支持了。这种剧变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几乎不能想象。政府没有任何计划要实现它。事实上，公共舆论大多持反对意见。机械化有风险就不要机械化，这样的标语维护了锄头的地位。

不过，1978 年，国家对于发动农民改革者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中央声明国家必须尊重合作社的适当权利。在这种政策的框架下，生产队有权利自己做管理决定，根据当地情况种植最合适的作物。如果可以贯彻，将会解放巨大的创造力。只是希望这些政策不会被官僚统治的逆流所阻碍。

金红（Jinhong）已经病了三天了。街上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会计进出村政府的大门，我们决定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看门的张（Chang）和我跟着唯一一个好像是前行的人。他直奔金红（Jinhong）家。

房子的主要部分很大。起居室天花板很低，约 15 英尺长，连着的是东边灯光黑暗的卧室。屋里都是人，大约有十个，其中两个在卧室里面和衣在床的 Jinhong 谈话。锯片店的歌剧爱好者，Manfu，在锯场工作了 12 小时浑身是灰尘的瘦弱的 Chou-fa，从五队菜园过来的浑身散发着猪粪的味道的 Wende。还有两个带着帽子穿着外套的城市商业组织的人和一个从被粉碎的马场公社过来的送信的在等着和金红（Jinhong）谈话。在屋外的厨房，对里小诊所的沈医生正在熬治疗咳嗽的草药。他不得不和金红任性的女儿一起挤在炉子旁，她在给她的父亲熬粥。

卧室里面两个人（邻队的领导）出来的时候，两个顾客进去了。他们从门里面出来的时候，每个人从他们的衣兜里掏了一只烟。这是个约定俗成：办事情之前，先要敬烟。

看到这些，张（Chang）把我叫到不起眼的边上。他说，当和一些工业单位或者或者声名狼藉的官员打交道时，农村的客户要准备好三样武器——二十发的子弹夹（名牌香烟）、手榴弹（瓶装的好酒）和炸药包（盒装糖果）。商谈生意条件人称“yanjiu”，既指研究问题又指烟酒。不用说，金红是不吃这一套的。他的政策是根据收益判断出手。

我们等着顾客完成他们的生意，他们想确保能得到大量水泥。又三个人进来了。一个是铁路建设局的干部想商议一下张庄更多土地的转让问题。第二个是从铁路运输大院货车车站过来的技工头。他已经修好了张庄的一台拖拉机。最后一个妇女组织的主任，Zhangwenying。她爽朗的笑着，说一个卫生组织的代表团在过来的路上。她希望动员大家打扫街道。Shen 医生给了她一只烟，她用嘴上的烟蒂点着。

“又有两个妇女同意做绝育手术。”她说。

“那一共有多少个了？”

“今年一共 50 个。”

这是一次谈话记录。

考虑到没有人给我们上茶，金红（Jinhong）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你不是病了吗？”我问。

“没那么严重，差不多好了。”他以一种反抗的声音说，说到后面时逐渐平息下去。他开始咳嗽，令人焦躁的声音从胸部传出。对我而言他听上去很不好，可是好像没有人担心。脚下的潮气和空气中的尘埃加剧了他的咳嗽。雨后几个小时灰尘就会被吹起来，因为很多土地都是裸露的。不管你怎么咬紧牙关你都可以感觉到嘴里的沙粒。

在家里呆着对金红（Jinhong）没有一点好处。为队里的事情日夜操劳。它们就像空中的灰尘一样永远存在着。虽然十分操劳，但他的精神却在挑战下愈发旺盛。我明白为什么。在那里坐着，我意识到了本能的活力，集体和它的 2000 多成员释放出的创造力。眼下水闸泻水了，几乎每人都投入战斗：装沙袋、投入水中，建设工厂和家园。控制人口增长，设计新学校，向远至上海和哈尔滨等地派采购员。总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有勇气向年代久处于统治地位的锄头作斗争。

凤阳之行 1983⁷

大 回 潮 凤阳之行 1983

“什么时候农民曾梦想过拥有两层的房子？在这个二层的阳台上，我们可以晚上坐在外面而忘掉蚊子的叮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全心支持这个新政策，我祝它能够永远坚持下去！”

杨景立这样说，他从前是贫苦农民，并曾经做过乞丐。每当我们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都声音洪亮，慷慨激昂的赞扬“责任制”。他几乎不能把他的思想放到这些世俗的事情上来，比如每亩生产多少，或者一头肥猪的价格。

我能够理解杨的热情。他的家乡，一个叫做后阳的小村子，一直以穷山恶水而臭名远扬。该村的男性居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穷以至于找不到老婆，1979年共有17名单身汉。尽管他们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是全国平均值的六倍，但处在县城偏远角落的与世隔绝，领导的无能，反复出现的自然灾害都使得他们不得不年复一年的寻找救济品。现在，解散集体劳动而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4年之后，他们中比较有技能的农夫已经获得了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粮食产量。多于一半的单身汉们已经找到了老婆，而且一些从前的乞丐都盖起了混凝土构造瓷砖房顶的两层房屋，高高的矗立在四周环合的树丛中。

后阳是凤阳县的名胜地之一，1979年，副总理万里让这片停滞不前的地方踏上了新的道路。从那时起，这个小村庄和他周围的许多村落都享受到了增长的繁荣。县里的粮食产量每年增长50000吨，达到了超过从前记录两倍的水平。公共仓库里的大米，小麦，大豆和油籽都快要溢出来了，负担过重的铁路来不及运不走它们。在充足供应的刺激下，新的加工企业也开始迅速成长，它们由既有钱也有时间的个体农民投资兴建。

我在1983年3月应邀去凤阳，参观新的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好景象，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全国范围强制执行。在1981年和万里会见时，我曾经对解散集体土地表达过严重的疑虑，尤其是对这些已经被有力领导并充满繁荣的合作者经营得非常好的土地。尽管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号召次采用选择性的政策，建议仅仅在集体管理失败的地方采用家庭承包制，但我曾交谈过的山西农民说所有集体的东西都受到非常无情的压力，不管集体的东西是好是坏。党的领导人正在要求解散（集体经济）而不管具体条件环境如何，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强行推动，人们称之为“一刀切”。万里激动的否认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人民可以自由选择，”他坚持说。然而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省创造了什么。两年后，我在张庄的老朋友最终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并解散了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先进的集体农场。我终于找到了时间去（中国）南部转一转，并看一看这将给将来带来什么。

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一些猪背部凹陷，它们倾斜着身子，满是蠕虫，在喧闹的脏乱的孩子中间漫无目的的游荡。仅仅是这些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掩饰了对可怜贫穷的普遍印象。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到处跑着，它们不是穿着解放前的破布衣服，而是穿着制作得很不错的夹克和裤子，它们是由带有印花的机器织的布做的。尽管街上的孩子很多，但闲逛的无所事事的大人们更多，他们看样子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悠闲的时间是世界上每个落后乡村的祸根。

1979年以前每年的生产数字记录了经济停滞的情况，它导致了贫穷和慢性的不充分就业，这是我们看见的周围的景象。20多年来，产量保持在或者低于每英亩30蒲式耳（容量单位，等于8家仑），1977年（1978年是灾难性的大旱年）的人均产粮下降到低于1952年的水平。无论什么原因，这里是

⁷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总第35期，1983年11月第6期

合作失败的地区。在 20 年的社会实验之后，安徽北部地区的农民无路可走，只好寻求其他的道路。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凤阳过去遭受了非常糟糕的领导。县领导告诉我没有哪个合作政策似乎能够起作用。当地干部一腔热血往往在群众的冷漠面前碰钉子，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拖拖拉拉，无视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毕竟，产量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当地努力。为什么能获得最多东西的人在确保产量方面却什么也不做，或者几乎什么也不做？

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当坏天气破坏了他们的努力时，即使政府也不能弥补这个空缺。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出去乞讨。王说，在过去 10 年中有 9 年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每年冬天平均 5 万人离家乞讨。在最糟糕的年份，15 万人出去乞讨。出去的人并不总会来。在回来的男人中，许多人再也找不到老婆了。人口增长缓慢。在某些地方，人口甚至减少——这个现象为新政策的成功搭好了舞台。当到了分配土地的时候，每个人得到了至少 2 亩土地，有的人得到了多达 5 亩（几乎有 1 英亩）土地。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至 5 倍，并为家庭式的生产提供了相对牢靠的基础。

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合作社在安徽如此沉重的失败，而在我近年来参观过的其他地方却是如此的成功。1980 年由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新任命的中国共产党凤阳委员会第二书记翁永锡——所做的全国调查表明，在中国有 30% 的合作社发展得很好，30% 做得很差，另外的 40% 位于中间水平，既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没有得到惨重的失败。我所见到的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在北方，尽管不是全部，它们位于或者接近老解放区，那里的农民最初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它领导了抗日战争或者反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长年的武装斗争培养了懂政治的农民干部队伍，他们后来领导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而且都领导的非常好，至少在许多地方都如此。在另一方面，安徽省没有经过这样的历史。1949 年被北方的部队解放，1952 年在外面人员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然后没有经过任何互助组的实验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土地合作运动，这在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跳跃。在初级阶段，当分配收入的时候，所占有土地的份额会算在内，但在高级阶段，仅仅是劳动力会算在内。在后一阶段甚至都没有在表面上取得巩固之前，公社运动就把平均主义发展到了空前极端的程度。因此合作耕种（在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威信。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经验的地方领导人，在新的按人分配的体制下，不能够激发任何生产的热情，只能利用自己的权力筑起了自己的安乐窝（即只为自己谋福利）。这样周期性的，揭露、挑战并取代他们的人，当面对同样的惯性时，也最终使用了同样的价值观，开始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公社服务。解放 30 年后，当安徽的农民不能让人均产量比他们开始（实行合作化）时有任何提高的时候，像目前党的第一书记王宇新，它的副手宋林生，和副县长王长泰之类的人决定，是到了痛苦的重新评价（合作化）和倒转前进道路的时候了。

王宇新说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们决定试验的道路就是刘少奇臭名昭著的“三自一包”政策的变种，刘少奇的政策多年来被谴责为“资本主义道路”。王和他的同事从两个阶段引入了这个道路。第一步，他们催促农民把他们的生产组分许多小组，每个小组根据合同只在指定的土地进行耕种。当这个措施在 1979 年取得了一些成效之后，领导们就催促农民更进一步，根据“大包干”（包括所有东西的合同）的体制一家一户的签订土地合同。大包干最应该描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在实行合作化的政策挫败之后，凤阳农民希望得到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但他们不想要产品配额、按百分比给予的奖励和变化的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和公共部门需要以现金的方式从土地得到什么。然后他们可以答应上交（政府希望得到的）最小配额，只要他们能够任意处置剩余的作物。

王书记一直都做这件事情。在省一级的官员中万里支持他，因此“责任制”以大包干的形式产生了。在凤阳县，那里的人均土地比中国其他地方几乎都多，每个家庭获得了人均 2 亩土地的使用权。

作为回报，每个家庭答应上缴国家农业税，并上交少量用于支持本地（大队和公社）官员，然后以固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少量固定配额的粮食，这个配额已经根据传统设定好了。由于这种安排需要的相对较少，它释放了农民的能量和热情，并且以很快的方式推进了产量的增长。该县全部粮食产量的数字显示了稳步的增长：

1977	180,000
1978 (大旱)	147,500
1979 (分组承包)	220,000
1980 (家庭承包)	251,000
1981 (家庭承包)	320,000
1982 (家庭承包)	359,000

“我认为我们用这个制度会有成果的，”王书记说，“但我从没有想到结果会如此的惊人，并且如此的持续。这对我是个奇迹，这对所有人都是奇迹。”

1979 年以后的每个收获季节，农民都早早起床，努力工作，比以前更长时间的呆在田野里，而且他们每天收获的东西都比自 1956 年集中土地以来多得多。因此，他们常常在紧张的几个月内完成了每年的工作量，按后在剩下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在过去合作化的日子里”，王昌礼说，“我们常常每天都整日的劳动，从年初到年末都这样，但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完成——工作一小会儿，休息一下，再工作一小会儿，再休息一下。我们感到很疲乏但收成却很少。我们在做的事情看起来像是工作，但事实上我们止步不前。现在我们把每分钟都利用起来了。我们的劳动产出了结果。我们挣得了好的生活，并且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支配。”

在副县长王长泰的帮助下，我细细察看了几个家庭的账本。下面是二石英公社，张老庄大队，张老庄小组的李万华的数字。

李的家庭共有 8 个人，签了 22.5 亩的合同，平均每人 2.8 亩（稍低于 1/2 英亩）。根据他 1982 年的合同，他应该给小组交积累金（用来支付地方干部的工资，给困难家庭提供福利等）91.74 元，作为农业税给国家上缴 545 斤（11 蒲式耳）的粮食，以国家正常的粮食价格卖给国家 679 斤（13.5 蒲式耳）的粮食。除以上之外，他计划卖给国家计划外粮食 2392 斤（47.84 蒲式耳），价格要比正常价格高 50%，并且卖出 22.5 斤的蔬菜油，498 斤的干烟草，2 头肥猪，10 斤的鲜鸡蛋。他的实际产出要比以上计划还要多得多，到年底，他还结余 20300 斤（406 蒲式耳）的粮食，960 斤的烟草，600 斤的油料籽（大部分是芝麻），800 斤（15 蒲式耳）的大豆，更不要提养猪和家禽等副业的收入了。他所有途径的净收入达到了 4800 元，或者说人均 600 元，这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在 1979 年以前，承包制开始之前，李万华从来没有积累到足够的工分来给家庭每个人支付由大队提供人均 520 斤的粮食。他总是不得不通过上缴出售他的两头猪所获得的收入来填补之间的差别。保留的人均现金收入要低于 100 元。李万华坚持认为在那个时候家庭也能过得去，但很明显在 1983 年家庭成员要过的好得多。

在姚印大队我们举到了一位刚结婚的年轻男人姚宇阔，他以前每年人均获得仅 500 斤的粮食，100 元的现金。现在，他们承包了 5.4 亩（稍低于 1 英亩）的土地，他和他的妻子每年每人净收入现金或者其他类似收入价值 700 元。这是在给当地积累金上交了 20 元现金和给国家上缴了 300 斤（价值 60 元）粮食之后的收入。姚宇阔强调他每年仅工作大约 4 个月，并且彻底的享受漫长的冬季农闲时期。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坐在他新的石头瓦房（石头墙，烧制的瓦屋顶）里。因为石头是他自己切割的，这个房子仅花了他 3000 元，他已经完全支付了这些钱。

我们遇到的农民中最富裕的是老王昌礼，来自后阳的前乞丐，他的滔滔不绝使我们烦的不行。1982 年他们家 8 口人共承包了 42 亩（7 英亩）的土地，收获如下：

小麦	270 蒲式耳
水稻	324 蒲式耳
大豆	47 蒲式耳
高粱	12 蒲式耳
sweet potatoes	61 蒲式耳（等价到粮食）

由于他打破纪录的产量，他获得了 10 蒲式耳粮食的奖励。杨拥有的总粮食达到了 726 蒲式耳，或者大于 20 吨。此外，他还收获了烟草（2000 斤），花生（1000 斤），油菜籽（400 斤），大麻籽（50 斤），薄荷油（20 斤）。他用多余的粮食和筛后的残余物养了 3 头肥猪，16 只小猪宰，30 只鸭子和 29 只鸡。他可以出售鸭子和鸡下的蛋获取现金。

杨的净收入在扣除各种包括税赋在内的各种花费之后高达 10000 元，人均收入 1250 元。在他最疯狂的梦想之外，他投入了 6000 元盖了新的两层楼房，然后买了 3 辆上海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上面描述的 3 个家庭要比大部分家庭做得好。他们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县的平均水平 100% 甚至更多。但是该县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在 4 年内翻了一番，并且迅速增长的迹象在哪里都能表现出来。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许多家庭新盖的房子，公社大量新盖的剧院，在国家粮站膨胀的粮仓，以及在流动农贸市场上的热闹的买卖情况。王副县长喜欢强调并不显而易见的事情，比如私人生产资料每年 500 万元的增长，包括工具，机器，大车和劳动水牛。集体生产资料同样也并行增长，以每年 100 万元的速度连续增长，这里最显著的增加是在 4 年内修建的 500 公里的电力线，这个数目是以前修建的所有公里数的总和。每个没有接上电的公社都根据人口情况给电力线集资。后阳的每个人掏了 15 元。即将被立起来的水泥电线杆，躺在到达县城公路的旁边。这条公路也是新的，同样是通过集资兴建起来的。

后阳的杨庆利（Yang Chingli）自夸说，他要集中精力进行粮食生产，在接下来的几年打破他的旧生产纪录。然而很显然，在粮食领域凤阳县正在进入一个上升中的平稳时期。每英亩超过 60 蒲式耳的小麦产量和超过 100 蒲式耳的水稻产量正在到达现有技术水平的极限。如果收入将继续用来提高扩张的家畜生产，其他的农村副业和许多小的产业必须即将出现。这也看起来是解决成千上万冬季由于没有粮食生产而无所事事的人口就业的唯一方法。

王副县长带我们去看高人公社——在副业生产方面很有前途的范例。在那里，7300 个强壮的劳动者经营者 31875 亩的土地，平均每人 4.5 亩（大于 $\frac{2}{3}$ 英亩）。公社负责人李计算说，由于每 10 亩一个人就够了，因此在这片土地上多了 3500 个工人，他正在忙着鼓励创建各种可能的副业。目前为止高人的人们已经创办了 83 各企业，雇用了大于 2500 人，还有超过 1000 人仍然没有工作。大部分企业是家庭创办的，3 到 8 个家庭联合起来，集中资金，进行生产，包括水泥，粘土瓦，石棉瓦，烧砖，磷肥，鱼塘，面粉磨房，榨油，淀粉制造，粉碎石头。一些还创办了建筑公司。个别的家庭和大队公社联合起来创办了一些较大的联合股份公司，除了其他东西之外，他们投资了 3 个机械化的石头粉碎厂，和一个中型的磨面厂。

我们去看投资了 41000 元的磨面厂。为建造它，公社购买了价值 2000 元的 4.5 亩土地，它还包括 24 股投资，每股价值 1000 元。个体家庭共购买了 15 股。被家庭购买的每股还包括在该工厂的一个全职的工作岗位，另外在 17 个人（15 个工人，一个公社代表，一个当地生产小组代表）的股东大会上还有一个投票权。该会议选择了包括 3 个人的管理委员会，他们反过来雇佣经理。在 1982 年的后 8 个月里，面粉厂产出了净利润 10812 元。其中 23% 作为红利，剩余的部分作为积累金用来进行新的投资。工人每月的工资为 58.2 元，另加一双皮靴的年终奖，价值 17 元。

“这个企业的优点是什么呢？”公社主席李问道，“它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剩余资金找到了出路，为民主管理找到了机会。每个工人都有股票，每个股东都有投票权。”

最后一点相当重要。中国农村合作社继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作为国家基础部分的单位里，一人管理且滥用上面分配的职权。这些新企业，由底层投资并在国家体系之外，是由拥有他们的人管理经营的。如果经理无法令同时是股东的工人们满意，他们将解雇经理。当一个新的石头粉碎厂的股东们正在寻找经理时，他们在合同中规定必须提供至少每月每位工人 65 元的工资和每年每股 196 元的红利（预计 57500 元净利润的 30%）。这些成绩能给经理赢来如下的权力：任命职员，和工人签署合同，如果工人违反合同及就解雇他们，并能获得每位工人两倍的奖金。（我忘了询问经理如何解雇一个同时是股东的工人）如果另一方面经理没能完成规定的工资水平和利润，其间的差额需要从经理的腰包来弥补。未弥补差额的经理将面临指控，逮捕和拘留。

在高人公社，新的产业远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就业。但在该县另一端的一个偏僻的停滞不前的地区，我们参观了一个大队，那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每个强壮的人都有充分的农闲时期就业机会。这个大队在一个大湖的旁边，那里的芦苇面积几乎等于耕地的面积。除了他们的人均耕地外，每个家庭都

承包了一些芦苇地，他们收割和存储的芦苇提供了全年编织席子的工作。持续的编织和土地上的工作合起来带来了全县最高的平均人均收入：每年 900 元。数十户农民正在建造新房，更多的人开始买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和拖拉机。他们村非常的偏僻，背后什么也没有，而且看样子正在缓慢的陷到湖边的泥沼里，但他们显示出了进行现代化的很高的精神和热情。和我们谈话的所有家庭对未来都有雄心的计划。他们主要正在计划二层的楼房，因为他们希望能把第一层转换成编织席子的车间。他们希望能在一年内接上电。这个湖边的公社显示出了匹配很好的农业和副业之间的联合所带来的收入潜力，和作为收入支持的全年劳动的重要性。劳动力仍然是中国最充足的资源。这个大难题正在起作用。

在凤阳县我们所到过的所有地方，人们谈论最多和期望最多的是一种作物：水稻。水稻种植的最新事物是杂交种子，它具有远超过 100 蒲式耳每英亩的产出潜力。一些大队已经开始专攻杂交水稻种子，他们每斤售价 2.5 元。水稻需要水，至少一半的水来自 50 年代集体运动建造的大规模灌溉设施。剩余的来自小湖泊，池塘，和当地许多年来修建的集水池。一共加起来，他们存储的水能够灌溉该县大约三分之一的耕地。和南面各县如此明显的混乱相比，凤阳县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沟渠、水闸和泵都处在运转状态。这些东西都是和土地一起承包的么？如果是的话，怎么做的呢？

王副县长向我们确认说，人们仍然是集体拥有这些水利设施。公社和大队根据需要组织水资源分配，但和过去相比，每个人都必须预先交付现金才能得到水。为了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去了位于该县西边的巨大的凤牙山水库。在那里，低低的起伏的小山忽然让路给了两座巨大的山脉，这提供了完美的水坝地点。该水库水面面积 146 平方公里，存有 125 万立方米的水，其中一半的水可通过水龙头灌溉。水库目前正为 89000 亩（约 15000 英亩）的土地提供灌溉，刺激了水稻产量的显著增长。在颍润公社，由水库提供水的五分之一耕地的产量已经从 1978 年每英亩 51 蒲式耳增长到 1982 年每英亩 118 蒲式耳。王副县长说农民承包了土地之后产量上涨的原因是：（1）农民劳动更努力了（2）他们买了更多的化肥（是 1978 年的 4 倍）（3）他们种植了大面积的高产量的杂交水稻（4）他们认真的灌溉每片土地（预先为每立方米的水付钱使这成为必要）。

在大跃进的年份里通过集体劳动建造的这个水库，仍然是国家单位。该县雇用的职员必须通过销售鱼和水为日常运转和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但在 1979 年以前，这两项产品都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当农民集体需要水的时候，县里的官员没有选择只好放水。获得水的人开始答应说以后给钱，但非常少的人遵守承诺。每年该县不得不投资 3000-4000 元给水里放些鱼苗，但偷猎者把大部分都偷走了，以至于官方每年捕获的鱼都没能挣够足够的钱来支付鱼苗。

1979 年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开始，水库职员在付现款的基础上释放灌溉水。下面的小组、大队和公社不得不提前从农民用户以每 100 立方米 0.5 元的价格收钱。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水监护队，每个小组，每个大队轮流来，保证水到达了每个地点。水库职员，由于手里有了钱，就额外释放了足够的水以弥补由于蒸发和渗透导致的水流失，并且保持水流直到每个家庭得到了他们为自己的土地所支付的水。水的收入从 1978 年的 6000 元增长到了 1982 年的 49000 元，水库第一次变的富裕了（有存款了）。

其次，水库职员重新组织了渔业。作为国家单位的水库承包给了 3 个附近的公社和 5 个水边的大队，并且以每股 2000 元的价格卖出了开发股份。水库买了其中的 3 股，每个公社买了一股，5 个大队合买了一股。这带来的足够的钱来给水库存放鱼苗。由于他们投资了金钱，当地人密切注意并赶走他们发现的偷鱼者（曾经有一个人在逃避追捕时淹死了），他们共同捕获的鱼超过了 100 吨。以每吨 800-1000 元的价格，每个单位都获得了成千上万的金钱。忽然他们又有了一个值得开发的副业。陈经理估计未来潜在的产量是 200 吨。王副县长认为总数能够可能达到 1000 吨，如果他们寻找方法放养在不同的深度生长的鱼类，这样下面的鱼就能够以上面鱼的排泄物为食。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归功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结果看起来证实了这个理论，但县的领导们只是顺便提起或者根本不考虑许多与物质刺激无关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能够使显著的生产纪录成为可能。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

体劳动建造的。农民们在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这些基础设施，大跃进被“责任制”的支持者们嘲笑为极左，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但如果没有大跃进，凤阳今天能有多少水能够进行分配呢？在大跃进很久以前，成百万的人也在改造淮河盆地。他们建造了水库以保存流失的水，建造河沟以控制水库不能保持的水。没有这些集体努力，现在的任何人能够有希望控制充满危险的淮河旁边的低地里的洪水么？

其他伟大的工程设施也是必需的，如果凤阳的农民想在未来能够突破到新的粮食产量。这些工作能够在“责任制”的框架内实行么？能够得到资金付钱给人们让人们为了金钱而单独做他们曾经为了工分而集体做的事情么？在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劳动投资到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工程中。他们在数月甚至数年之后才能收获回报。（如果要做类似的工程）现在农民要求根据天数或者月数提供报酬，那么必要的资金从哪里来？

劳动力供给没有问题，听见这种说法并不惊奇。我已经描述了成千上万的人如何在冬季的月份里无所事事等待春天的播种季节再次到来。集体经济时期总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劳动，这条常规被指责为浪费劳力，因为农民的干劲不高。但是那些浪费真的超过了今天由未用的劳动力所造成的浪费么？

王副县长向我确认，大的工程仍然是可能的。在1982年的大水季节，当淮河威胁要冲垮堤坝时，县领导人派了30000人加高和增强堤坝。县里没有付钱，但取代的是给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安排了需要完成的份额。每个完成自己的份额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工作进展迅速而且良好。王说，要比过去的集体劳动好得多。

然而，这项沟渠工作在我看来是个特例。发洪水中的淮河在洪水到来时给所有的居民都提供了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县里的官员可以不付钱来动员人们保护他们自己以免河水溃堤。但他们能够不付钱而动员同样的人们建造对他们未来有用的事情么？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其他人能够不指责该工程为平均主义的复活和另一种方式的“大锅饭”么？

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要求份额粮食的人。该体系的另一个变种已经长期起作用了。这不是一些最近的报道所暗示的由四人帮领导发起的。正如该体系今天所做的，高于份额的粮食以高于国家标准50%的价格出售。由于凤阳农民过去产出的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的份额一直很低。一旦他们能够提高产量，他们开始收获高于份额的粮食，并以优惠的价格出售。优惠的价格是收入增长，并让农民能够在生产上投入更多，这反过来促使产量变得更高。当产量继续增长，以优惠价格出售的粮食不久就超过了以标准价格出售的数量。额外的收入用来进一步加速上升。今天，凤阳县生产的粮食有多于80%都高于规定份额的粮食，而且他们以高于标准50%的价格出售。也就意味着中国全国都在资助凤阳的农业投资和农作物生产。财富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责任制”通过释放农民的积极性使得该进程能够进行，一旦该进程开始，通过以高于正常价格出售粮食而带来的额外利润就给当地的经济增加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当资金涌入时，人们把大部分都投资在为粮食生产的增长提供能源和供给，并且收获了利益，这比单纯扩张的劳动力带来的增加要多得多。把所有的进步都归功于“责任制”，掩盖了高于配额粮食的高价格的影响，它给这些进步提供了巨大的贡献。

在供给缺乏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1978年以来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便是由于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过去是不曾有或仅仅在60年代初期有过的。当我问农民他们这种高增长的具体原因时，他们都说“承包合同给了我们动力”。但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工作也不可能使任何一块土地的产量翻两番，当我以此反驳他们时，他们都说“那当然啦，我们购买了更多的化肥”。

事实证明，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以及氮肥（他们仍然还没使用钾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当我问及他们以前为什么没有买更多的肥料时，他们说以前太穷了。但是确切的是，政府过去一直都有贷款给农民购买肥料。我猜应该是十年前供应不足的缘故吧。即使合作社的农民们在过去能够找到足够的钱，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一切。

当我问到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提高产量时，他们都说“优良的种子”。他们极为称赞某几种冬麦品种，但是谈得最起劲的便是杂交水稻这一项重大的突破。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得这个国家的粮食

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在五年前是无法实现的。“承包责任制”正是及时抓住了这项新技术并把它推广，新技术的推广反过来又使得这种承包责任制看起来很有效。难道有谁会说旧的那种农业合作模式没有使用杂交水稻的优势？我并不这么认为。数年前山西引进杂交水稻的史实便否定了这种说法。在跟农民纠缠于有关获得高产的物质条件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时不时地提到了虫害的控制。看来，每一户人家现在都有一种喷雾器，以使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来防止水稻、小麦、大豆和烟草的虫害。这样一来，只要虫害有所呈现，人们便可使用这些药剂在数小时之内把它们消灭掉。而在过去，整个大队也就仅有一台或两台这样的喷雾器。我问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么少呢”，他们答道：“我们太穷了，买不起更多的工具。”

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如果没有“承包责任制”，凤阳一带的村落或许还会继续萧条下去。然而，必须记住凤阳的生产起点水平是如此的低下，以至它的增长如此明显。四年之后凤阳的农民才达到中国许多其他村庄在集体的努力下早已达到的农副业生产水平。只有在凤阳或其他地区的农民经过他们的努力把生产水平提到另一个新的高度时，这种新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让那些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成熟的物质因素产生作用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但是要在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水平的成就就难多了。

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公社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正开始提高土地生产所可能达到的上限。为维持发展的势头并保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开始寻求专业化生产，主要包括牲畜——家禽，制酪，养牛，养猪，养兔，养蜂——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例如那些已经开始运营的大型旅店。这些官员们所提到的几乎每一种行业都需要密集的手工劳动，就像他们所谈到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一样。他们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思考如何利用机械化生产提高人们对土地的生产效率。不过，这可能就是为了在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保证每单位产量的收益进一步增加的最重要方式。

现在看来，中国省级和地区上的领导降低机械化水平并非是偶然的了。尽管数年前农业的集体化就已造就了农场使用拖拉机的物质基础，尽管他们非常赞赏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把实现机械化提到高度的议事日程上，但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在任何水平上对其认真地对待过。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通过把土地分成无数小块的方式打碎了这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这样，任何人都很难再去认真地考虑如何使用机械了。土地的重新划分已经摧毁了所有机械化的经济基础，使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机械化的打算，尽管它意义深远。

“我们的土地是丘陵地”，当我们开车穿过一个广阔平坦并一直延伸到淮河堤坝边的平原时，王副县长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完全使用机械的话，这些机器的体积必须比较小，并且它们应该具有多种功能，这样才能适应丘陵地的需要”。然而就在那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整天和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广阔的平地，最后，我们到达了一块延绵起伏并且也基本上跟平原一样适合机械化耕作的土地，而这块地正是从平原中分出来的一块。

不合逻辑的是，王副县长继续侃侃而谈丘陵地和小型机器，就好像机械化必须首先从最不利的地形开始实施似的，而不是从该县最有利的地形开始。通过集中论述其所辖区域边缘的小块土地如何难以使用机械，王回避了“承包责任制”对不利地形的影响以及承包合同对平坦土地的破坏性后果。他似乎是这么认为的：机械化要么必须适合全县的所有土地，否则一块也不能适用。因此，即便新政策破坏了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有利因素，甚至摧毁了该县过去土地集体化的所有成果，也是不要紧的。

王副县长预料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购买机器，形成小组的联合耕作，并把各自的土地连起来以形成足够大的耕地从而使农业机械化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发展形势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是巨大的。25年前，依靠全党的力量支持所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力量才使得这种联合得以发生，现在它又一次被切分为成百上千万的小块土地了，这样每一个家庭就能够按人均计算得到相等的土地，而这些家庭能够缝合这些裂痕从而再次走到一起吗？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又有什么希望呢？很明显，凤阳的联产承包释放了某些重要的生产力因素，但是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对其长远发展不利的可怕的物质障碍。很难看到，农民们在以家庭为单位并且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合作的情况下能如何克服这些自然障碍。

在一种新的理论里，农业被看作是个人主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占有形式，这种理论也给将来的联合耕作添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这种障碍可能会跟自然条件造成的障碍一样大。县领导现在已经认为

集体化本来就不适于农业耕作。因为耕作的过程和家禽饲养的过程需要数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一些不可预见、无法避免的外力将会再次影响其生产过程，而这期间的可能变化需要及时彻底的补救措施，这一过程需要高度的机动性，独立性和自我主动性。只有在生产者和这一过程有最直接的关系时才能够处理好这些变化。任何疏远这种关系的做法，任何推托责任的行为都会打消人们的积极性，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这种新的理论，只有分散的家庭经营才能天然地够满足这种需要。凤阳二把手王永熙（音）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听起来就像某种经济法则的规律，如供给需求的经济规律一样。“这么多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用各种各样的集体化的管理方法，可是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了，我们不得不断定这样一个事实：受中央领导的农业合作化在其试图促进的每一个必要环节都出现了矛盾。在农业生产上，从种植到耕作到最后的收割存在某种生产循环，这种循环对中央制定的方向与群众参与来说是不可相容的。我们过去的所有失败源于最初的一个失误，也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法则。”

王这些异常的推论完全推翻了早些时候共产党开始组织农业集体化时的基本看法。1956 年廖鲁银（Liao Luyen）把它们归纳为：

“农业合作化，通过合并土地，去掉了田埂以及不必要的田间过道，可以增加耕地的面积（平均增加 5% 的耕地面积）。

“农业合作化为水利工程的完成，水土保持，大面积的土地改良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它还使得把酸性土壤的改成可灌溉土地，贫瘠地和荒地改造成肥沃成为可能。

“农业合作化为充分利用所有农村人口提供了可能，包括那些强壮的劳力，那些普通的劳力，以及那些只能做一些轻活的劳力。合作化可以让所有这些劳力按不同的分工从事所有的生产活动，以发展农业生产，副业，饲养业，一些辅助性职业，还有渔业。

“农业合作化为农田的专一管理，根据不同的土壤类型进行最优的耕作，为投入更多的劳力改良土地，深耕细作改进耕作，采用更好的技术播种，提高田间劳动的组织水平以及提高亩产量提供了条件。”

对以上看法的否定听起来好像是对农业集体化的一个完全抛弃，也像一个回退到过去传统个体农户耕作制的宣言。但“承包责任制”的拥护者们否定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新的承包制体系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能够让个人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发挥个人主动性的体系。这种集体主义原则包括生产资料的全民（国家）所有，土地不得买卖，租赁。它还包括一个集体支持网络，得到国家支持农民所有的供销合作社，其中国家负责供应关键物资，并负责大部分产品的销售。改革者认为这在宏观上是集体主义的，而在这个框架下，也就是在微观水平，农民们自己制定计划，决定投入的资金和劳力，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农户们对其每一个生产环节投以足够的关注。根据这个论据，这就是适合中国独一无二的农村状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针对这种新的体系是否能被看作社会主义作进一步的思考下，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即使从四年之后的凤阳县看来也是相当公平的。但是，人们也可以预见到这种由家庭联产承包所释放出来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将给集体主义的原则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并最终推翻它，而这种原则正是现在支撑着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许多长远的问题仍待回答。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两极分化的出现。当 1950 年开始集体化运动的时候，人们最初认为集体化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阻止社会的分化，防止农村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通过这种方式，农民将实现共同富裕。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确实是阻止了两极分化的发生，但许多合作社并没出现重大的生活改善。所有社员都仍然很贫穷，更糟糕的是，许多人根本吃不饱。

现在，“承包责任制”的鼓吹者们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就是大肆宣扬那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这种原则很明显得到了那些年轻、健康、强壮、精明以及富有挑战精神的人的青睐。但是，对于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农民，他们通过占有最好的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土地，如牲畜，卡车，拖拉机，水泵，脱粒机等发家致富。我想问，对于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他们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对那些没有他们这么走运的人们进行剥削呢？要知道在消费较低的 50 年代，一个拥有两头牲畜的农民就可以不用工作，难道一个拥有数台拖拉机的农民在今天不能这么做吗？而且，如果这些拖拉机传给其下一代的话，难道这个家庭不会拥有某种长久的特权阶级的地位吗？

王副县长并没有看到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过去这个县有 27,000 户贫困户，大概占总数

的百分之三十。(他对贫困户的定义是按照谷物人均年收获少于 700 斤以及人均年收入少于 50 元来算的。)而现在全县只有 1,021 户这样的贫困户而且政府还给他们提供了十种不同的特殊援助以免他们过不下去。这些援助包括：

- (1) 每个地方政府和当地的干部开展一对一的扶贫义务活动：考查贫困户的困难，给他们提供建议；
- (2) 贫困户不需要纳税；
- (3) 县政府拨出 50,000 元以帮助贫困户买肥料，改良的种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必须品；
- (4) 县政府拨出 30,000 元以给贫困户提供低息生产贷款，并把利率设为 1%而不是银行的 4.8%；
- (5) 公社和生产队拨出额外的 30,000 元以提供类似的生产贷款；
- (6) 建校费不向贫困户摊派；
- (7) 贫困户有权以低价购买饲料，并在任何时候向当地的粮站出售，哪怕当地粮站由于供应过剩已停止对外收购粮食；
- (8) 贫困户看病不用交诊费（他们仍然只需付药费）；
- (9) 供应社保证向贫困户提供所有必须的肥料，而其他的农户就得自己去找所需化肥；
- (10) 家畜专家免费给贫困户提供帮助，免费提供育种服务，如给幼猪消毒等。

王副县长还介绍，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也会得到特殊的援助：

“政府给每个老人每年补贴 700 斤粮食，6 斤菜油，一顿草、稻草以及秸秆作燃料，30 元钱买衣服，30 元就医费，40 元零花钱。这些加起来共相当于每年 300 元的援助，有了这些援助，老人们就能自我照顾了。”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王补充道，“年轻人如果看到老年人即使没有儿女也能生活的话，他们生儿育女的压力就会减小些，特别是生男孩的压力，他们主要靠儿子养老。”

为了阐释当地政府对贫困户实行的政策，王副县长特意带我们拜访了陈德芳，她是一个寡妇，有四个孩子，耕地 17 亩（将近 3 英亩）。她拥有五间新房子，配有很好的家私，跟邻居共用一台水车，养了两头猪，估计这两头猪长成以后每头能卖 200 块钱。在其兄弟姐妹和其小姑子的帮助下（她自己 17 岁的儿子正在上学）她种了 133 蒲式耳的小麦和稻米（平均每英亩产 47 蒲式耳）并将其中的一半卖给了粮站（其中百分之 80 以较高的价钱出售）。尽管她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贫困户的标准，但她仍然得到了乡里，大队，生产组的援助，因为她丈夫在采石场因公牺牲了。她不必缴税，孩子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药费除外）。乡政府每年给她一吨的复合肥料，并且大部分不要钱，而生产队给她 180 元，生产组给 72 元以让她支付生产开销。乡政府也给了他一本“贫困户”的册子，让她有随时向粮站出售谷物的权利。当王副县长翻看这本册子的时候，他不由得抓了抓脑袋，她出售的谷物远比你收获的多。大多数谷物都是她邻居借她的本子拿去卖的，这样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出售了。他们大概给了她什么东西以换取这种特权吧。陈寡妇在这件事曝光后窘迫地向主席保证她以后也不会滥用她的册子了。

王副县长给我们介绍和阐述的措施只不过是掩盖这种制度缺陷的一个安全网络罢了。它主要由大队，公社和乡政府的税收提供，而这些支出由所有承包了土地的家庭来承担，这是他们的一部分义务。然而，似乎恰恰是通过这种承包责任制度本身使得这种安全网络几乎不可能阻止两极分化的出现或者某些人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进行剥削。陈太太的一个邻居已经拥有两台拖拉机了。每台拖拉机的运输能力能够给她带来每吨每公里 2.8 元的收入，这样，她一个月的总收入将达到 1000 元。这些 15 匹马力的四轮柴油机车，加上小型的 2 吨双轮拖车，每台也就是 4900 元。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用其赚来的运费买一台。在耕种和收割季节，拥有拖拉机的农民也可以帮其邻居做一些传统的工作——以每亩 1-1.5 元的价钱给他们犁地，以每亩 2 元的价钱为他们打谷。由于柴油的价格是每斤 0.3 元，每小时耗油 1-2 斤，因此纯收入是很高的。我想问，如此高的净收入是否表明其对邻居们索要的服务价格太高了？

王副县长否认了所有这些可能性。他认为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其运作费用的一个合法补偿，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王副县长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

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从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退一步来说，这只是一种天真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生产方式从来都不是土地，而是机器，工厂以及工业化资本。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占有，资本家已经能够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收益了。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企业家与非生产性的地主阶级分享利润的能力。无数的经济学家，从卡尔马克思到乔治亨利，已经论证了土地的国有化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理想的条件。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也鼓吹这一点，尽管历史上资产阶级总是跟他们的主地主阶级反对派相互妥协，相互合作以反对更加激进的工人阶级。

王副县长所说的拖拉机主人“合法的资本投资回报”到底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他所引导的一种重要生产手段吗，接受这种服务的人必须以一定的比例支付费用，而这种比例则反映了当前流行的一个收益率。当拖拉机的主人同时也是司机时，这种剥削关系的因素就被遮掩了，然而它到底是存在的。如果拖拉的主人雇佣工人驾驶其机器的话，那么就得加上另一种价值的形式——劳力工资的剥削收入。

人们可以认同王的这种观点，也就是少数个人拥有自己的机器并通过这些机器给别人提供服务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人们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促进这种形式生产的小量的私人所有制并保证他们的利益，增加他们的雇佣人数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上并把它作为阶级分化的根源而否认机器私人占有制所潜在的剥削，就是明显的愚民政策了。

近来，发展中的贸易也会给剥削和两极分化打开方便之门。现在凤阳地区个人最大的收入，据估计，并不是来自农业生产收入而是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所赚的收入。王副县长特别给我们谈到有个人通过把席子运到北方去卖而赚了成千上万的钱。这个商人的席子价格高达每床 3.2 元（而官方的价格是 2 元），他把这些席子运到一千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卖，一个季度可以得到 20,000 元的收入。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与公社签订了合同的个人罢了，——这个合同授权他做席子方面的贸易。根据合同他每年要上交 10,000 元，公社给他开一封介绍信以向当地的银行贷款支付购买和运输的费用。因为他在其花费上赚了 20,000 元，因此政府向他克以重税，高达 15,000 元。这样他还有 5,000 元剩余，而当地的平均人均年收入是 345 元。他可以把钱投回其商业上，存到银行里获取利息，或者购买一些新型工业建筑的股份。无论他怎样做，这些源自投资所产生的收入都必须归入不劳而获的收入并且最后必定积累成为一个富有的资本拥有者。这个人被称为小贩的时间会有多久呢？显然，现在充斥市场的商业自由必然会产生一批商业新贵。

我们在高郡乡（Gaojen）所看到的新企业，好像也同样使该地区走上了发财致富和严重分化的路子。村民们通过购买一定的股份就拥有在新的磨粉厂工作的权利，但是，工人们能有持有主要的股票多长时间呢？假设最初的股票持有工人退休了，并假设其继承人对这个厂并没什么兴趣，但是继承了其先人的股票持有权和投票权，这样，新的股票持有人不就可以不上班并从其邻居的劳动中获得相应的股票收益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够预见到这样一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通过其拥有的股票从厂里获得收益并成为工厂的主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工厂的基本工作而成为工人。让人们以股份形式投资好像以某个加速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也打开了不劳而获的大门。

两极分化可以说是“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令人烦恼最消极的后果，但它决不是仅有的一个严重问题。该体制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计划生育问题，入学率下降，臭名昭著的土地滥用问题，对树木的滥砍滥伐问题。它也导致了許多地区对成熟作物产的公开抢夺。许多承包了土地的家庭需要小孩到农地里帮忙，他们就超生，孩子长大后也不送他们上学以补充成年劳力的欠缺。许多家庭未经许可就在其承包的土地上盖房子，而有些家庭则在最好的土地中间修建坟墓，这样就减少了耕种面积。农民们也开垦一些永远无法用来耕种的荒地，他们还在夜晚偷偷砍伐公路和水道两旁的树木来建房子或做家具。

当我问王副县长有关这些问题的情况时，他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他只把这些问题当作一种暂时的不正常现象，这些现象终将得到控制。他说出生率在分地后急剧的上升了，但是随着收入

的提高以及上面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出生率会再一次回落的。他说入学率从 95%降到了 88%但是现在又回升到 90%。随着农民们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会再次想起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重要性的。他说许多人在其承包的土地上非法建房，政府正插手并阻止这些问题。他注意到有块空地上堆着一堆建筑用的石头，很明显是用来准备建新房子的，但是他说这块地的主人已经得到这块地不能用于建房的警告并答应把石头搬走。对于在耕地上建造坟墓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了，有新的也有旧的。王副县长没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指出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们看到了公路两旁许多刚刚被砍掉的新树桩，而且沿着公路好长一段路程都已经没有一棵树了。王说，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肆意破坏行为，政府已经把路基两旁的树木分派给每个承包户以作为其“承包责任”的一部分，他预料这些树将来会长得更好。我们看到极少的山地，因此很难估计由于农民们的草率开垦而导致无法控制的水土流失到底有多严重。对于农作物的抢夺问题，所有和我们谈过的凤阳领导和农民们都直截了当的人为这不是什么问题。“现在还有谁想种地呢？”他们反问道，“我们拥有的粮食都比我们能买得要多。我们把这些粮食堆在自己屋外的街道上，不会有人把粮食收走。抢粮不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我假定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自从家庭承包以来山西的抢粮现象这么多，而这个问题却从未困扰过凤阳。也许是这里的领导人的热心与周到的工作使得这里创建了一个不同的法律秩序氛围吧。

王副县长对未来的看法正确吗？上面提到的这许多问题真能如其所言会得到控制吗？或者这些是他们所自豪宣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体制的固有矛盾吗？我觉得现在还很难判断。跟凤阳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在其他地方这种相比的结果却又相反。是什么意识让每一个人都放弃集体化呢。为什么不保留这些已经取得如此成就的合作社并让他们与承包的个人相竞争呢？为什么不给不同的社会组织留出一定的空间来看看到底哪种体制会更好呢？一个人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借口，但是在中国，这股政策的风在某一时刻似乎只能从一个方向吹，并强制性的一刀切，好像没有中间路线的先例。

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村的变化 1984⁸

大刀阔斧的改 革：农村的变 化 1984

在中国最初的土地改革以后，土地制度发展为两级合作社所有。到 1958 年和大跃进，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一级，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人民公社。尽管有着某些调整和政策变动，这些人民公社仍一直是农村的组织核心，直到 1980 年开始被拆散。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依照责任制从地方政府承包土地。

要理解这种新的体制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你就必须了解一下中国农村。在西方，农场主们住在农庄里，工作也就在周围的土地上，但是在中国，尤其在北方，农民是住在拥挤的村庄里、到远处的原野劳作。当你坐飞机经过华北平原时，你可以看到这些村庄分散于各处，彼此相隔不超过 1 英里甚至还要近得多，每个村庄都有 1000 到 3000 人。村庄在发展，外围的土地就收缩，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只能依赖不断减少的土地资源生存。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已经低于 1949 年，但人口却几乎增加了一倍。

责任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 1962 年即大跃进造成崩溃之后制定的“三自一包”政策的复苏。“三自一包”的“三自”指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

倒退到 60 年代？

这种制度在 60 年代早期就大范围推广实行，可以拿当时的情形和现在坐一些有趣的对比。当然，在几乎全部土地都承包给个人的时候，扩大自留地面积的自由也变得毫无意义。扩展市场和开办以利润为目的的个体副业是整个政策最重要的附属产物，而核心仍然是将土地承包到家家户户。

当承包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确定的年限，承包只是临时性的。后来规定承包年限为 3 年。到现在土地承包期为 15 年，并且有继承权。如果承包者在 15 年内就去世了，其子女能继承所承包的土地接着执行合同。这一制度发端于安徽，在那里，合同规定十分简单：承包农民交一定的现金给当地政府，按规定价格出售商定数量的粮食给国家，再缴纳基本税款，其余的就全部归其个人所有。收成不用移交了，因而这一体系也没有什么变动，更高当局只需要掌握总产量。

其它的形式就要复杂得多，农民往往有义务将粮食移交给村级组织。这些粮食可以挣得工分，承包者得回相应份额的粮食，每年还能分发一两次现金。不过还有一种形式是，只有部分土地承包出去，公社保留其余的土地，每个农民都要到这部分公共土地上劳动同样的天数。当然哪儿的土地能用来承包就是可变的。有时承包的土地面积由家庭成员数决定，有时则是家庭内壮劳力的个数来决定。主要的变动就是以家庭为单个生产单位而将资源承包给它们。

从官方观点来看，承包制的重要优势在于能够自动解决按劳分配的问题。每个家庭都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劳动，不管它的成员种植什么都表现为他们投入的劳动量。这一体系不需要多少计划，也不用怎么组织和领导。不用记帐了，也不用开多少会了，每个家庭自顾自就可以了。同样，除了承包者自己没有人需要为他/她的贫困负责。当局将土地等资源简单分给个体农户，并告诉他们自己来致富，如果五年之内他们还是不能富裕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的确，也没有人能怪罪得了当局的掌权者。

鼓励分工

承包是与一个很开放的市场同步发展的，这很重要。比如说，一个承包户可能要按照合同上交一

⁸ 这篇文章是作者 1984 年在伦敦的一次演讲的删节译本，1985 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第 113 期上

定的谷物，但他自己就不一定要种这些谷物了：他可以种棉花或者别的任何他认为更有利可图的农作物，再从其它承包者那里购买谷物交给政府来兑现合同。在某些地方这种情况变得相当普遍，以至于谷物生产迅速下降，当局不得不制定新的法令来要求人们自己种植谷物。

市场刺激了所有门类的小副业。在引导工作很差的公社体制下，手工业和专业分工是被人为阻碍了的。人们不能自由到市场上交换。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销路，他们就只能停止生产。现在有了开放程度很高的市场，人们能够开始制造所有他们想到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销路。因此人们在各行各业有了专业化分工，包括很奇怪的门类，比如有个农民就养殖蝎子。很多人去养蜂。中国是一块高度多样化的土地，有着各种各样的资源，她的人民有着非凡的聪明才智。虽然我并不认为合作社体制肯定会扼杀这种智慧——在很多场合它甚至也鼓励这一点——但是新的政策的确大大释放了这种个人创造力。

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人们也有了创立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个人或合作企业的自由。今天股份化工业合作社状况已经好多了，很多人都合资创办类似于股份公司的企业。与此同时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权利也得到发展。起初政府限制私人企业雇工的人数。有一段时间规定可以雇佣 6 到 8 个员工。后来业主被允许雇佣足够多的人数，雇佣期也不设限制，前提是雇工要是家族成员——这并不算一个严厉的限制，因为在中国很多公社里每个人的姓是相同的，都称得上亲戚。现在即便这样的限制也不起作用了，雇工实际上并没受到约束。

市场交易的巨大增长为众多的商贩和售货员提供了收入。你能看到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年内不曾出现过的情形：大街上成年男子前面摆着三个苹果或四个梨出售。就在五年以前你都不可能在中国看到壮劳力做这样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商贩进行管制，并且为经商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以将它区别于投机分子。一种定义指出，销售的货物足够用一辆自行车装下可以算作商贩而不是投机分子，但是用火车或者卡车装运货物就是投机倒把。如今，这些都成为往事了。

最后，人们现在有了私人购买和拥有生产设备的权利，比如拖拉机或普通机械、卡车、加工器材等等。这种所有制已经相当普遍。

中国大概有 98% 的土地被承包了出去，甚至大部分国家农场也是。以前建立国家农场是为了作现代化生产的示范园或者就是简单地开垦荒地。在东北，在处女地上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曾经是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许多国家农场不再作为一个单一的管理单位：它们的资源都很简单地出租给全体职工了，承包者可以随意种植庄稼，只要按“承包价”缴纳租金就行，这些收来的租金就算作农场的利润。

经济成果

当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谷物增产量并没有像所声称的那样多的时候，很明显谷物供应并不短缺。自由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正在下降并接近国家的粮价，如果谷物出现大量短缺的话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另外，一些人正饲养着大量的牲畜——每户家庭 12,000 只鸡或者 125 只猪——如果没有谷物的话他们是做不到的。玉米、高粱等人们不喜欢吃的粗粮的形势非常好。在过去大部分人不得不吃这些粗粮，但是现在他们吃小麦和大米并且给牲畜喂养更多的粗粮。

但是有一些地方谷物产量事实上已经出现大幅度下降，农民改做其他的事情，或者甚至抛弃土地。例如，在湖南的一些地方，他们让土地撂荒，到外面去找一些其他的工作。

与此同时，经济作物已经开始增加，棉花产量已经翻了一番，油料作物以及其他的特种作物例如水果和蔬菜已经显示出重大的增长。在中国，过去好的合作社和现在出色的个体农民能够达到的产量已经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或者已经跟欧洲和美国的农民一样高。所以不会有一些快速的途径让产量翻倍、再翻倍。

但是当这些好的结果被广泛宣传的同时，其他的结果却没被很好的了解。其中之一，非常突出的，就是土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对将来实现现代化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在集体体制下土地是按照非常实用的方式连在一块儿的。土地是宽阔的，当现代化有了这个自然的基础，在中国，机械设备（如果他们有的话）将很容易在土地上工作。现在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跟改革之前比起来，土地已经被分得细碎的多了。

这一过程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土地上的家庭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努力让承包制公平。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都得到一份同等质量的土地。每一个家庭也会得到一块近地和

一块远地，这样每一块大片的田地被分割成无数块细小的田地。由于原来未分的土地是宽广的，而通往每一块小田地的道路又是必需的，政府给每一个家庭一块长而窄的土地当田埂，连接一条条道路。如果土地是正方形的倒好办，但所有这些小块的土地引起了巨大的困难。许多田窄小到连手推车都不能通过，这意味着每一样东西都不得不用扁担挑来挑去。而且，田埂的宽窄和彼此之间的欺诈引起了无休止的争吵。“我从你那里抢了一垅沟，你又从我这里抢了一垅沟。”法庭被有关土地使用、灌溉权利之类问题的诉讼弄得焦头烂额。

土地分割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谷物产量，因为农民仍然用锄头耕种土地，毕竟一块土地是一码宽还是 10 英亩大对锄头农业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除非它包括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只是更努力地工作，工作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农业有一个总体的加速，并且这部分超额的努力使产量保持平稳，甚至增加。

资源的破坏

对于集体财产（资源）的长期的破坏是新政策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许多情况下，集体财产简简单单就被断送，而卖给了个人；当集体的财产已经确定要被出售而无法保留的时候，人们就会来拆除而拿走曾经属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包括总部（总指挥部）、学校、任何公共的机器等等。他们（拆毁了房屋），拿走了窗框，门板，房顶的横梁。马场（Horse Square）公社在靠近张庄公社的地方有一个大的猪场。我们拍摄了它被拆除后的场景。它不是一个值得下手的伟大建筑，没有人能从获得几根檩木而致富，但是被人们清洗过之后，它还是变成了一片杂乱的废墟。当张庄公社不得不实行同样的政策时，公社领导秘密进行会谈决定解决办法，同时派民兵站岗，守住集体财产，这样才避免了破坏。

破坏还以牺牲环境的方式剧烈增长着。大量的树木被砍伐，就在北京周边，甚至电话杆电线杆，也被砍倒了，就是为了获得木材，为了满足城市中存在的巨大的家具市场的需要。在北京北面的山区所有的土地也都被开垦了，甚至 45° 的斜坡也开了荒种了地。

有四个夏天，我曾经做同一辆火车从北京北上，但我从没有见过山区像如今这样被开发利用。坡地上曾经或许有过过度放牧，但至少没有被开垦。如果那里还有灌木，就还会有一些柴火可以收割，但是现在巨大的地区都被锄头开发出来，种上了庄稼。这或许还可以持续二到三年，那时坡地就被开垦完了。坡地上的土壤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其他那些本不该开垦而却已经种上了庄稼的土地会受的风的侵蚀。房价在上涨，坟墓出现在良田的中间。人们像过去一样把死人埋在田地里，毫无顾忌，如同土地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当你对这些破坏提出疑问时，人们告诉你这是一个制止滥用的问题，解决之道在于新的法律，在于治安员提高警惕。但是一些人已经变得这么富裕，他们有能力反抗法律，收买执法者。

雇佣劳动

新政策的整个地推行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变为现实。但是既然一个家庭能够承包更多的生产资料，甚至比他们自力所能耕种的更多的土地，他们就能雇佣他人来工作。人们曾颇为羡慕的向我讲起山西北部的那个人承包了 750 亩（大于 100 英亩）土地的事情。我说他一定有很多机械，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没有，他没有任何机械，他借助于雇佣劳动。在太原北部的一个生产队，一对夫妇承包了 80 亩（12 英亩）稻田，加上近 10 英亩旱田，他们也同样雇佣别人劳动。（注：1 英亩 = 6.07 亩）

新的个体企业的规模在不断地增长。报纸登发了中国第一个买车的农民的图片，是一个妇女。她的企业生产鸡蛋，而且她自己养鸡并营销鸡蛋。从数字上很清楚就可以知道她至少养了 12,000 只鸡，她的家人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我估计她要雇佣 10 到 15 人在他到企业里做工。所以，她雇佣的人数已经不少。

新闻提及的另一个农民是制造香肠的。他家有四口人。但是他的香肠生意增长得这么快，几个月前他雇佣了 4 个熟练工人，每一个工人还带一个学徒。根据过去的说法，如果一个家庭雇佣了比家里劳动力更多的人，它就是一个富农家庭。

在最初，当然，承包者维持着旧有的关系，他付给工人与原来的工分相等的工资，自己也拿适度

的一份作为自己的报酬。但是没有人控制进一步的发展。张庄公社的六个果园（gardens）——每个大约六英亩，曾经有 15 个人共同劳动分享收入——被承包给最高的出价人，然后每个承包者雇佣了 15 个人来劳动，但是工资却比标准低得多。

另外，中间商或者代理人也大量出现了。这些人控制着资源与运输。例如，有一个人负责长弓公社水泥厂所有水泥的运出与所有材料的运入。他租用大车（carts）来运送货物。如果车是当地的，就是说是本村村民的，每车他能得到 10% 的收入；如果车不是本地的，他得到 20%。像这样的人就正在发大财。

权威们声称农民的收入现在已经加倍了——这是很大的功绩。但是数字本身并没有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很明显这一段时期物价也在剧烈的上涨，——城里的人正在抱怨食品的价格贵多了。

所有这一切包含的不仅仅是收入的差别，而更是阶级的分化。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会占据优势地位，并最终剥削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所谓的自由市场受到推崇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麻烦。有一种情况，接管了西红柿市场的一群人不许其他的农民到市场上售卖西红柿，把他们赶到了街头巷尾，而后他们自己则直接在市场上售卖。我不确定这种强力手段有多普遍，但是它们是丑陋的，而且还在扩张。

任何不对承包资产进行限制的体系最终不会按劳动量分配报酬。发展的结果是按承包生产资料的数量进行分配的体系。资本的控制作用很快就会超过劳动。

可怕的风俗

新的体制也从根本上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个体制表现出的旧的经济关系或者转向传统经济关系越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就复苏越多。去年八月在张庄两个农村老人的死亡和安葬让我们看到了家庭可怖的一面。通常，人们尽可能快地埋葬死者，尤其是在八月！但是现在如果家里死了人，须向村里的算命先生或是“先知”求得一个适合安葬的吉日。一个死者埋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埋都很重要，星象是不能错的。而这个先知却是村里那个曾被认为是白痴的人。他们称呼他为“八毛”，也就是 8 个一角硬币的意思（1 元就是 10 个 1 角硬币，8 个表示头脑不正常）。这个人不知怎么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本和神谕有关的书，现在他就是村里的首席先知了。

这个家伙告诉人们死人应该在八天后下葬。在下葬的日子——不到晚上七点钟，大约太阳落山的时辰也是不能下葬的——，他们抬着棺材在村子的各个地方展示，还要奏一整天的乐。他们雇佣一个送丧队，规模越大就越显得这个家族有威望，也算是死人的更大的荣耀。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尸体发出恶臭，人们无法在近前演奏，所以他们把棺材摆在一百码以外的街道上。一方面是活人的奏乐折腾，一方面腐水从棺材里面滴出来，在街上形成一个泥坑，苍蝇在四处乱飞。当表演两个小时后，他们去移动棺材时，不得不先泼下高粱酒（sorghum liquor）除去臭味，赶走苍蝇。然后，他们沿大街抬一段距离，放下后再演奏二个小时——又留下了一个恶臭尸水的泥坑。1983 年夏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

我还看到许多老式（是否译为“古旧”）的消遣方式的复活。两三年前，有 700 万戏剧业余爱好者，现在已经下降到 250 万。但是各种各样的杂耍大大增加起来，其中多数是相当低级趣味的，像把一条蛇从鼻孔塞进去从口里拔出来，带有黄色性质的舞蹈，诸如此类。农村的风俗文化方面真是发生了大倒退。

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

新政策带来的一种令我特别感兴趣的现象是劳动力大量脱离农业。我曾经有很长时间为机械化争辩，但过去几年人们总是说：“我们的人口这么多，怎么可能实现机械化？”依我的观点当然是应该从像张庄那样繁荣而且地处城郊的地方开始机械化，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容易找到别的工作。以此开始，再逐步解决技术问题。逐渐推广的话，刚开始能有 20% 做到，然后会增加 10%，接着发展另外 20%，类似可以搞很多年。但是没有人愿意听这样的意见。现在责任制在一年中已经让 30% 的人即那些没有承包的离开了土地。在这 30% 当中，1984 年 1 月只有一半的人找到了别的事做，这样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转移，但并非技术进步，而完全是社会经济政策造成了这种状况。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可行的机械化计划能做到这一点。人们说中国有 3 亿人忙碌在土地上。这个数字

的三分之一是 1 亿，当中有一半也就是 5000 万失业。他们都在哪里呢？当然他们是靠其他的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生活。他们没有外出找工作，因此这种转移就被掩盖了。

所有这些都让人回想起中国在五十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计划当中的一些问题：混合经济在某些地区鼓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产生了两极分化和劳动人口转移等问题。当时的解决办法是过渡到集体农业。现在政府在重建一个混合经济体，其中私有成分在不断增长。它相当有活力，而我认为也很不稳定。问题在于：它将往哪个方向去？

草原现状⁹



草原现状

许多专业观察者一致认为中国西北地区的草原、沙地、荒漠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并且正在急剧恶化。牧场变成了沙丘，固定沙丘变成了移动沙丘，老沙漠区的移动沙丘在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专家估算从 1950 年至今这个地区的植被数量已经减半，而牲畜数量增加为原来的 4 倍。逐渐增加的失衡状态会定期地造成一些灾难，如 1977 年锡林浩特损失了 200 万头牲畜，1984 年整个草原地区丧失牲畜 1000 万头。许多政府官员、专家和牧民对这些事情非常关注，争论着事情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下面将阐述一下我对目前草原情形的一些论断。我在翁牛特旗连续呆了五年，致力于建设牧场示范中心的工作，我的论断将建立在这些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聚焦过度放牧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什么是草场恶化、沙漠化加剧的主要原因呢？显而易见，这个原因是人为的——草场因为过度放牧而不堪重负。由于过度放牧，土地现在已经不堪重负了，而过度放牧是由于牲畜过多，过多的牲畜竞争着过少的土地上的过少的植被。

一些人试图将这一问题归咎于气候的不利的改变，荒地的开垦、药草的采集、破坏性的干草制作方法、不断增多的草原啮齿动物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因素。气候的恶化可能恰恰是这个地区的环境恶化导致的，土地的开垦是一个因素，但是在整个地区它所占的比例很小（在锡林浩特小于 3%）；药草和低水平的干草制作也同样不是主要因素。我们决不能让这些问题带来的损害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主要问题——过度放牧上转移掉。一旦承载量和资源处于平衡状态，其他所有问题将会变得很容易解决。

为了解决过度放牧这一主要问题，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首先，家畜养殖的观念必须改变。牧民必须意识到牧场和植被才是他们的主要资源，而不是牧群。实际上，牧群相当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就像农民种下的种子一样。其次，牲畜的数量必须减少到适合牧场的承受能力，同时放牧必须被好好的管理以保护草场。最后，牧场本身的面积必须一步步的增加。

关键措施是减少牲畜数量。为了降低牲畜数量，显然必须迅速的、大规模的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认识只能逐渐变化；土地的改良也只能缓慢进行，而且还需要一大笔资金。牧民们现在应该抓住关键环节，那就是减少牲畜数量。

事实上，没有牧群数量的减少，大多数的牧场建设措施都将失败。饥饿的牛羊冲破栅栏，吃掉树皮和落叶，破坏幼苗，毁坏沙丘中的灌木丛。但是牧群数量的减少不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牲畜的数量不易计算。一头母牛相当于五到六只羊，一只绵羊相当于一只半山羊。如果我们通过杀掉山羊和马的方法减少牧群的数量（就像翁牛特旗做的那样），然后取而代之以绵羊和牛。总数量可能下降了，但牧草需求量可能会升高。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不仅仅要考虑牲畜的数量，而且要考虑牲畜的个体（比如一只成熟的羊），把一只成年绵羊作为标准，根据不同种类、不同级别牲畜的饲养要求来估计一切。大多数专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许多讨论和报告并没有把这些不同之处加以考虑。

如果我们减少牲畜数量（也就是牲畜个体），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牧民们是否能够维持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答案是：牲畜的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实际上，如果我们使牲畜数量和土地资源相适应，并进行良好的管理，我们就能使产出（牲畜的出售和畜产品的出售）在质和

⁹这篇文章最初于 1985 年 8 月在《内蒙古社科杂志》（Inner Mongol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上发表，后经修改。

量来两方面增加，从而使收入提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使他们的收入翻一番。

改变管理制度

好的管理只需要一点点投资，或者不需要投资。这首先需要认识到土地是主要资源，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破坏植被或者改善植被的条件下，利用单位面积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肉、羊毛、牛奶或者其他动物产品。好的管理意味着：首先要使牲畜数量降低到土地能承载的水平。具体的数目随着牲畜结构（即母畜，替代畜和催肥畜的比例）而变化，从而使饲料投入最小，产出最大。这里，关键的工作是让每头动物都高产，并且一旦他们长成且做好准备，就把他们送到市场上销售，而不是让他们越过非生产性的冬季和其他额外的季节。如果有适当的牛群结构，将有 50% 的母牛生产的牛肉提高到目前的两倍；如果有适当的羊群结构，数量上有所减少的羊生产的羊肉却能达到目前的 3 倍，羊毛产量能提高 50%。此外，好的管理意味着实行明智的放牧方法。在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这很可能意味着某种延期放牧，而非通常的循环放牧。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什么样的牛群/羊群结构是适当的。在一个既定地区要进行许多研究工作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下例来自翁牛特旗，它阐明了一般原理。表 1 中将一个实际的畜群结构和一个推荐的畜群结构进行了比较，在这里认为一头牛长到了 30 个月就被卖掉。这些表格是由新西兰专家彼得·哈里斯研究出来的。

表 1 实际和潜在可行的牛群结构

动物	目前的百分数		改良后的百分数	
母牛	38	售出的每头牛的能量成本 300-550*10 ³ 兆焦耳 出售率 4-8%	42	售出的每头牛的能量成本 115-130*10 ³ 兆焦耳 出售率 29-31%
替代牛	45		16	
催肥牛	17		42	

表 2 是一个现行的羊群结构和一个推荐的羊群结构的比较。

表 2 实际的和潜在可行的羊群结构

动物	目前的百分数		改良后的百分数	
毛羊	26	售出的每只羊的能量成本： 58*10 ³ 兆焦耳 出售每千克羊毛的能量成本： 1.4*10 ³ 兆焦耳 出售率 6%	56	售出的每只羊的能量成本 18*10 ³ 兆焦耳 出售每千克羊毛的能量成本 1.0*10 ³ 兆焦耳 出售率 22%
替代羊	30		16	
母羊	17 (总和不是 100)		28	

在饲料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紧紧依靠调整牛群和羊群的结构，翁牛特旗每年有望增加的肉类和羊毛的销售量如下：

表 3 实际的和潜在的肉类及羊毛销售量

	牛群/羊群总量	销售量	牛群/羊群总量	销售量
牛	3225	140-270	130 (应该是 1300 或 1030) -1405	385-485
羊	5320	325	4926	1084
	14 吨羊毛		20.2 吨羊毛	

为了确定适应于一个地区的饲养模式需要进行控制性试验。一般说来，短时间循环饲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是不适用的，因为牧草和豆类作物都恢复得很缓慢。这种情况下，牧民们更喜欢延期放牧。一种办法是将一大片土地（如总量的 1/3）在春夏两季留出，到了秋季，这部分成熟了，在上面放牧，而其余 2/3 的土地休牧。第二年再把另外的 1/3 留出，以此类推，每年都让 1/3 的土地休牧。这种模式下，如果不过度放牧的话，整个地区的牧草都可以进行更新，没有必要进行播种或采取其他措施。

既然这些措施如此合情合理，而且实施起来几乎没有成本（如果放牧时牲畜有人照看，甚至篱笆也是不需要的——尽管篱笆会起一些作用），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很合理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措施没

有被广泛采用呢？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在过去牧草是充足的，是一种类似于空气和水的充足资源。而财富仅仅通过个人拥有的牲畜来测量，这就导致片面追求牲畜数量的习惯。其次，由于寒冷的冬季和可能造成的死亡率，牧民们习惯上尽量使手头有大量的老牛，与怀孕了的母牛和一岁的小牛不同，老牛不再进行生长发育或者繁殖，因此它们能够经受住饥饿和寒冷。尽管这些老牛在冬春两季把夏秋两季增加的大部分东西都损耗掉了，因此浪费了大量的草料，但是它们为牧民们提供了保险，如果需要一些紧急的花销——生病、婚丧等等，他们可以把老牛卖掉。最后，价格体系也促使人们养了一些年迈的牲畜。在销售市场上，一头牛的体重越重，牛的单位重量的价格就越高；所有市场上质量不高的肉和高质量的肉具有同类价格，所以年轻的、刚刚长成的动物是没有优势的。还有，如果一定时期内出现类似于中国目前发生的物价上涨，把动物留在手头等待下一轮的涨价当然是有利可图的。

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大部分牧民仍旧用传统方式从事畜牧业，保持着这种不利于资源优化和浪费大量稀有草料的畜群结构。但是，在优化的结构中，牧民们有望获得更高的牲畜存活率。随着牲畜个体的减少，畜群结构的改进，尽管仍旧需要对一岁的小畜和成熟的母畜进行特殊照料，但与以前相比它们能更好的越冬而不掉膘。因为畜群结构整体上年轻化，储存的干草和青贮饲料就能持续用更长时间，进而降低死亡率。对于这种结构，多了一种冒险。也许政府可以通过设置牲畜保险的方式，为那些愿意采用这种新饲养模式的牧民提供保障。

改变价格体制

政府对改善草原形势能够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很可能是调整价格政策。这个工作不需要成本，但是可能是扭转形式的一个主要因素。两个建议：(a) 所有的小牛，例如第一年就断奶被卖掉的牛犊，应该得到价格补贴；(b) 在 30 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市场重量的发育良好的牛得到价格补贴。年迈的牲畜，不管其体重多少，应该进行低价销售。和销售市场上现行的计价方法不同，对那些与质量和快速生长无关的额外的重量不应该付报酬。

这样的价格变动将会鼓励人们把刚断奶的小牲畜作为饲养畜卖到别处。鼓励另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已经催肥的牲畜在第三个冬季前卖掉，从而维持一种高效的畜群结构。1984 年，许多牧民告诉杨先生（澳大利亚畜牧专家），如果小畜价格提升 50%，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小牲畜卖掉，而不是让他们在营养不良的状态下越冬。对于绵羊来说，给刚长成的肥的羔羊和高出毛率的羊一个优厚的价位，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对于政府来说，在目前情况下，一个新的价格政策是实施新的畜群结构的最高效，最合理，最简单的办法。这会对畜牧业形成一个巨大的推动，有利于土地破坏的停止，为肉类生产，特别是牛肉生产的两段制打下基础。

在美国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大的养牛场都在实行一种两段制。他们只饲养母牛，饲养断奶的小牛或一岁的小牛是为了卖给他们本州或其他州那些粮食过剩的地区。这种对小牛和育肥的牛给予优厚价格的价格机制鼓励他们这样做。在粮食过剩地区，牛长到 18~30 个月就被催肥出售。这种体制下，每个地区都集中进行适合本地区的生产，分别作不同的工作。山区没有来自催肥牲口的压力，农场也为自己的粮食找到了出路。在内布拉斯加州，这种体制的两个阶段并行存在：在沙岗地区，牧场主养殖母牛和小牛；而农场主在普拉特河峡谷灌溉区种植谷物，然后把他们当作从沙岗区买来的牲畜的饲料。过剩的内布拉斯加牲畜销往爱荷华州、伊利诺斯州，甚至向东远销到宾西法尼亚州。

在一个好的价格体制的帮助下，非常有利于中国向同样的方向进行发展。来自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的小牛可以到河谷地区（例如，沿着翁牛特旗的锡拉木伦河下游的灌溉平地），这些地区的灌溉工程使粮食和青贮饲料的储备成为可能。在黑龙江、辽宁、河北可能还有山西（还是陕西？）的粮食过剩区可以设定一些饲养点，这一种畜牧业结构可以使草原上的压力大大降低，只要价格合理，它也会受到牧民们的欢迎。

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好的措施，例如通过诸如轮休牧场、保护带、空中播种、增加肥料的应用、库伦（围水而建的居住点）的广泛传播、增加青贮饲料作物种植面积之类的措施，这些建议侧重的不是减少多少畜群，而是提高整个地区的生产力。只要牲畜数量继续处于超载状态，提高土地生产力的任何措施都很难执行。像播种（不管是空中播种还是地面播种）、固定沙丘、植树、作物围墙等大多

数措施，如果要起作用，都需要所有牲畜长期不靠近才行。从这些地方排除出去的畜群就会给其余的土地带来额外压力，从而使破坏速度加快。一块地方的恢复要以其他地方的爆炸和破坏为代价。许多情况下，牧民或畜群会突破篱笆，侵占那些需要保护的地区，在植被来不及自我修复之前，就把那样凡是有饲料的地方都给抢占了。

其实，一旦牲畜数达到和资源相平衡的程度，并且有良好的放牧制度，所有这些区域重建措施就能提高生产力，从而能使牲畜数有适量的增加。显然，区域建设需要和平衡的饲养速度和良好的牧草管理相结合，否则很容易失败。当人们穿过草原时，经常能够看到许多区域建设的努力都这样毁于一旦了。

通常的一些误解

一些看似合理的措施往往是反生产力的。比如说，灌溉地区提供的越冬饲料增加，不会自动导致存栏牲畜的降低和土地压力的降低。很多情况下，随着青贮饲料以某种形式储存起来，牧民们就会把牲畜的头数增加到新的饲料供给的底限，甚至导致土地超负荷更严重。新的饲料地不应该被当成是畜群增加到极限的借口，反之，收获的作物应该被当作土地增加的承载力，当作寒冬的应急储存，或者是被赶出这个区域的牛的青贮饲料，使他们不再返回去吃草。

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在草原植被生长期，土地上不会出现超载问题，只有在作物生长期以前的春季或生长期以后的秋季，过度放牧才会带来危害。其实这种理论和科学的例证是相矛盾的。在作物生长季节，如果剪割过于频繁，会给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害或破坏，因为它们需要时间来在根部储存养分，它们需要周期性的结实和育种。无论在生长期，还是在生长期以前，生长期以后，我们都不能过度放牧。否则，我们只能认为不这么想的人对植物生理学缺乏深入了解。

还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只有本地的牲畜改良品种以后，才能既减少数量又不降低收入。这中想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改良的品种与本地品种比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本地品种在当地营养不足条件下由于基因的潜在特质而生长得很好。使牲畜数降到与资源平衡的水平有利于迅速改良当地品种的性能。不是基因构成而是饲养水平低和营养不良成为限制牲畜产量提高的主要因素，这里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在目前草原上残酷的生存条件下，改良的品种很可能还不如当地品种。高产牲畜不习惯于艰苦环境，不能像本地牲畜一样经受寒冷和饥饿。今天，需要优先通过减少数量和调整畜群结构来改善营养状况。这样会为品种改良打下牢固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所有改良品种的努力都是无用的，这里只是想指出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善营养。

责任制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提高了亿万家庭耕作的积极性，但目前，在很多草原上存在的却是一种最糟糕的组合方法——私人所有的牧群在公共所有的草地上吃草。没有人会去照料这些土地，因为没有人会对它负责。每个人都因为土地是公共的又是免费的，企图养更多的动物，从而从土地上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是但凡有饲料的地方牧民们都有恃无恐地进行争夺，这等于对植被发动了总进军。这加速了对土地的破坏。

为了抵制对草场破坏，政府官员鼓吹着应该把土地和畜群都承包给个人。毫无疑问，对土地承担责任会使牧民们能比现在更好的关注土地。但是我可以预见到很多问题。为了保证别人不进入自己的土地，多数人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地围起来。在一些平地 and 微微起伏的平原地区是可行的，但对于多山地区是不适用的。在多数地方，每家可以利用的土地平均只有 1-2 千亩，有些地方可以到 6 千亩。把土地分成这种小尺寸的方形或矩形会使资源的合理利用变得困难。高地和低地的放牧时间是不同的，不同种类植被的土地放牧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在翁牛特旗，沼泽地和起伏的草地连在一起，草地中还间杂着一座座被灌木掩映的沙丘，这要求每种类型的土地每家都有一些，加之沙丘地有近有远。很难想象有一种合理的划分方式能满足这些各式各样的要求。

在山地，牲畜总爱沿着篱笆跑，从而形成了一些在下雨时容易受到侵蚀的小道 (On hill land, stock tend to run fence lines making paths that erode badly when pounded by rain)。大规模地修筑篱笆成本很高，更别提它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这样会完全改变个区域的特点，使开阔的草原变成篱笆里的梦魇。更进一步，单个家庭能否管理好他们的土地也是一个未知数。在美国，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处于贪婪，或者兼而有之，许多农场主破坏了农场。难道人们能期望蒙古牧民有多么不同吗？

牧民组成的自愿合作组也许能够提供一种更切实有效的方法。如果八户、十户或更多的家庭联合起来，每个围起来的区域会有 1 万亩、2 万亩甚至 6 万亩。这样在篱笆墙内进行季节性放牧就成为可能。与单个家庭的土地都用篱笆围起来相比，每公顷土地或每头牲畜上投入的成本会大大减少。看来牧场更适合小规模联合，而不是完全的个体经营。

减少汉族移民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人口的增加使得牲畜数需要增加。如果居民只有蒙古族人，草原退化问题将不会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自解放以来的 39 年间，蒙古族人口增加了不到 50%，而整个地区的总人口增加到了原来的 5 倍。这个巨大的数字代表着汉族迁入者和汉族居民，其中包括许多从农业转移到畜牧业的汉族人。他们放牧牛羊，在这块超载的土地上和当地的蒙古居民争夺空间，许多蒙古族人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汉族迁入者，他们能够合理的使用这块土地。这些看法是有事实依据的，确实应该采取措施制止这里的汉族居民进一步牧民化。汉族人可以从事其他许多行业来为内蒙古的发展做出贡献。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对新牧民的进入实行压制政策是有意义的举措。农民牧民化运动的背后是由于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数牧民的生活水平比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但是如果这场运动不被制止，草原地区将很快变得和中国的其他贫困地区一样贫穷。

解读改革：1986 年农村的变化¹⁰

大 回 溯 解读改革：农村 的变化 1986

1986 年，在中国工作了 5 个月以后，我觉得没有去年的稳定了。整个国家看起来很不稳定，问题的涉及面很大也很紧迫，而且政府的处理能力变小了。

最关键的弱点在于对外贸易。去年底或者今年初，中央决定一些城市或者整个省有权利自行处理对外贸易。结果导致了中央失去了对整个过程的控制，省和市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道，进口暴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花去了国家半数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大量商品是从日本进口的：小汽车、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它们横扫整个国家，对大量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威胁。人们开始谈论“日本对中国的第二次侵略”。

此前对外贸易平衡一直是有利于中国的，现在突然反过来了，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逆差。严重的腐败加剧了这个问题，例如海南岛的事件，当地官员以高美元汇率进口了数千辆小货车，然后以更高的令人吃惊的价格转手卖给其它地方，为海南和他们自己创造了大量的非法利益。然而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通货膨胀还在继续，导致了大量的物价上涨，特别是粮食、蔬菜和肉类的价格。拿固定工资的城市居民开始发现生计的维持越来越困难了。

九月份，北京的学生终于上街了。天安门出现了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政府快速反应，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堵住了清华和其他大学的大门，阻止了首都更大规模的上街抗议。但是在其他省，由于年轻人之间联络起来很方便，很多城市有学生游行。

贸易问题

表面上看，示威主要目的是反日。直接的原因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那是他们供奉军人、包括被中国认为是战争犯的人。此举震动了那些对于日本跟军事复辟相关的行为非常敏感的中国人。有人重提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以贸易和投资开始的。所以第一个口号是“打倒日货洪流”或者“抵抗日货泛滥”。然而很快矛头转向了国内的问题，从“反通货膨胀”、“反腐败”到尖锐得多的“政府无能”、“打倒新李鸿章”。

李鸿章是清政府的总督，他参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引进外商兴建现代工厂，组建了一支所谓现代的陆军和海军，1895 年对日战争失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称邓为新李鸿章首先是指责他对于日本的处理：中日贸易，对日贸易逆差，进口商品和引进日资。但一个政府失去了对进口和货币储备的控制能力的时候，理所当然的会被指责为无能，特别是在中国，有过 150 年被列强凌辱的历史。

贸易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以大量的原料输出来弥补进口赤字。山西西北部的新煤矿将由阿曼德·哈默公司（Armand Hammer）和中国政府联合开采，在山西北部 and 内蒙的一些大煤田也被列为开采的对象，大量的石油也有同样的趋势。这对许多人敲起了警钟，害怕中国走向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大量廉价的宝贵原料来换取昂贵的进口工业品，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不需要太多的贸易赤字就可以将中国置于与尼日利亚相同的境地——深深陷于债务危机的泥潭中。

我听到了很多中国工业的故事，他们由于国家进口有补助的进口商品而被削弱，然而这些进口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从国外的，而不是因为它们优于国产货。我妹妹和她的丈夫¹¹花了数年时间研制牛奶设备。现在他们终于成功了，但是所做的努力现在却很危险，因为丹麦、日本和德国在这方面都有很强的出口驱动。中国政府机关更愿意买外国的产品，这就切断了自己人民的喉咙。我也听说了深圳本来

¹⁰ 本文是 1986 年为中国农业部准备的一份报告的修订版。

¹¹ 寒春、阳早夫妇 1982 年到北京昌平的小王庄农场，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机械化养牛的尝试。

准备向成都的一家公司购买计算机，后来向意大利买了，就因为这是外国的。于是成都的那间公司境况就变得非常的差。

在汽车工业方面，国外的优势非常明显。没有人想买中国的汽车。每个官员都想买一辆日本的小车好与自己的同僚平起平坐。我的妹夫曾经担心过在北京饭店前面找不到自己的小车和司机。但我告诉他，在数百辆日本制造的汽车当中，他单位的那辆是唯一的一辆上海制造的。在哪里他都可以很容易的辨认出来。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他的单位如此落后呢？因为它是农村的。

知情人士说很多不良贸易正在进行着。如果一个外国公司不能使政府接受合同购买他们的产品，他们可以下到省市级的单位完成未果的交易。就这样他们卖给了中国大量劣质设备和过时技术。由于对高技术的狂热，任何称为高技术的都能卖得很好，即使它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或者中国本来就有了更好的技术。

农民减负

农业方面，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正在发生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趋势表明，现在在邓领导下恢复的、所谓的新发展正是毛的时候出现过而且是邓当时最尖锐的批评过的。例如，大量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数百万的农民脱离农田而进入工业和下海经商，正如大跃进期间，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一样。

由于土地劳动力投入的回报缓慢，没有人想留在家中的土地里。集体不得不使用工业的所得来补贴农业，导致了财富上的巨大的平调（leveling and transferring）。这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粗暴的违反。人们都说合作化肯定是会违反这个原则的，但现在突然之间在私有化了的农村集体中，大量从承包的土地和副业企业的所得都被用于补贴给那些愿意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如果这不是平调（leveling and transferring），那又该是什么呢？我们又回到了“大锅饭”，这本是对合作化的嘲笑。情况改变的越来越多，但越来越多的却还是同样的。

集体的农业补贴的总量并不小。在张庄的农村，我花了四天时间，那里的承包者可以从每亩土地上获得 60 元，这也包括了免费的耕犁、化肥、种子、害虫控制的因素，以及国家的优惠收购价（每斤在国家定价基础上的补贴 5 分钱）。这些加起来大概每英亩 120 美元（官方汇率），比美国政府为各种造成减产的农业计划所支付的补贴还要多。整个国家总的补贴的数字肯定是巨大的，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含在收购价里面的各种补贴，尽管 1980 年就已经提了 20% 的价格。我以前认为虽然像日本这种工业国家会补贴国内的粮食价格，但这是不会发生在中国的，可现在很明显的是这发生了。在机械化上哪怕一点点的提高都会使得这种补贴变得不必要的，但是只要农业还是以锄头为主，用镰刀收割的话，农业都不得不需要补贴，因为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是很重要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坏事情。数百万的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如果能够进入其他的生产领域这是一件好事情。劳动力的抽调、找人帮忙的困难、工资的急剧增长，都为机械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是此问题唯一的长远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新的政权并没有像原来的那样准备了农业所需的机械，因此劳动力的问题由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来解决，大量的人从贫瘠的山地地区到其他地方做一些粗重的体力活，按日计工，并在农忙之后带着少量的钱重回家中。

这个秋天，在广东一个收割劳力的价格是每天 6 元，还没包括免费的饭食、酒水和香烟等雇佣方必须提供的。因为每亩水稻需要一个农民 4 天的时间收割，现金就要花掉差不多 25 元。25 元每亩也就是 150 元每英亩（官方汇率的 50 美金，市场汇率的 25 美金），这仅仅是用于收割的成本，还没有提到其他的。这大大超过了美国使用机械收割的成本。所有这一切是由于副业和工业发展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上升。

四川劳动力的成本去年秋天是每天 4 元，黑龙江今年秋天是每天 10 元，山西今年秋天是每天 3 - 5 元——但是妇女只有每天 1.5 元。这些与过去对比有了很大的增长，也增加了对于机械化的需求而不是移动的劳动力市场，这其实是肥沃地区农民对贫瘠地区农民的一种剥削。不幸的是，高层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个问题的。

一个仍然正常运行的集体经济

为了看些不同东西，我们去了一个仿照张庄乡的机械化而建立、并且变得繁荣的村庄——王公庄，它的发展没有被新的农业政策打断。每当当局者下来找他们（强迫分田）的时候，所有的公社领导都藏起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分田之风刮过一年到两年之后。现在王公庄是中国合作化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村庄之一，镇区领导现在在动员其它的村庄也来向王公庄学习。虽然这种与政策不一致的成就不能够被北京甚至是省会太原知道，但是这种经验已经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省里分管机械的官员给我写了个报告，说那种促进机械化的道路是通过种粮专业户承包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而进行的。我确实不反对这种道路，只要他们可以找到快速机械化的道路，但是我同样提倡王公庄的围绕“四个统一”的合作化道路。后面的道路包括了所有的土地承包人，在共同的努力中实行统一计划、统一财务、统一管理和机械化。另外一个“四个统一”的说法是统一计划，统购，统一技术和统一机械加工。

换句话说，在这些合作化公社里面，虽然土地是承包了的，但是所有的麦子、玉米和豆类都是一起种植的。公社购买最好的种子和化肥，然后由中心机械队——或者是由公社所有和管理的，或者由当地的私人专业户承包的——来实行所有的耕作、施肥、种植和喷雾直到收获前。所有的单个家庭只做些临时的看护庄稼工作如一些轻的除草工作或间作。到了收获时节人们把作物分开。每个家庭储藏自己的作物并计算自己的帐目，支付它欠（公社）投入和机器工作的费用。

这是高度集体化和高度联合管理的代表。我们见到的采用这种方法的地区的成果是很突出的。但是这和遍及中国农村的私有化政策背道而驰，而且它是如此偏离了国家的当前政策，山西省负责机械的人们都不希望我在我的报告中指出这是一条可能的前进道路。

王公庄的结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从山西平均水平看来，他们的人均土地面积很高，1611个人有5680亩，其中455个人是强壮的劳动力。他们占有5442亩土地，或者相当于每个人多于一英亩。所以按照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分得的亩数来计算，他们将有大量的土地来进行经济作物种植，承包的同时像以前一样联合作业。收成如下：

年份 每英亩产量（蒲式耳 bushel）

1978	46
1979	71
1980	88
1981	96
1982	103
1983	112
1984	118
1985	118+

这些进步的确是开始于机械化的，尤其是内置了秸秆粉碎机的玉米收割机的应用。由于收割机把秸秆粉碎了，使得所有残余的有机物再次还到土壤中，年如一年的使农田增肥。这使得土壤有了更好的保水能力，化肥也更容易被吸收。当你再加上优质的种子、增加的化肥、在传统氮肥基础上附加的磷肥、除草剂的使用、也许还有玉米去雄穗技术的推广，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无容置疑的产量连年增长的公式了。由于机器解放了以前不得不用于田间工作的劳动力，他们得以进入副业——加工、运输、畜禽养殖（特别是养鸡）、养蚕、丝绸业（silk filatures）和当地建筑业——使得收入增加了333%。农业和副业现在总收入达到了每年每人418元，而1978年的是66元。

王公庄的成功激励了整个镇和县，很多大队已经决定仿效了。这个方式现在已经得到了县领导的支持，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全国甚至在省的范围内公开这个经验，因为它与当前政策不一致。

王公庄和其他地方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在别的地方看见了农民为了腾出地方种麦子而在田中烧掉大量的秸秆。在山西的东南部，他们秋季的时候烧玉米和豆子的秸秆，夏收以后烧小麦的秸秆。所有的有用的有机物都被烧掉了，因为它们碍地方，而且农村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人手处理它们。当然，传统上他们是燃烧秸秆作为燃料来做饭和取暖的，但是随着山西采煤的进步和煤价的便宜，人们都燃煤作为燃料了，不再需要秸秆了。

我们看到了一些地方农民把秸秆堆放在田的尽头沿着公路两侧，然后燃烧，产生的热烧毁了路旁的树木。10月底的时候，到处的燃烧使得山西的空气充满了烟，到处的风中都有它的味道，到处都能看到远处地平线上有蓝色的烟雾。这是多么严重的浪费啊。

由于私有化，所有的打谷场都显得太小了。每户农户都要为自己寻找地方，所以凡是接近公路的农户都把他们的谷物铺到地上，让经过的汽车碾压去壳，然后放在路边晒干。农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使用公路的，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大范围的。今年10月份，我们在这种扑满粮食的公路上走了几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其间一根豆子秸秆卷进了车轴卡住了，我们花了大概一个小时才把它弄好。

这种在公路上处理的谷子会非常脏。车上来的油，马和骡的排泄物，路面的柏油，一同污染了粮食。各级政府屡次禁止公路上的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事情照旧，甚至规模越来越大。没有人可以控制它。不占用公路而又要获得足够的打谷场地，就必须占用农田，这是谁都不愿意的。集体化的打谷需要少得多的空间，而私人的就需要到处扩展。

在山西北部，我们看到了一个县，由于领导很好，他们土地私有化后建了一个很大的牛奶厂。山阴（Shanyin）现在号称有8000头奶牛，其中大多数都是私人的，但全都是从一个老牌国家农场继承过来，这家国有农场原有1000头奶牛。在一个村子里面，我们找到了500头奶牛——一家农户有2头，一家农户有3头，一家农户有1头——每头奶牛在牛奶上每年有2000元的收入。农民种植玉米，给奶牛喂食玉米和打碎的秸秆（从一个地方工厂提供的配给的谷物是添加了营养的），他们每天两次的挤奶，挤完后就把奶送到一个奶粉厂。多么壮观的场面啊！所有的人，老的小的，将盛牛奶的塑料容器搁在自行车后座的两侧，在通往牛奶厂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线。毫无疑问副业是要发展的，饲养奶牛是有效益的副业，至少现在如此。但是这整个过程导致了两极分化，并且相当迅速。最大的私人饲养户已经有30头奶牛了，而平均起来每户只有一到两头。30头奶牛就必须雇佣劳动力了，至少每三到四头奶牛就需要一个人。

到处我们都听到对于税费的抱怨，这个牛奶厂也不例外。似乎轻工业部有权对于所有非农产品征收费用，而不管它的源头，甚至它对于企业的建立和管理根本就没有任何贡献。例如，当你开始挤奶，在你所得的每斤26美分中的1.5美分就以管理费的名义到了轻工业部的手中。另外1.5美分以其它税项的形式也没了，因此在牛奶还没到工厂之前，就已经总共不见了3美分（几乎是12%）。此后它还会被征以各种过程的税项，如运送税（shipping taxes）等——农业集体肩上的负担是实实在在的，人们对此抱怨不已。

买了一辆小拖拉机或者货车，选择从事运输的农民需要担负超过20种不同的税费——执照费（license fees），公路使用税，货运税（load taxes）——你能说出名堂的，就有一样税。这大大降低了运输的利润。在这20多种里面他们列出了保险。这算是有理由的费用，但是其它很多费用是根本没有理由的。他们仿佛是封建时代的苛捐杂税，是地方掌权者强加于贸易之上的无端束缚。

合作化的成功

在东北的黑龙江，过去机械化是很普遍的，至少在农业上。农民使用联合收割机收获小的谷物和豆类，除了玉米。改革像狂风一样席卷机械化。黑龙江的10000个村子里面，只有181个在机械化上面保留了集体的控制，也就是集体所有和管理。百分之二十的把机器承包给个人了，剩下的百分之八十通过内部关系以极其廉价的价格卖出去了——例如大队领导，他们的亲戚和朋友等，平均起来机器只卖了原价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一个人认为机器已经折旧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机器就会以半价出售。不管你怎么说，这是对集体财富的巨大的掠夺，集体财产大量流失，而且那些以如此低价买到机器的人，常常是不愿意进行大修的。使用的机械，主要是拖拉机、犁和少量的联合收割机，他们用到直到需要大修的时候就把它们废弃掉了。

改革以后，大部分的机器只完成了原来工作量的一部分。在几乎每个例子里面，整套的设备都是分开单独出售的，因此新的单个所有者不能承包整个工作和种植流程。一个人为农民犁田，另一个来播种，还有别的人来收割，而没有人能够拥有全套的设备。因此效率大大的降低。另一方面，在全省范围内，政府强调说作物收成没有下跌，而是维持在相当好的水平。这是因为土地承包者主要用双手和牲畜完成了大量粗重的劳动，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

我们参观了与此不同的两个村子。他们都选择了拒绝解散。坚华（Jianhua）村拥有人均13亩的

土地，如果把山地算上，几乎是人均 26 亩——大概是全国平均值的 12 倍。党委书记决定保留机械的所有权，并且通过一个或者几个机械化小组来组织它们的使用。大概有 10 户农民认为解散以后他们会更加富裕，因此离开村子到外面去了。但是整个村子仍然作为一个集体地运作着，运行得非常好，今年这 10 户农民回来了，请求重新加入。党委书记很明智的让他们回来，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欢迎他们回来的派对。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他们发现要单靠自己来致富其实并不容易。留下来的人们共同劳作反而收获得了更多。

这个大队在副业上有骄人的记录，数十农户饲养的 50000 只鸡（每户数百到数千不等），使用人工池塘的大型淡水鱼企业，一个石油加工厂，山地的牛养殖，还有很多其它的项目。他们也拥有相当高的机械化水平，包括一个可以浇灌数千亩（主要是小麦田）的大型并行洒水系统。这里蕴藏了巨大的潜力，尤其他们以集体化的方式管理。

我们第二天去了齐齐哈尔北部，这是更大的一个村子，20 多年前原是山东人定居的一片荒地。这里的集体化水平甚至比 Jianhua 村的还高。这个地方过去曾经是中国最成功的集体化单位（The place was functioning as the most successful collectives functioned elsewhere in China in the past）。由于拥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个大队有自己的奶粉厂和水果罐头厂。大队的成员都有自己的果园、长绿树林和鹿园。他们还投资了三个大型的城市商场（2 个在齐齐哈尔，一个在哈尔滨）和一个出租车公司。

跟我同行的中央官员问当地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他没有按照新政策将所有东西都承包出去。“我不想给你讲长篇大段的马列主义理论，”党委书记说，“因此我只给你三个理由。那样做不现实，我们也找不到实现的方式，而且我们不想那样做。”然后他开始解释这三点，尤其是最后一点。他自己就是企业的经理，自称睡觉的时候也能挣钱。1985 年，他建立了一个跟企业利润挂钩的奖金制度，从而收益远远超过了人均 3000 元的计划。这个村的人均收入是 1700 元，其中 600 来自个体的农田项目，如饲养的奶牛，1100 来自于集体的项目。党委书记计划在 1988 年收入达到 7 百万元——1 百万来自于农业，1 百万来自于林业，1 百万来自于畜禽养殖（主要是奶牛）和 3 百万来自于工业、商业和外面的企业，加上 1 百万来自个体农业的所得。这样就可以达到人均 3000 元的收入。

这个集体拥有 17 辆大的拖拉机，5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和数十台其它各种设备。在机器的帮助下，合作社社员人均耕作 300 亩（50 英亩）土地，这是东北平均值的 10 倍多。如果这样都被解散掉，实在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事实是，上万个拥有同样水平机械化的集体的确被解散了。而且现在没有人再为这些集体高唱颂歌了，因为他们被视为特立独行的，违反现行政策的。然而他们却被机械化部门的人（the machinery people）所赞扬，因为他们证明了合作化加上机械化能做到什么。

东北支持机械化的人们都尝试着通过推动机器所有者进行联合，来使得当前恶劣的境况得到最好的改变，也就是说，那些买了或者承包了机器使用权的人组织起来，互相协调，制定价格和标准，从而为个体土地承包者提供有效的定制的作业服务。但是如果这些土地承包者不实行类似“四个统一”的形式的话，这些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这将没有了机器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大片的土地。

今年东北南部地区的辽宁省，洪水泛滥严重。在雨季辽河泛滥，毁坏了大面积的庄稼。由于破坏如此严重，北方城市的人们非常紧张并开始抢夺粮票，这是几年来的头一回。在 1984 年出现了过剩的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觉得个体的粮食市场就可以以低价供应足够的粮食了，但是现在明显这不再可能了。突然之间，配给、粮票和国家定价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有传闻说广东粮食短缺希望从湖南购买更多的，但是湖南不允许粮食外运，因为它的领导害怕他们自己本地也短缺。同时，由于长江下游平原在收割的时候遇上了大雨，导致了大量的粮食腐烂变坏。陈云尖锐的提出了粮食问题，并要求政府对于粮食要给予特别的关注。1985 年 12 月 12 日的《中国日报》报道了国家粮食收成的大幅度下降，第二天的后续报道说广东的半数土地已经转向了非农业用途了。

草原上的两极分化

1986 年的夏天，我走遍了整个内蒙古，考察了那里的草原和沙漠（有时候还真难区分这两者）。那儿我发现形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到处都是过度放牧，没有针对这种破坏的实质性的举措。不管我们到哪里，人们都说放牧是万不得已。（此处原文缺失……）

即使在人烟如此稀疏的沙漠地区，我们依然看到了跟其他地方一眼的社会差别现象：大胆的承包

者想着拥有比他们自己能使用的更多的财物使用权，从而可以雇用贫穷的邻居来做粗重的手工劳动。一个人从他所在的集体中买或者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一个新的果园，他雇了三个人正在苹果树之间种植西瓜。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工人去找熟了的西瓜来给我们吃，非常丰富的招待我们，那些工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于是就给了他们一点点。这是我想起来了旧中国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政府启动了沙丘固定项目后往往会承包出去。政府为每亩支付的价格是很高的。内部有关系的人大面积地承包了，然后雇佣别人来做粗重的手工劳动，自己赚取巨额差价。因此两极分化到处都是。一个蒙古朋友说：“劳动管理关系已经回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初期。”但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所有者拥有全部权力，劳动者一无所有。纯粹的雇佣、被雇佣和剥削，还没有任何保障和工会的抵抗。”

我们去了在鄂尔多斯中心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区，那里的地下水位数百英尺深，井的数目很少，而且间距很大。由于数千头牲畜需要水，这些井的周围都出现了轻微的沙漠化了。当我们参观一口井的时候，得知附近另外还有一口井，那是集体花了 10000 元开的，已经被一个私人以 3000 元买了。这个牧民只用了 30% 的价钱买了这口井，用它来充实自己的财富。还是在那个地区，我们看到了一些农田的机械——如用于制作饲料的铡草机，大型割草机，和大型发电机——都被废弃了，散架了，生锈了，发电机上的铜线被弄走了。所有的现在都是私有的了，规模太小了以至于根本没法使用这些机械来作业。

我在草原见到了最大的个人承包户，总共承包了 20000 亩。一个有庞大家庭的 Atakachi 人承包了这大片的土地（大概 3000 英亩），从银行贷了款，将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用篱笆围起来了。他还向集体承包了一个干草打包机的使用权——那是一个 10000 元的机器——在没有围起来的土地上面制作干草。在割草的季节他会雇佣几个劳动力。那里之所以还有草生长是因为那儿没有可供牲畜喝的水源。

官员告诉我在整个地区共有 5 个承包户是超过 10000 亩的。大部分承包户是 2000 到 3000 亩，很多是 1000 亩或者更少的。我想那个有 20000 亩的人可以做得很好，但是 1000 亩的那个人能做什么呢？像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山脉附近的资源已经被严重地耗竭。现在已是雨季的尽头了，一年中最适宜草生长的时间，但却很难见到草的影子。唯一可见的绿色是没有牲畜愿意吃的很差的草，这些草之间到处都是贫瘠的土壤。

荒野山地，未开发的草地

在呼和浩特北部和鄂尔多斯北部的山区中我们看到了百万亩严重侵蚀的山地。那些山看起来就像被巨大的老虎爪抓过似的。权威人士都不称这些地区为草地了，而是称为荒野山地（waste slopes），尽管它们本来是被草覆盖的。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树木。在内蒙古，他们说，如果你要上吊的话，需要走 100 公里去找一棵树。

由于到处的山都被小冲沟和平地分隔开，这些地方可以供农民耕作，因此他们把这些土地分类到农业用地中。农民在这些贫瘠的土地上耕作，然后放尽可能多的牲畜到山上。没有人想过要控制放牧来拯救这些山，或者核算一下这些严重侵蚀的破坏作用有多大。当我问及目前有什么可行的措施的时候，我们的导游惊奇的看着我，“但这些是荒野山地啊，”他说。很明显根本没有人对荒野坡地做过任何规划。我并不是说他们对其它草地做的计划是有效的，但是至少很多人们正在担忧着那些草地的未来。大多数的人们都意识到那是一个问题，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大量的会议，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这些荒野山地就不是这样了。但是目前内蒙古有四分之一的牲畜是在这些荒野山地上放牧的！

锡林浩特的东部——离外蒙古边境不远，只需要往东走两天的旅程——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适度放牧的山地，在大兴安岭山脉的西坡。这些土地没有被放牧主要是因为地下水位很低——几百英尺以下——因此牧群仅仅在冬天有雪解渴的时候才会过来。这里我们甚至看到了天然的树林，和一些在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原始的村庄——大部分不是被树木而是被草所覆盖——巨大的连绵起伏的山峰整个儿被草覆盖，像无穷无尽的地毯向地平线蜿蜒。在这整个地区，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牧群，有牛和羊。当我们准备拍照的时候，导游阻止了。“不要给它们照相，”他说，“他们是在偷牧的。他们是从山的南面过来的。”他们来自于巴林右旗——我 1983 年曾经去过——一个比锡林浩特大多数山地过度放牧更加严重的山地。因此这些无计可施的巴林右旗的牧民只好勇敢的到这些没有水源的山里头来寻

找未开发的草地。

兴安岭地区的确是一个天堂，但它只有比例很小的草地。尽管如此，它也提供了很大量未开发的资源。如果政府在北京少建一些高楼，而给一些资金在兴安岭里钻一些井的话，整个山区很快也会被耗竭了，因为如果牧民能够找到水源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带来足够多的牧群来把山区的所有东西都用光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农业农业上的投资较少，也许是一种幸运。

改革所绕过的：农业机械化 1986¹²



改革所绕过的：

农业机械化

1986

今天有许多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评论。数以千计的人才出国学习最新技术，工业部门进口最先进的煤矿开采、钢铁冶炼、运输、电器制造和计算机等设备，掀起了狂潮，“信息革命”的幻象激励着年轻一代。但是有一点被所有人忽视了，那就是农业的机械化。在改革初期的政府大重组中，唯独那些事关农业机械化的部门撤销了。这些部门里的官员通过设立“农业机械化服务站”半官方半商业性质的单位以免下岗。中国，看起来想把所有一切都现代化，却唯独把粮食生产的体力劳动排除在外。可是，问题还在那里：没有农业机械化的中国能够现代化吗？

现代化，如果有意义的话，必然意味着生产的现代化以及现代生产的核心必须有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离开高生产率，何谈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防呢？既然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部门，即便不是最重要的部门，那么农业生产也必须现代化。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不能在个体单干的农业基础上持久的发展。一个半现代化、半原始的经济在形式上就是悖谬。乡村的倒退破坏了其他领域、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农业劳动力现代化的钥匙是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体力劳动就不能摆脱土地去从事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没有机械化农民就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工业品；没有机械化，结果是，农民落入二等公民的地位，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因为他们不能生产或者消费足够多产品以成为现代化的参与者。

当今政策制定者提出通过“责任制”的执行及推广所谓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生产率。通过“科学种田”意味着通过改变动植物组成，促进更好更多的肥料，应用先进的灭虫剂，注意田间管理，田间套种，密植，精耕细作。

一方面这种“科学种田”被设想成提高每亩或每公顷的产出；另一方面，家庭承包责任制，却想通过直接的物质激励以增加劳动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

改革者对农业机械化不予重视，甚至是无知。新的五年计划（1986-90）仅提到了一次机械化，把它作为必须支持的某个东西，这很像只是为了完美避免缺陷所作的一样。但是科学种田加艰苦劳动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生产力的问题。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比较高了。科学和艰苦的劳动可能会使产出翻倍，也可能翻三番，但是要翻四倍则不太可能。然而即便通过这样的方法，中国农民能够翻四倍，也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之后。这是真实的，因为第一，应用这些所谓的科学方法，差不多总是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投入，在劳动生产率角度上讲，也抵消了收益。而且，第二点，因为生产力差距太大了，以致中国不是两倍四倍或六倍的提高生产力，而是必须百倍的提高其生产力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通过下表可以看出：

表 1. 每亩粮食作物生产所需劳动日（每天 10 小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0.037（休耕）
	0.08（传统耕作）(conventional till)
中国(山东) 招远县东良村	11.40
Yeji village, Huang County	15.00

¹² 这篇文章原来是 1985 年 3 月给中英友好协会创始者之一麦克斯韦写的一封信，后经修改缩短而成。（This article is a revised and shortened version of a letter written to Neville Maxwell,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 in March 1985.）

表 2. 每生产一吨谷物所需劳动日(每天 10 小时)

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	0.077 (休耕)
	0.156 (传统耕作)
中国(山东) 招远县东良村	38
Yeji village, Huang County	33

对比一下宾夕法尼亚和山东的谷物产量图，就可以看出（1）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主平均耕种土地是山东农民的 142-405 倍；（2）宾夕法尼亚农场主平均生产谷物在每个劳动日内是山东一个相对发达的农村农民的 213-438 倍。唯一可以恢复平衡、缩小差距的办法是推行机械化，并辅之以“科学”的方法。

机械化不仅被定义成现代科学耕作和农作物生产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意味着促进在许多方面的科学耕作。例如说，土壤有机物含量必须增加以促进水分吸收能力、水分保持能力和提高土壤中肥料的利用效率。然而现在农民通常烧掉秸秆给下一茬的作物清除障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把秸秆进行别样的处理。没有机械切断秸秆使作物茎仆倒，他们不得不将其付之一炬。这样的行为将破坏亩产量。充足动力的机器也可以起到促进定时翻耕、定时播种、统一作物间距和播种深度、肥料有效吸收、方便灭草剂杀虫剂应用的作用，经常是机器过一遍之后就完成整个过程。所有这些因素促使产量提高。

失 业 问 题

对农业机械化的最通常的异议是：农村已经有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机械化，习惯上被认定会产生无法接受的失业。

这种议论把问题简单化了。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情况是局部地区有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同时其他地区缺乏或者很快会缺乏农业劳动力。哪里经济发展越快，哪里的副业和小工业就扩展地越快，大量农民就离开土地，随之劳动力的短缺开始发展，农业劳动力工资急剧增幅。在 1986 年黑龙江部分地区农业劳动每日工资 10 元，这比北京大多数单位的工人工资高出很多。在广东，收获时节雇请的劳力每天能挣 6 元，雇主还提供烟酒饭菜。在北京郊区，外地来的水稻插秧者每天挣 6 到 15 元，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找到好的劳力，因为没人再想在稻米种植上弯腰曲背地干活了。土地的低生产率和与日俱增的、离开土地的经济机遇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这意味着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更做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

其次，部分由于这种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江河堤坝，阻风带，森林带——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和许多其他高产措施都迅速减少了。

最后，没有集体通过各队工分制对副业和工业利润进行的再分配，农民不愿承包土地从事农贸生产。这样，许多公社不得不继续承诺提供免费的种子、免费化肥、免费犁田，保证以补贴价收购粮食，以确保农户急需签署承包合同。而公社支持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公社自身的经济实力，公社可以把这些资源用于其他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但却把它返还给一般农业生产，这当然制约了发展。这归结为一种称之为“平调”的形式——测度和转移财富的汉语术语——从高效到低效的生产者，而责任制认为应当取消这种形式。但新体制并没有取消它，事实上仅仅用另外一种形式再生了它。乡政府从哪里筹到这笔款呢？他们从个体劳动者为工商业商品和资产的使用而支付的合同费中筹得。毕竟工业还是支撑农业的。

在迅速发展的地区许多组织和管理很好的村庄痛彻地感觉到劳动力的匮乏。在山东招远县东良村，那里有 1600 个壮工，村领导提出到 1990 年前村里会缺 473 个劳动力。这是因为他们正计划创建几个新的工业企业。他们想通过高度的机械化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劳动力。

山东黄县业绩村，有 1350 个壮工，提出到 1990 年将短缺 213 个劳动力。业绩村的领导也想通过机械化的方式获取劳动力。只有机械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新机械方面的适度投资可以立刻以数十

倍地速度提高生产力。这些机械也可以提高单产、降低生产损耗，鼓励部分最优秀的壮工留在土地上而不是离开。

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1) 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2) 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3) 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总共加起来这些地域占到中国版图的 30%。

在前两种类型地区，劳动力转向副业工业和采矿业，农业劳动力产生短缺并提高工资水平，已经创造了机械化的有利条件。通过集体和个人积累的从非农业生产得来的利润保证了投资基金。

然而，在这些地域，机械化是困难的，因为种植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农作物的复杂度，现时土地的小块化，许多特定条件要求发明新的机械或者对旧有机机械进行改造。人们和相关单位没有最新的研究和试制工作以决定所需机械和器具的类型，而且短期内不能提供有效的成套的机械化工具。

在第三种类型的地域，相反，机械化比较容易进行，因为从欧洲北美进口的机械只需要稍加改进即可可以投入生产。原型已经具备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本。

机械化应该在这三种类型地域立即开始因为条件成熟并且要求强烈。但是不管何时这样的举动被提出，人们总是提出诸如多山地区，山坡稻米区，黄土高原，以及其他一些不能实行机械化的困难，似乎暗示机械化除非能普遍适用否则就不会开始。但是事实是对于那些贫穷、落后、多山的地区，一旦他们也创造了社会条件，即可选择的就业机会以减少农业劳动力，那么更发达、条件更好的地区的机械化将对条件差的地区形成极大的促进，帮助它们更快的机械化。到那时大量的拖拉机和工具就会具备，大多数必要条件将会可以应用，大多数生产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清楚，政策应当这样提出：“让一些地区首先机械化起来”。这可以给后来者清除道路。

比例和范围的问题

一旦机械化的许诺作出后，什么样的机械首先被采用就是应当考虑的问题了。中国应当把精力放在为小型的 15 马力四轮驱动的拖拉机制造工具上并依赖它进行未来的农业生产呢，还是把精力放在为中型 10-100 马力拖拉机上并依靠它进行农业生产呢？

一些人争论说既然已经生产了这么多小型步进式四轮驱动拖拉机，既然已经有这么多农民拥有它，那么它就应当作为机械化的中坚。依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方针。除了这些机械力之外还有太多耕作任务，例如深耕、heavy discing、deep chiseling、平整土地、切断秸秆、拖运肥料、撒布肥料、玉米采摘，以及许多其他收获杂事，现在都做不了或者只能花费大量成本用小马力机械去做。产出已经受影响了，因为小拖拉机不能犁多于几英寸的深度。如果在表层以下形成了一层砂砾层，这些小型拖拉机无法打碎它。

把 40-100 马力系列的重型拖拉机作为中国机械化的主流是有很大大意义的。这样的拖拉机，有完整的配套器具，可以做从耕地到收割的一系列农业劳动，并有相当高的效率。公社应当把土地集中起来分块耕作以使工作更趋合理。

每个装备好的中型拖拉机，可以耕作 1000-2000 亩规则的庄稼地，可能对水稻田要少些。既然北方大多数村庄都有 1000 到 4000 亩庄稼地，管理的规模比较适宜这种类型的机器。计划可以在一个村子大小的规模上展开，通过机械队和机械专业户提供附有一系列广泛服务的土地租约。在这种规划下，还应考虑小型步行式四轮拖拉机，它可以提供田间运输、局部喷雾以及其他随机的轻服务。

事情的核心仍然是：机械化，如果是成功的话，必须有一定规模。全力发展 15 马力的机械化会将中国一直限制在缓慢滞后的农业水平上。

另外一种观点偏重考察机械化所遇到的季节性问题的：中国应当关注于农忙季节劳动的机械化呢还是为全面综合的农业劳动机械化而奋斗呢？有一个强烈的偏见认为中国机械化只适合于明显限制公社劳动生产力的农忙季节。依我看这是短视的。解放人力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农业劳动的全面机械化。每一种作物的全部生产过程都应当机械化。只有这样种植专业户或是机械队才能承包更大地域的土地而其他则把时间和精力放到别处。

全面机械化可以在短时间内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大大提高每台机器特别是拖拉机的工作时间，这样可以减少所有者的成本耗费，并可以执行更多的耕作任务。拖拉机应当有足够的装备和工具，使之不仅可以犁、耕、种，还可以在播种前、中、后同时施肥，喷洒除草剂灭虫剂，堆肥、翻肥、

运肥、撒肥（粪肥和混合肥料），收割大量庄稼，粉碎并撒布秸秆，平整土地等等。

应当具备的多样性和弹性

技术上讲，综合机械化并不困难，但是应当注意到一些一般的情况：

首先，中国不应试图“再次发明轮子”，就是说，中国应当明了世界上已经发明了的東西，在任何必要情况下改变调整以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农业是复杂的变化的，但是对几乎每一种手工作业，现在世界上都有对应的相当有效率的机器代替了。

第二，中国应当乐于改变耕作和种植方法以适应机器耕作的合理需要。许多技术员和农民非常反对这种观点，坚持说机器应当准确的代替手工，即便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这种或那种特定的手工方法更好或者更能促进高产出或高质量。许多人坚持把粪肥和堆肥施在埂上和玉米小麦的种子下面，对机器来说这太难做了，甚至所有证据表明把肥料撒布整个地面上即便不是更好但也能有同样产量的时候，很多人也还是这样坚持。

农民应当由有效的示范来被教育和动员使之承认：

- (a) 调整行距适合机器耕作。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拖拉机和/或其他机械的轮胎必须能穿过各行。
- (b) 精确的不需要间植的播种。这必须配之以高质量、能够保证发芽率的种子。
- (c) 种子应当条播而不是把它播在埂上。
- (d) 撒播或者条播肥料代替埂播。
- (e) 适宜地区实行少耕甚至休耕。在华北平原冬小麦收获之后，在将要种植玉米或豆类的地方不耕地，事实证明生产效果特别好。不耕地而直接种植可以防止大雨之后水分的渗漏并且可以防止土地干涸时的地表龟裂。
- (f) 干法种植稻米。
- (g) 将秸秆粉碎，同土壤混合。农民总是说他们不想联合收割机把秆捣碎，但是只有很少的秸秆实际地用来编织或者编成辫子。那些以这种方式利用秸秆的地方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
- (h) 采用新的种植方法，例如两年三季代替一年两季以及减少间作。劳动力消耗不算什么，在中国到处都有过剩劳动力，事实上这种偏见诱导人们一成不变地推行多熟种植和间混种植，它浪费了巨大的劳动力，这甚至是在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它可以带来更好产出的情况下作出的。在日本，最近一段时间，农民修改大面积的复种为单一作物种植长季稻因而提高了每公顷的产量。在四川人们变三种为复种，同样增产了。

第三，中国应当努力提供在基础机器方面尽可能多的选择。大多数联合收割机可以处理多达 30 种不同作物。每种作物需要特别的配备——特殊的收割台，特别的气缸，特别的去壳机和筛子，切草机，轮子的重量，轨道代替轮子，宽轮或者窄轮，等等。目前，机器和工具只有很少的选择。当农民试着用而无法正常工作，他们就会认为这台机器不能作这个活。这样的经验极大的阻碍了机械化的发展。

中国人种植中耕作物有各种各样的间距，这取决于地域，作物，和间作作物的不同。拖拉机和相应工具应当装置易调节的轮子，不管是宽的窄的或是任何居于其间的型号，包括前轮是独轮引导的情况。所有种植机、耕田机、收割机等等，都应当根据不同的行距，作物高度和其他特殊情况制作成可调的。

第四，为了保证多样性，农机工业应当规划生产小批量的多用途产品。工业不应当期望或者计划制作无穷无尽的单一原型的拷贝。现代自动化机械工具可以很容易地适合小批量，在某一个基本方案上进行改动，从而改变模型，丰富其种类。现代工厂通行的不是重组而是重构。在日本个体家庭拥有自动化机械工具，从大工厂里承包小批量的订单。其核心是柔性的。

最后，中国不应当在仅有一个方案提出或者一种模型完成时，就认为问题解决了。中国急需适应灌溉土地的两路犁，适合硬土的掘土犁，适合小块土地的装配了玉米采摘机的轻型拖拉机，以及许多到处都能应用到的其他一些工具。农机工业的目标应当是提供多种选择以使不同地域的、种植不同作物的农民可以解决他们特殊的种植问题。

适当的社会组织

最要紧的是什么样的全面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最好地促进机械化。在 1985 年和 1986 年，我走访了几个机械化程度超过平均水平的比较发达的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坚强的集体核心。他们通过公社组织的中心机械队或者通过签订合同的专业户制订大部分生产计划，并以计件方式支付给这些小组或者合同工工资。个体家庭把所有地都承包下来，但是每户只执行田间管理的一部分功能——漫灌，施肥，手工喷雾。

我感到机械化最适当的形式是一个强有力的村集体配合所有承包农户，草拟一个统一的种植计划，通过统购提供所有必须的投入，通过一个中心提供机械维修。这样一个体制把个人的责任和集体力量连接在一起。它有四个统一，这在我访问过的所有公社中都提到过：(1) 统一规划；(2) 统一购买种子肥料杀虫剂和其他投入；(3) 统一的技术手段的应用；(4) 统一的机器分配和操作。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农民可以调节粮食生产的比例，可以种植大面积的单一作物，可以经济的配置机器。

在承包责任制下，唯一可选择的是鼓励农业专业人员独自承包越来越大的土地，自己实现机械化。但对要是用一整套机械这种情况来说甚至 600 亩地也嫌太小了。如果有公社选择专门人员实现这个计划，那仍然需要考虑中心机械组要为他所做的工作。或者那样或者几个专职人员集合到一起共享必须的配备，而这种合作的形式不容易实现。在两个形式中，第一种有比较大的潜能待开发，不管现在还是未来。第二种比较难以创造、组织、坚持。它远没有那么稳定。

如果政府发给津贴或者奖励刺激机械化，应当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集体。不应当像目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歧视集体的力量。

对于农村组织来说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经费。许多人认为机械化对农民来说太昂贵了。然而，小麦玉米豆类轮换的一整套配备只需要投资每亩 100 到 150 元。这不包括灌溉设备。(官方汇率人民币 3.72 元兑换一美元，但在外汇市场上实际汇率现在已经达到人民币 7 元兑换一美元了。)

按 7 年折旧以及 8% 的利息算，物主的花费每年每亩需要 22-33 元。既然许多村子已经有许多基础工具，特别是耕作的工具，他们就不需要因为新投资而花费过多了。

机械化耗费每年 22-33 元(物主耗费)可以节约多达每亩 20 天劳动。按照劳动力每天 3 元的估价，那就是 30 元了。另外，人们还可以期望作物产出会因为有组织的组合、合时、统一等因素获得一个相当的增长。

政府支持的形式

为了促进机械化，政府同时应当考虑采用美国政府二战以来的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措施，例如，联邦税收条例鼓励个人大力投资生产型的设备。许多年，政府提供信贷以保持投资比例，降低所得税。生产者发现买新的设备比把钱通过税收上交给国家更为有利。

另外，美国政府直接资助有利于环保的技术创新。例如，“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心”(the Agricultural Stabil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Service)在 70 年代支付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休耕种植者的损失。这个中介也会给那些经核准的在农场上存储谷物的农民提供信贷，这样农民就可以支付生产费用，而不用在收获季节低价卖掉自己的谷物了；农民售出谷物后偿贷，但是如果谷物价格上涨不抵贷款利息时，政府就购买这些谷物。此外，政府通过生产信贷协会(the Production Credit Association)为农民购买设备提供信贷，利率是合理的，分至少 7 年偿清。

几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金融措施，调整价格、信贷、税收以及其他经济因素已帮助农民维持原有职业。这包括促进出口，购买过剩产品，直接生产津贴，直接的粮食减产津贴。

然而可能没有任何措施适合中国，中国确实需要采取措施，不仅支持农业生产还要支持农业机械化。现在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给予关注。

第一是农业设备的价格。目前，厂商由于国家法规在农机上定价过低。这样的价格农机工业不可能赚钱，结果没有人想生产农业设备。低价格是为了帮助农民，但是他们对工业刻薄成如此，以至于没人愿意生产农机设备，最后农民很少有或者没有机械可买。或许应当给予购买机械的农民津贴，同时生产设备的厂家可以按较高的市场竞争价格收费。

对机器工作的例行收费也需要补救。过去，农机操作员为犁地种植收割或联合作业定的价格太低

了。他们几乎赚不到什么，这还没考虑机器折旧和还债。结果，就及其报废后，没人能够负担得起买新机器。甚至在最近价格取消管制后，收费极低的习惯还在许多地区保留着。

最后，农业计件工作和统一费用标准需要调整。这些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要试图设定惯例而阻碍创造力和革新。

在中国对不同的农业区域适用适宜的配备将需要投资和计划。当局应当在每个种植区域选择示范村在实际生产中试验机器。技术工作者应当选择最佳配备，全世界包括中国，在这些中心里集中进行测验、修改最终成型。现在在中国生产的几乎全部拖拉机和配件都已经过时很久了。大多数，都是依据美国 30 年代以来的模型，50 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为什么中国生产现代化的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火箭、工厂、矿场和建筑机具，却还生产着 30 年代的农机呢？大多数型号都是笨拙的易损的，设计上、质量上经常遇到问题。这些机器名声都不好。如果过农业是基础的话，为什么不打造一个坚实、高效、现代的基础呢？

为了机械化农业，应当采取稳妥地措施来调整工业同农业的关系。目前，生产农机的厂家不使用机械，只把它卖给终端用户或者只提供维修，而那些使用机械的人则不懂如何生产机械。工业提供很有限的一些原型，要么用要么不用。型号改变速度缓慢、距离实际需要很遥远。一旦出厂，往往就没有人再对机器负责了。

在欧洲和北美，厂家必须兼有出售和维修它的产品的功能。公司发动使用者和商人签订合同，通过售后服务、零件配给和建议等继续维持贸易关系。在农民与经销商和农民与公司之间，或者通过经销商或者直接通过区域代理维持双向交流。公司和经销商的生计取决于消费者的满意度、质量、维修以及服务的质量。

中国应当找到连接生产厂家和机械使用者并使之更紧密的方法。更多实行当地自治，更少定型（ding xing），这会有帮助。定型，或者“固定形式”，官员的审批高于实际物质分配的需要，会在工业中产生极大的僵化，并抑制多样化的发展，而这正是中国机械化必须发展的。机械化到了迅速扩张的边缘了。某些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和高工资正在推动人们使用农业机械。一般地说，农民要比政府和工业更早的面临这个问题。

政府部门、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抓紧时间，解决制造全套综合机械化产品的问题，带头推动农业机械化。资金必须适当，外国交流适当，引进原型，测试需要引导。这是摆在当今议程上的一个重大任务！

重访大寨：1987 年¹³

大寨 1987 年重 访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的一个山村，毛泽东把它选为农村发展的典型，主要是因为那里实践了合作与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个仅有 80 户居民的小公社把贫瘠的、饱受雨水冲蚀的山坡地变成了肥沃平整的农田，而且有着可与衣阿华州相媲美的灌溉产量。大寨的农民种植苹果树、胡桃树和桑树，他们养蚕、蜜蜂、鸡和猪，他们建了一个砖窑、一个豆粉条加工厂、一个矾土矿，他们还用农作物卖出与商店经营的收入所得为每家每户建了坚固的石头房子，他们给孩子和成人以教育，并给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障。

毛死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批判大寨，指责它的成就是虚假的。最终在 1983 年，大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组。新指定的干部们从国家领取工资，把集体修建、集体劳动积累下来的土地承包给家庭进行私人生产。改革者宣称，大寨村民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提高了作物产量，开发了新的繁荣的副业，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标准。据新华社最近的一次报道（1987 年 9 月 17 日），现在的大寨证明“责任制”比从前的合作式的平均主义有着更大的优越性。

这些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对新华社的信誉不幸的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报道的主要观点。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多次到过大寨，有五次是在集体合作时代，四次是在大寨受到批判的时候及进行改革的不同阶段。其中几次访问时间很长很深入。最后一次是 1987 年 6 月在大寨停留的一天。我的妹妹寒春则留到了八月。

结论：1979 年以来，中国的媒体一直虚假的宣传着大寨，一面诋毁视集体的成就，另一方面鼓吹改革的成果，而两方面都罔顾事实。

充满偏见的比较

当前的报道从如下几个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

——总收入的激增。总收入从 1978 年的 185,000 元增长到 1986 年的 650,000 元。

——人均收入的激增。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186 元增长到 1985 年的 650 元。（然而，1986 年由于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另一个煤矿，可自由支配收入跌到了 608 元）。

——新的赚钱的企业和工厂的创建。1986 年它们创收超过 490,000 元。

对这些说法的仔细考察将揭示出事实和它们所刻意遗漏的东西。

首先，所有给出的数字都没有修正通货膨胀的因素。

人民币从 1978 年开始大幅贬值。如果我们取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数据已经从 1978 年的 1.6 元兑换 1 美元跌到今天的 3.7 元兑换 1 美元。这些官方汇率很可能并不反映人民币的真正贬值程度。黑市汇率已经接近 6-7 而非 3.7。这些数字也未考虑美元自身的贬值。

如果拿人民币所能购买的有代表性的零售品来衡量，贬值也是相当明显的。一元钱今天所能买到的商品不足 1978 年的一半。在山西省，几年前玉米 9 分钱 1 斤，今天已经达到 2 角 4 分 1 斤了。官方报纸（11 月 9 日的《中国日报》）的数据说 1985 年到 1987 年间，物价上涨了 27%。为了使数字在整个范围内具有可比性，1978 年的所有数字都应翻番，或将 1986 年的所有数字减半。

其次，改革前后的数字不能直接比较，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

改革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改革前，货币收入（现金或者能兑换固定现金价值的粮食）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 60%-75%。合作社（Brigade）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大部分

¹³ 原载《每月评论》1988 年 3 月号（Monthly Review 39, no. 10 (March 1988)）。

或者全部免费的享有住房，医疗保障，燃料，电，和其他的货物和服务。这些附属利益的总价值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按改革前的价格计算这些至少要相当于每人每年 50 元。尽管今天的承包者仍享有一点福利，但占总收入的比重就少多了。

此外，在评估改革前的工资时，必须要考虑每年实际上都要加入积累基金中的新创造的流动资产，还要考虑每年花费几个月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固定资产的价值。这些新增资本包括高产梯田和坚固的坍塌的家居石窑。土地无法立刻就给与回报，但却能确保未来收入的更高水平。虽然很难给这些资产定价，但从每亩地上消耗的劳动力、从每亩肥沃土地出产的谷物的现金收入和每个窑洞的现金价格上，可以估计这些至少又相当于每人每年 50 元。

要做一个有效的对比，就要把这些数字加起来： $186+50+50=286$ ，然后修正通货膨胀因素翻一倍，结果是 572，接近今天的人均收入 650 元。¹⁴

为了公正，今天大寨增加的集体企业的资本也要计算到人均收入的数字里面。这些当然这会使统计结果有一个很可观的增加。但是由此引起的增加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在过去，人们在冬天通过赚工分的劳动也创造了许多新资产。而今天所有的集体劳动，如修路、修梯田、开垦新土地、扩展水利灌溉、增加新的企业，都要付工资。

工分赋予参与者的，仅仅是从集体总收入的一个部分，即用于分配的部分中获取与其成比例的个人收入。在基本建设中全部劳动力所耗费的工分越多，每一工分的所值就越少，因为这些劳动并不能在今年创造出收入。在基本建设中劳动一个冬天，每个参加劳动的农民与其他不参加基建的农民相比，可以从总分配基金中获取更多一些的份额。但是这些劳动并不能增加当年分配基金的总量。分配基金的总量是由收获的庄稼的价值，加上副业生产创造的价值（减去产品的成本费用），减去为福利而准备的基金、为将来的储备基金和用于投资的资金而形成的。这后面的两项内容通常结合在一起作为积累基金。

另一方面，货币工资必须从积累基金中支付，即把财富从公社转移到个人。随着固定资产的升值，积累基金中的流动资产就要减少。而且，工资收入本应计入人均收入，而过去并非这样。

在过去，所有的生产费用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清楚的帐目，在留出福利基金、积累基金和分配基金之前，生产费用要从净收入中先行扣除。今天，由于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私人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生产费用的详细帐目。没有人会自愿提供任何信息。在 1986 年的 630,000 元的总收入中，有 306,000 元到了个人手中，这个数字除以 504，得出了这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608 元。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生产费用必须要从这 306,000 元中扣除。村里支付了种子、肥料、杀虫剂、水、电和耕种（如果用的是拖拉机）的费用。农民仍然拥有自己的工具，很多村民都有农具和牵引牲畜，八户农民有四轮拖拉机，六户有卡车。这些个人所有的工具、牲畜、拖拉机、卡车都有折旧，需要修理（耕畜需要兽医治病）费用和运转费用。其中一些费用，如燃料可能已经计入成本，但是其他的如草料，肯定还没有计入。所有这些都要从一个家庭的净收入中扣除，这样所报道的改革后大寨的人均收入就要缩水了。

1983 年前后村级帐目上有一个微小而意义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国家前所未有的开始给村党支部书记发工资，这免去了村级财政的这份负担。由于大寨的村民都不愿实行私有化政策，1982 年 12 月政府派进来一个干部，来推行国家改革工作组的决定。从那时起，镇里就开始给村支书发薪水了。现在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每年可以拿到 700 元，还有接待来宾时的每天 3 元的补助，到 1987 年 8 月为止单是这种补助他就已经拿到 270 元以上。而这位支部书记一直使用着一块土地，他还从庄稼上获得一定的收入。

在大寨人的观念中，国家给的薪水在这些靠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与那些靠艰苦的体力劳动过活的单个农民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让拿着国家的工资的人来治理他们的村庄，农民是很不喜欢的，这也给改革罩上了一层阴影。

无论怎样加合或者平衡上面所说的各种差异，1978 年与 1986 年的收入差别显然没有现在的报告中那些用经过筛选的数字和不可靠的统计方法所得出的那样大。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数字不能直接想比。劳动力的数量不仅大大增加，而且有了质变。1978 年村里有大约 200 个劳动力，1986 年超过了 250 人，但还不足以供给所有的企业，

¹⁴ 许多农民当然更愿意增加手中的货币收入，这样就可以买电视机、收音机、洗衣机等，而不是增加土地和住房上的集体的固定资产。但这些资产也是不能忽视的。

于是村里从外面寻求帮助。改革前的大寨很少或者不雇用外来劳动力，而改革后的大寨在赢利最多的副业、煤矿和几乎各个地方都雇佣了数量可观的非本地劳动力。三分之一的矿工是从其他村里面来的，75 人中大约有 25 位。这样劳动力就不仅增加了 50 人而是 75 人或者更多。由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形势推断，就可以想象还有外来的日工在大寨的其他的小工厂、果园里和卡车、拖拉机上工作。保守的估计，从 1978 年至今劳动力总量增加了足有 40%。

劳动力的扩张显著的增加了大寨的总收入，也增加了人均的收入。因为虽然外来工人把工资带回家里，但他们的剩余价值还留在村里。总收入的这一部分增加了集体所有的积累基金，长远来看也会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人们将从新的资本投资中得到更多的工资与津贴奖金。山东一个雇用外来矿工开采金矿的村庄，现在已经正在为所有的村民建造价值万元的房子了。

第三，当新的企业确实带来了收入的更大的提高的同时，其他的改革前的工程已经在衰落，甚至破产。事实是，如果没有煤矿，大寨的收入按通货膨胀修正以后，要比 1978 年还要低好多。

当前的所有报道的起始点都是 1978 年。那一年大寨的总收入是 185,000 元。1983 年第一个煤矿开始投产，给总收入增加了几十万元。到 1986 年，产出的煤卖了 350,000 元。从总收入（假设为 630,000 元）中把它减去，就得到其他方面的收入计 280,000 元。再把这个数字减到二分之一已修正通货膨胀，就只剩下 140,000 元，比 1978 年的总收入还要少 45,000 元。即使这些修正有些夸大，改革的成果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这怎么可能呢？

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从 1983 年以后大寨废弃了几家赢利的集体企业，同时不再继续维持曾使大寨闻名的土地高产和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措施。遗弃的企业包括一个豆粉条加工厂，每年能获利 10,000 元，其副产品支持的养猪场可以获利 20,000 元；一个打铁和焊接的工厂，每年获利 7,000 元；一个酒厂，每年获利 5,000 元；还有一个养马项目，使用其他地区的牧场，每年能获利 40,000 到 50,000 元。这些总共每年 92,000 元的收入就再也没有了。曾用于豆粉条加工的巨大厂房和周围的猪舍现在都空荡荡的矗立在虎头山的山坡上。

虎头山上其他的未利用或者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包括曾经用于养蚕的许多桑树，还有许多的胡桃树、柿子树，现在看起来，即使没有被遗弃也被忽视了。

由于官方的说法是在过去大寨只注重粮食生产，所以今天的村里的领导人介绍一些早已经建立而还在生产的企业的時候，也说得仿佛是新建成的一般，就好像这也是改革的成果一样。这些包括：从前每年赢利 2 万元的砖厂（韩丁一家 1971 年在这里工作过），盈利 1 万元的豆油和醋加工厂，还有用于在公路上运送货物的拖拉机，年盈利 1 万元。

真正的新企业，除了煤矿，还有一个面粉厂，一个采石场，外加一些私人跑运输的拖拉机和卡车。新的卡车与拖拉机带来大约 7 万元的收入，少于关停老企业所带来的损失。

下 滑 的 农 业

改革以来的农业滑坡是严重而显著的。除了因果园扩大而引起的水果增加以外（中国人把它划归副业），作物产量是下降的。今年，我看到只有少量土地上生长的作物是使大寨闻名的密实浓绿早熟高产的玉米和高粱。今年六月大寨田地里的作物生长水平反映出私有化给土地带来的管理技术和对种植责任的巨大差异。我发现作物的颜色、秸秆高度、种植率、萌芽率和作物管理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不得不断言今天的承包户无法达到十年前的集体种植水平，统计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改革者喜欢提起 1983 年改革第一年的粮食产量。这的确是一个大丰收，亩产 668 公斤，总产量破纪录地达到 508 吨。问题是历史上这个产量是经常接近甚至超过的，如果不是总产量，那么也是亩产量，但是再也没有被重写过。1983 年天气非常适宜，土壤在集体护理几十年后已经非常肥沃了。从那以后，天气就没有那样好过，承包户对于肥料、种子质量和其他关键投入漫不经心。产量从此下滑了：

1984		420 公斤/亩
1985		470 公斤/亩
1986	(大旱)	420 公斤/亩
1987	(大旱)	157 公斤/亩(估计)

改革前，大寨也经受了干旱的年份。1982 年就是其中一次。改革者喜欢把这一年的 310 公斤/亩的产量和 1983 年的 668 公斤/亩相比较。然而，在 1975 年大寨作为集体公社的时候，平均亩产 578 公斤；1976 年亩产 591 公斤；1977 年亩产 690 公斤；1983 年亩产 506 公斤。即使这些数据被夸大了，像批评家现在说的那样，他们也不可能去掉太多。我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去看过庄稼。这是我在山西看到过的最好的庄稼。为公平起见，应当把好年份跟好年份、坏年份跟坏年份拿来对比，而不是把最坏的跟最好的相比较。

从 70 年代中期一直到 80 年代早期改革开始，昔阳县的作物产量由于大寨这个典范的带动下总体来说一直非常好。我经常注意他们，钦佩他们，甚至惊讶于山坡梯田上能够产出那么多粮食。1983 年私有化以来不仅大寨村而且邻近区域，曾经以高产闻名的地方，都每况愈下。举例来说，这是石坪和南埡的数据：

石坪		
1973	314 公斤/亩(旱年)
1979	461 公斤/亩
1982	211 公斤/亩(旱年)
1986	170 公斤/亩(旱年)
1987	(估计)	很少(旱年)
南埡		
1977	493 公斤/亩
1979	444 公斤/亩
1981	255 公斤/亩
1982	255 公斤/亩(旱年)
		改革以后
1986	224 公斤/亩(旱年)
1987	(估计)	很少(旱年)

过去几年不仅产量下降了，而且基础设施，包括梯田，田间道路，灌溉系统都恶化了。在大寨，梯田看起来似乎很好，建造地格外地好。但是田间的通道去年的六月被消蚀得厉害。一个个体农民承包了道路维修的工作，显然他并没有认真履行合同。在全县我看很多坍塌的梯田，有些地方达到总数的 1/4。每一次坍塌都意味着种植区域的减少和产量的下降。

煤矿的随意开采在石坪已经严重影响了地下水，许多井变成了枯井。如果没有“西水东送”——这一灌溉工程在批判大寨时被中央政府严厉地指责——当地早就没有水了。

待拯救的煤矿

至于大寨，随着许多原有规划的放弃，土地产量的下降和基础设施的消耗，改革者能够拿来炫耀的，不过是几个新建的私营卡车拖拉机运输公司，增加了 25% 的果树种植面积和两个煤矿罢了。然而，由于大多数果树都是许多年前种植的，而且现在已经达到结实年龄，那么 1983 年的改革就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赞扬的东西了。这样就只剩下煤矿这一项，目前大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有的卡车拖拉机加在一起总共有 90,000 元的收益，果园(新的和旧的)有 110,000 元收益。但是单是第一个矿井就有 350,000 元，使采矿成了改革后经济中的第一要素。在 1987 年，打了第二口矿井，预计产量最后会比第一口井更大。煤矿开采在未来肯定会在大寨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

但是改革者可以合理地把这作为政绩吗？如果没有改革这些都不会出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大寨早在公社时期就开始开采煤矿了。60 年代早期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开始一个煤窑的建设。一个恶性事故阻止了工作的继续。村子忙于土地的基本建设，无法抽出剩余劳动力，这些因素促使暂时放弃了开采煤矿的努力。70 年代勘探人员在昔阳县发现了矾土矿石。大寨于是开挖了一个矾土矿。生产队员成功地工作了几年，在当地矾土市场瓦解后就放弃了。为什么市场会消失我还不太清楚，但这的确影响了许多矿。对大寨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 1987 年大寨领导给我的报告，第一口新矿井是 1980 年开挖的，比改革开放早几年，但是煤矿投入生产是在 1983 年，正是分地的当年。煤的开采及时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然而，农民们依然作为一个集体在矿上工作。他们把它当做公社的计划，植根于过去的公社传统，仅仅由一个叫梁炳良的私营企业家承包罢了，两年后所有一切都私有化了。

改革者怎么能把煤矿作为自己的政绩呢？

改革者也许会辩解说，在集体体制下大寨不能够雇用外来工人在矿井工作，因而不能扩大规模使矿像今天这样有效益。这或许是真的，但是作为合作制他们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只要跟一个或者更多的邻近的村子建立合作公司就行。

改革者也许会辩解说，1979 年以前国家宣布了所有煤矿的所有权，降低了本地采矿的积极性。这或许是真的，然而早在 1979 年之前昔阳县的许多公社和村子已经开采了煤矿和矾土矿、采石场、石灰矿。如果国家政策阻止集体开矿，那这项政策也几乎是无效的。随着改革的进行，国家政策改变了。没有任何的全面改革，也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为了鼓励、推动和自主集体开采当地资源，国家不需要执行农业私有化的政策。

两个截然相反的经历——60 年代挖煤的失败和大寨今天矿业的成功，其原因主要是整个昔阳县非农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进步，而不是改革的政策。60 年代，大量的煤矿埋藏在阳泉市的周围，从石家庄到太原铁路主干线上的小镇。当国家开办了大型煤矿，为华北和华中的脆弱的工业提供煤矿的时候，昔阳南面的道路还是那么狭窄、弯曲、不平。高昂的运输费用压抑了昔阳大山中的开矿者的积极性。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大的单位已经几乎采光了阳泉的煤矿。买主寻找新的矿源。国家已经建了一条进入昔阳的现代化的硬路面的公路，现在正在建设一条到达并穿越小镇的铁路。昔阳的煤炭销路很好，而且相对方便运出。我认为，对于大寨村民采矿来说，这些积极因素远比改革政策起的作用大。

诽谤的背后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如此持续的歪曲大寨的真实情况呢？

邓和他的一帮用“实事求是”的口号维护自己的权力。^[0]然而当实际情况与他们所推行的政策相抵触时，事实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今的政策需要干部来挑战毛时代的典型；然而更好的是抛弃它。报告应当表明“责任制”比集体制更有效率，不仅是在那些明显停滞的四川或者安徽的小村，更应当首先包括位处山西丘陵地带的毛时代的典型公社。

诋毁大寨的故事到了这步田地就跟“实事求是”毫不搭边了。大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挂帅”、“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先公后私”作为原则的典范。大寨的成功，并不是如改革者们现在所宣称那样，是由于国家补贴和军队的人力支持，它归功于大寨人民的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和合作精神，归功于陈永贵的天才。如果合作化运动在中国普遍取得大寨那样的成功，整个农村改革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在 70 年代，中国 30% 的村庄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另外中间的 40%，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最下的 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模式，陷于停滞之中，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后 30% 农村的回答。这些地方实施责任制以后，很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不管中间的 40% 和发展最快的 30% 的农村居民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为了替私有化的不可逆转扫清障碍，改革者发现他们必须毫不含糊的抹黑、诋毁、破坏所有代表正确方向、发展良好的农村样板，或是干脆不提它们^[0]，把这些样板打入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冷宫，使其影响完全消失。后面这种封杀的方法对那些不是很有名的公社是适用的，但对像大寨、张庄这样的公社则不起作用。这样，在改革的实践和“实事求是”的口号上产生了不寻常的矛盾，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批集体经济可以很繁荣兴旺的、健康的发展起来。真理，这个在中国早期剧变中频繁提起的词语，成为了改革的第一个牺牲品。

同样在改革后这么长一段时期里，真理在雇佣劳动问题上也是牺牲品。在否认了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之后，改革的领导者们继续否认：农村中一些农民通过雇工而富裕起来，其中包含着剥削剩余价值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长时间忽视改革以来大寨煤矿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在那里一个农村可以剥削另一个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样的措施对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应该把中国未来的其他讨论先放在一边，首先讨论这一问题。然而年复一年，官方农村政策的发言人仅仅不断重复，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是完全没问题的。其他人需要的是使自己追赶上来。

最终，在党的 13 大上，中国的领导者态度大倒退。文件说，从此不再对私营企业、股份公司和合作经济的雇工问题进行限制，在发展的现阶段这些都是合法的。在理论上所有的这一切都用一个突

然创造的社会主义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辩护，同时为一种新型的企业辩护——私营而非个体经济。个体经济不过是一种小私有者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类似于夫妻店，当这种经济形态雇佣的人数增加时，就会逐渐转变为私营经济。

[0]这真是令人心神爽快啊。不必再否认，不必再逃避，只要公开的支持这种长期以来已在全国迅速蔓延的通过雇佣劳动的剥削进行原始积累的方式就行了！

这时，社会主义的含义对他们而言，也不像前一个阶段那么重要了。因为当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不管它在理论上是否理由充分，也不管它在实践上是否安全可靠。混合经济带有天生的不稳定性，这也是毛为什么在过渡阶段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将管理权完全承包给私人，经理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经理决定买卖等一切生产行为，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资源和主要的生产资料上的公有制将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决不是不证自明的。与经济的私有部门的扩张同时进行的，是对生产资料控制者的普遍的多重的优惠政策，控制的越多，优惠也就越多。

在这样新措施下，所有的经济部门中都产生了大范围的两极分化，同时产生了既得利益，改革的现状是不稳定的，它正朝资本主义倾斜——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的却是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

自从 1983 年实施改革以来，大寨人对两极分化也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业或用政府廉价贷款购买卡车和拖拉机的人都利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暴富起来，每年家庭收入超过 1 万元。而那些缺少资本、信贷或劳动力的人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一个前妇女领袖耕种 3 亩地，1986 年卖掉 600 斤粮食得到 100 元。此外她和她丈夫还可以得到每人 72 元的养老金，但她却从未看见这笔钱。镇上扣除了这笔钱，用于偿还镇上给她家的那台彩电——而她从中实际得不到什么。新闻媒体经常吹嘘大寨居民增加了多少台电视、家用电器，却没有提及有多少真正是村民购买的。

原来公社中人们通过按劳分配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很快变成了一种分层的分配制度：少数居于顶层分享非劳动所得；中间的大部分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最穷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资本资产的多寡——包括拥有的或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量，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过去和现在，充满讽刺意味的教训

总结了大寨过去和现在的教训，人们不能不对大寨的现状感到巨大的讽刺。曾经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标志的大寨，现在走入了它的对立面。成熟的改革使现在的大寨，几乎成了中国整个农业面临的危险的代表。新的政策在农村毫无疑问刺激了可观的副业生产高潮，尤其在昔阳县这样有非农业资源（如煤）可以利用的地区。而越来越清楚的是，改革政策对土地、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缺乏“持久的动力”。1984 年的农业大丰收后，1985 年粮食产量下降了 3000 万吨，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迹象表明，尚未公布的 1987 年的粮食产量数据，可能还要大幅下降¹⁵。

1987 年 10 月 31 日的《中国日报》上，引用了邓小平的话，他认为 90 年代的其他领域都将取得顺利的发展，但他唯独担心农业生产。其他领导人最近纷纷引用这段话，抱怨改革的负面结果——农田水利工程大量损坏，耕地面积迅速收缩，土地肥力下降，农田抵御灾害能力下降，还有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共机构日益衰弱。《中国日报》报道说，问题的根源是“农村积累基金机制的不完善……我们过去以为农民会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扩大生产规模的问题……但我们却没有看到农民积累能力是多么的脆弱……农民近些年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花费在了非生产用途上，例如购买消费品和盖房子。”

大寨的今天生动的说明了这些问题。当非农企业——煤矿、货运、拖拉机——繁荣起来时，农业一点点衰败下去，基础建设被破坏掉了，随之土壤肥力下降、产量下降、技术支持减弱。最令人震惊的是，以往交售公粮的比例甚至高于“北大荒”机械化国营农场的大寨，今年（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

¹⁵ 1988 年 2 月 2 日的《中国日报》公布了 1987 年的粮食产量为 40120 万吨。但这一数字受到置疑，这个数字几乎就是计划的数字。中国的官员在制作年度报告时，如果被允许在计划数字和真实数字之间做选择，他们经常会选择计划数字以显示成就。有谁会愿意破坏现状承担责任呢？

收获的粮食却不够当地人的口粮。

1987 年，大寨种植了 506 亩玉米，估计亩产 174 公斤，总计 88 吨。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吃玉米，大寨的农民卖掉玉米换取小麦，两斤玉米换一斤白面，88 吨玉米脱干变成了 82 吨玉米粒，换了 41 吨白面。按照每人每天消费 0.7 斤白面，大寨的 504 个人一年应消费大约 64 吨多一点。这样，按照官方的数字，1987 年大寨的短缺 23 吨白面。那么这会不会形成饥荒呢？不会。因为每年他们都瞒报粮食产量，把一部分谷物储存起来，以此度过歉收的年份。今年，很多家庭就仍然在吃 1983 年大丰收后储存的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知道每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呢？答案是政府并不知道，也没有人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过是，作物产量下降了。对大寨人而言，这无关紧要。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忙于副业生产。在煤矿中，一个人每天可以赚 9 块钱，矿工不必再种谷物，他们可以直接用钱买。但如果粮食减产遍布全国，形势的危险就会显然了。

如果很多村庄都无法种植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粮食短缺就会最终达到无法用其他替代资源弥补的地步。这是萦绕在改革者们心头的恐惧，也是责任制的软肋。在中国，粮食生产绝非副业。正如毛所经常指出的，它是“纲”。当你像邓那样担心 90 年代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时，你担心的实际是大约 8 亿人的主要活动和基本生活来源，以及超过 10 亿人的食品供给。你担心的是经济的命脉。在这方面还不得不听听中国农民的声音。而他们现在已经在用脚投票了。

毛泽东农村政策再思¹⁶

大寨 毛泽东农村 政策再思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失败案例是否在总体数量上多于成功的？我的结论是否定的。一些倡导改革的年轻的经济学家认为，1980年30%的人民公社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中间的40%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也可以说存在危机，总之面临着很多问题。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把下层的30%与中间的40%加起来，认为主体状况不佳；也可以把上层的30%与中间的40%加起来，认为主体至少说的过去；或者，还可以说成功和失败的数量大致相当（各占30%），但折中的结果占主体（40%）。

我认为最后一种结论比较现实。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这意味着2亿4千万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既然这么多人能够进行合作化，那么合作化确实是中国农民一条可行的出路。2亿4千万农民能够通过政府的帮助和重组以及他们个人的努力开展很好的合作，那么对于中间那40%的3亿2千万人也一样可以。

当然，我的数据可能有问题，其它对成败的比例有不同说法的研究在这里暂不讨论。但是，即使成功的合作化例子占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几千万农民可以有很好的合作化，意义也是极其重大的，几千万人可以做到的，其他几千万人也可以。这就是大寨在毛泽东时代作为成功典型在全国宣传这一问题的性质所在。如果大寨是成功典型，那么它就指明了其他农村、农民可以学习的一条道路。

粮食战线

我不太多争论关于中国的谷物产量在大集体生产时期仅仅能跟人口增长保持同步的观点。这确实是事实，尽管许多状况良好的生产集体产量以二倍、三倍、四倍的速度增加。如果说大量的生产集体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产潜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农业合作社生来就是行不通的则让人难以理解的。既然到现在大集体生产至少已经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5或6年，那么就应该问：新的制度有没有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呢？

答案显然是：没有。自从1984年政府报道当年的谷物产量超过4亿吨以后，官方数字显示了一个急剧的下降，然后，在1985年，没有扣除地面损失的产量出现了缓慢增长现在，新闻媒体例行公事地报道粮食生产停滞、粮食短缺、产量下降，最后，在今年又报道了两千万农民面临饥荒，另外八千万陷入严重的粮食困境，两亿人面临农作物减产。

此外，就我所知，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并没有达到它声称的4亿吨。那年市场上充足的粮食供应只有一部分来自当年的产量。剩下的部分由集体生产时期的粮食库存提供。这些粮食在市场上出售，或者在生产集体分散时被分发给农民。在此时将粮食卖出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改革后粮价的急剧上涨，以及超额售粮能够得到的奖金。出于同样原因，1985年报道的大幅度的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生产的失败，而是储备的粮食被耗尽了。1983至1988年真实的作物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5亿吨到3.8亿吨之间。如果我们把最高的年产量（已是非常乐观了）在11亿人（目前估计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得到人均的粮食拥有量为345千克，这并不比休·迪恩报告的1978年的平均数字高多少。由此看来，改革并没有改变粮食问题的状况。

并不是说所有有关集体化的指示和政策都是对的。一个被改革者频繁突出的观点是在集体化时代被夸大执行的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grain is the key link）的政策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

¹⁶ 《大寨反思》刊登在每月评论1988年3月号上，Herb和Ruth Gansberg也在每月评论1988年9月号上发表了相呼应的文章《大寨再思》。此后Hugh Deane写了一篇回复，作为对上述两篇文章的反驳。他的观点代表了改革派对毛的政策尤其是农村政策的控诉。本文针对他的主要观点，对这些控诉予以驳斥。

很明显，在合作社时期政府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石油和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副业。然而并不明显的是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以及谁该为此负责任。毛泽东的口号并没有错误的地方，这个口号全面而可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这个口号在那个时候是合适的，而且现在也是合适的。把粮食称为纲意味着它并不是全部，并且在粮食生产搞得好的同时，链条中的其他链环也必须而且能够发展。

如果在特定的时期片面的政策减少了多样化，那么解决的办法是纠正那些片面的政策。在合作化运动中没有什么因素抑制了多样化。事实上，领导得好的合作社比私有化经济中的个体农民更能实现多样化，更能采用所有的技术、才能和资源。在 20 世纪的 60、70、80 年代，许多出色的公社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北京市市郊的窦店。

迪恩提出的另外一个附和改革者的观点是在合作化时代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不可否认的是，在大部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的地区，生活水平确实是停滞的。但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则没有停滞，某些公社实现了非凡的繁荣。42.8%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 50 元，这与提供给我的收入结构按 30-40-30 分层数据相矛盾，但这个数字究竟是总收入还是可支配收入，所指的并不是很明确。在合作社时代，许多服务和福利是免费提供的，人们也能分享公社的公积金，并且也作为拥有者从公社的投资中增加了收入，还有生产费用都由公社支付。在作比较之前，必须先认真分析被比较的各个概念。真实收入可能至少两倍于所报告的 50 元。但是，当然，根据日常需要，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是必要的，并且农村整体上并没有产生本应该产生的、与它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所拥有的潜力相对称的发展。停滞不前的地区，不管是 30% 还是 42.8%，在数量上太多了，也太广阔了。农村确实需要改变。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改变，而是应该怎样改变，难道在合作社体制范围内没有有效的选择可以用来克服停滞吗？私有化是解决被引起的问题的首选解决方法吗？

另外一个指控是西北的农村特别的贫困。在解放之后，偏远的山区确实趋向落后，尽管中央政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那片土地贫穷，远离市场，非农职业贫乏。集体制时代的农民面临着这些问题，私人承包制时代的农民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有在今天，农民们才独自地面对它们，独家独户，在对自然的斗争中和公平的市场上单打独斗，代替了以往作为一个公社一起承担风险的方式。在历史上，生活水平取决于公社经营的好坏，这可能是一个优点，也可能是一个缺点。但总体而言，一个黄土地上的农民会发现独自面对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1988 年，我在延安东北的黄土高原呆了一个月。我的印象是情形令人非常绝望。实行承包制的土地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因为首先农民买不起化肥，或者有钱也买不到。结果，他们开垦山上的坡地，并将之作为自留地，在耕种过程中破坏了这些土地。大坝、梯田和其他集体的工程设施都土崩瓦解了。我们看见废弃的灌溉系统和被冲毁的土木工程。很明显，这些设施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可能在私有制经济中建设，并且它们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恢复。跟我们随意交谈的农民非常生气，并且说在合作社体制下他们过得更好、更富裕。

剪刀差

迪恩提出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策使农民牺牲了太多。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投资的积累来源只有农业，没有其它选择。政府规定的谷类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城市有低价粮食供应，也使城市工人们的工资保持较低水平。这样的政策提供了低价的原材料，有了廉价的粮食和原料，工业的积累速度就可以保持高水平。机器、设备、农药和化肥等又流回农业作为投入。从 1953 年到 1977 年 4.27% 的工业总投资流入农业投入品，这些产品都以很低价格卖给农民，并且价格随着时间逐渐下降。在 1959 年农民以 116500 公斤的小麦换回一台 75 马力的拖拉机，到 1979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53500（公斤）。在 1950 年 1.6 公斤小麦换 1 公斤化肥，到 1979 年 0.5 公斤小麦就可以买 1 公斤化肥。1960 年 35 公斤小麦换的 1 公斤农药，到 1979 年 5 公斤小麦就可以买到。¹⁷

农业的确被剥削，但是没有被耗尽，而是与工业建立了互助发展的关系，由于现代化产品的使用得到了带动，使得剪刀差逐步缩小。

¹⁷ 数据来自金宝喻 1988 年 11 月所写《中国农村改革和粮食生产》一文（Ching Pao-yu, "Chinas Rural Reform and Grain," unpub. ms.）

此外，国家在农村基础建设上进行直接投资，以帮助农村的发展。农业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总投资的 7.3%，到 1978 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 11.4%；国家的农业收入中返回农业投资的比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 49%到二五期间的 56%，到四五、五五期间的 164%。¹⁸

1980 年以来，国家直接农业投资和向农业提供产品的工业投资都大大减少。向农业提供产品的工业投资从 1953-1977 的平均 4.27%下降到 1980-1985 的平均 1.3%。基础建设的直接投资从 1978 年的 11.5%跌到 1980-1985 年的 6.3%，到 1985-1987 的 4%。同时，农民的人均人力投入（主要是农业基础设施）在 70 年代后期每年 80 亿工作日，现在连该数量的 1/4 都达不到。这两项指标的减少导致了对生产条件改造的后退，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¹⁹

然而，尽管粮食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剪刀差加大了。最近的五到七年里，化肥价格上涨了 37.7%-60%，柴油机燃料上涨了 22%，电价上涨了 167%，灌溉水上涨了 100%-200%，使得生产成本提高，农民为工业投入的现金减少，那么实际上购买的投入更是下降²⁰。我认为，农业生产者进入市场的范围越大，剪刀差就越严重，他们就受到更严重的剥夺。

迪恩也认为毛的政策造成了过高的积累率。我认为有些时候的确是这样。尽快改造世界的高涨热情下，一些干部受到误导，把一些时期一些地区的积累率推到非理性的水平。这一条对于全中国的农村是否成立，还不清楚。我认为可以找一个很好的案例来说明。但是，这不是合作化中的必备因素。积累率由政策决定，不必为了在消费和投资之间权衡而放弃整个机制。

迪恩认为福利在积累基金（accumulation funds）中的比例在 20 年中从 40.2%跌到 22.5%，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数字并不一定说明福利基金的绝对下降，还要看基金的规模。既然生产量上去了（尽管很慢），积累也应当是提高了。

命令主义（Commandism）

改革者声称毛泽东强迫农民进行合作化，因而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确切地说，在合作化建立期间，以及整个集体化时期，都存在着命令主义。干部们在许多农民在并不了解合作化意义、不愿意进入合作化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让他们入社。这与自愿实行的精神相违背，在很多地方严重的阻碍了合作化运动。强行建立的合作化组织蜕化成了封建领地，有些掌权的共产党干部甚至比他们取代的地主还要恶劣。

命令主义，一般表现为日常运行中官僚主义的干涉，即使在最好的合作社中也是如此，这一点严重的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合作化组织需要更多自治，尤其是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投资分配的管理方面。我敢说，如果当时合作社的权利能赶上 80 年代包干到户时个人得到的权利的一半，合作化成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当年的数字。仅仅是这样的一条规定就给合作化制度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这条新规定就是，农民不一定耕种合同上规定的粮食，可以耕种其它的作物，通过买卖得到粮食而后按量上缴即可。那么每个农户可以自己判断什么作物的收益最大，自行决定种植什么。合作化本来也可以在这个方面下放自治权，如果粮食产量不足，政府可以使用价格激励维持平衡，正如改革以来不断使用的措施一样。近年来价格控制引起了很大程度的不平衡，但是这是改革新形势下的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如何对市场进行控制，与之相关还包括拒绝价格承诺，农业投入品无限制的涨价，腐败等等改革带来的新情况。

不用怀疑，命令主义是一个严重而且持续的问题，但是要说明 : 62

[0]命令主义和合作化总是同时出现却不容易。解决官僚问题，要引入更多的自治和民主，使用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指令来影响生产决策。几万个合作化单元不可能不互相联系，并联系到国有经济，就像当前的个体能够做到的一样。破坏了合作化运动的命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延伸，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制风气抬头。中国的官员声称他们有权管理所有事务，甚至人民生活的小事。这是非常封建的传统，普通老百姓对此极为反感，这也是深圳等地的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特别为中国的普通市民关注的原因之一。对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压制的人们来说，金钱关系似乎成为一种解放，有

¹⁸ 同上

¹⁹ 同上

²⁰ 同上

价值的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是能力。（当然，至今，能够支配金钱操纵地位的依然是高干子弟。）

讽刺的是，那些打着反命令主义旗帜的改革者，又一次通过命令解除了农村的合作制经济。当然，许多农民很欢迎承包制，对解除合作制举双手赞成，但是还有很多农民不是这样的态度。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迪恩必须为他所声称的农民用脚投票支持单干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数据。一刀切在中国太过普遍，各级官员收到中央的精神后，狂吹政治风，对拖延不办的进行严厉制裁，而对反对意见不闻不问。所以要知道人们的真正想法和需要实在很难。就像命令主义把很多农民强行推入合作化时一样，命令主义又一次将这些农民拉出了合作制。

私有化风潮

张庄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达两年，最终以失败告终——高层领导给当地党委一纸最后通牒，命令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在当地完成承包制，否则开除党籍。王公庄的领导躲过了这样的最后通牒，县里领导一来他们就躲。

在中国零星的存在着一些公社，他们根本没有解除集体制，或者只进行了表面的改造但仍保持着坚固的集体核心。可惜的是，在我的观点里，他们是太小的一部分，或许 1% 还要少。在这里我们想反映的是农民的真实愿望。在大规模的运动下，在违抗处罚服从有赏的情况下，在回到过去总比开创未来更容易的意识下，改革者能够解除集体制（哪怕是运转良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经济萧条，集体制与其说是解放生产者的自愿组织还不如说更像封建农奴的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毋庸置疑，农民把这次改革当成“二次解放”。能够摆脱头上的干部让他们欢天喜地。但是农村从整体来看，农民的处境千差万别，有大量的成功的人民公社，也有更多的不甚成功的，前景也各不相同，都有不甚乐观的情况。

在这样情形下个体农户的心态相去甚远。即使在管理最好的、最成功的、最得民众支持的公社中，有一技之长或者很有体力的农民都希望单独劳动。越是不成功的公社，这样的想法越是普遍。然而，即使在那些经营非常不善的公社里，仍有许多没有特别的本事的、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体力的、把集体化看作救星的农户，想继续维持集体制。在不同的地方总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有远见的个人，他们在哪种体制下都可以干得很好，但是他们在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意识到只有合作制才是中国农民的出路，于是才努力为之奋斗。他们只是想要在到来的社会繁荣中的平等一份，别无他求。我私下认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反对私有化，被改革者们称为保守派。

许多人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改革中颁布法律政策、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进展程度。1983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允许私人雇佣体力，允许购买大规模生产工具（设备、拖拉机、卡车等），允许私人投资的资本积累，允许向个人出租集体财产。紧接着，开始有人从事高利贷。新的财政信用政策对私有经济放松了税收政策，允许银行向这些企业还有个人发放自由银行贷款，实际上同时堵塞了集体生产企业、农村大队的信用渠道。家族企业越大，私有经济越发达，贷款条件就越有利，也就越容易得到贷款。承包集体企业的个人有对工人的聘用解雇权，有确定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的权利；而且如果他们对企业加大投资，他们就有将企业逐渐变为私有财产的权利。

此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者仅仅是忽视了，在清算集体财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耻的剥夺——这使得那些有“钱、力、本事”的所谓特殊家庭迅速先富起来。在瓜分集体资产的时候，有影响有关系的那些人——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亲信，可以大折扣的买到拖拉机、卡车、井、泵、设备等，这些都是集体在几十年里公社成员们一起奋斗积累下来的。这些买方不仅能够给资产开低价（经常是实际价值的 1/3 甚至还少），而且能够很容易得从国家银行拿到贷款，最后经常也没有按条件还贷款。特权阶层如此尽情的侵吞财产，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场交易的规模之广、对普通社员的利益的损害之深真让人难以想象。

公共财产的迅速清算、能够从容地分得一杯羹的特权阶层的大规模“先富”、以及有足够的财富成为“专业户”的人能享受到的优厚的待遇——有鉴于此，改革席卷一切的“滚雪球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旦这样的让自己致富的风气刮起来，那么大多数人也就会很快意识到应该抓住眼前的利益捞一把。在周围都是立即抓住财富和利益的情况下，要退让、要因大局利益将集体牢牢团结住是十分困难的。不仅如此，私有化后的农民看到尚存的集体中有粮食和财产，伺机瓜分，又一些公共财产面临清算。集体变成被环伺的孤岛，很难团结起来。

意识到上述情形，究竟有多少农民支持改革似乎是个不相干的问题了。他们面临的不是二选其一的问题。从中心层而言，决定早就做好了。一家之主必须考虑公社解散后如何能使家族财产和收入最大，在利益还不错的时候如何获取最大份额，保证将来不处于劣势。

一个流行说法，迪恩也提到过的，是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在毛泽东时代下滑，在改革后迅速提高，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在一些管理不善的公社里，士气不振，人们浪费很多时间，但是生产的规模、土地的规模、合理设计的灌溉系统、土地机械的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士气的问题。在改革的第一起浪潮之后，人们耕种原面积的土地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亩产量上去了，但是根据每小时的产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显然下降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分离耕作。改革把大块田地分割成窄小的条块，经常不过几米、十几米宽。有时候用手推车去卸肥料、运庄稼都不行，更别说用拖拉机去犁地、播种和收割了。改革把锄头确立为卓越的农具，并且保证不会有其它更先进的工具能很快的代替它。

现实上看来，改革带来了巨大动力。人们起得更早，劳动更卖力，在田里待得更久，原来大块的田地可以按部就班的耕种，现在人们小家小户的分散开侍弄。这并不和近年来拖拉机数量猛增的事实相抵触，大部分的拖拉机根本没用在田里，而是用在农田和公路之间的运输上了。小块而且分散的农田使得拖拉机十分浪费，但是农民们必须有一定的农田工具和设备，他们不得不进行这种过度投资。

迪恩还反复提到灾难性的大跃进，而且毛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应该如何评价大跃进？我认为，对大跃进（Great Leap）的评价有一致的观点，大跃进中出现的理想主义（utopianism）、主观主义（voluntarism）、命令主义（commandism）、大干快上（gigantism）、急功近利（egalitarianism）和其它不良风气，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引起的混乱，是导致生产危机、粮食歉收和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大饥荒的影响面和破坏程度尚不清楚。）现在讨论自然灾害和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影响孰轻孰重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两者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大跃进中的政治问题，还有究竟是毛的想法本身有缺陷还是执行中出现了偏差，都是值得深入的探讨的。

大跃进是要动员中国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开发未利用的资源——边角土地、灌溉渠道、矿物等，这不是一个荒谬的目标。湖南有一些公社创造性的把公社当作集中劳动力从事大项目的方式。毛泽东也对此表示赞成，他认识这是释放人们潜力、继续解放的过程。在创造非官僚主义化的自治组织，自行管理当地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的过程中，农民在废除传统地方权力体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些做法震动了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错误的、危险的、理想主义”。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写道：

毛泽东主义者（Maoist）在理论上赋予公社的政治功能，以及人民公社的现实，对当时党内和地方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人民公社能够按毛泽东的设想一样发展，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将已经土崩瓦解，正如马克思歌颂的，在巴黎公社中夺回被地方篡夺的社会权力还给生产者。公社的反官僚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既得利益阶层对这种威胁做出了迅速反映。²¹

这段话强调了一个被传统学院派和当今中国官方认为无足轻重问题，那就是（可以看作当时的政治背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革命方向问题上，党内和社会上存在重大分歧。1949年后，长期存在两个司令部对立日益明晰。一派是毛泽东为首的，主张建设土改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派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主张扩张和巩固新民主的混合经济（现在被改革者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派都有党内外从高层到底层的拥护者。由于后者控制着中共中央组织部（Party Organization Department），负责干部的任免、奖惩、教育和党组织建设，有更多机会进行公开声明和政策管理。尽管如此，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派仍占了上风。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并非直截了当被动员起来进行合作化，相反经历了严峻而长期的斗争——双方相互采取行动争夺主动权的拉锯战。这场斗争从合作化的第一步起就开始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直到今天——农村集体大部分早就被解散的今天还在继续。

毛一直保持着优势（The predominance of Mao was never more than marginal），这来源于他获得下

²¹ 迈斯纳，《毛时代的中国》第241页，1977年发表于纽约《自由时报》（Mao's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241.）

层支持的魅力。他直接向激进群体和基层群众直接发表演讲，以此避开反对意见，给刘邓造成一系列的既成事实，而刘邓也操控手下的广大职能机关造成既成事实予以回击。

在这样的气候下，政策极容易歪曲最初面貌甚至走向反面，政策的优势减弱了，缺点却被放大。如果职能人员对政策的结果没有信心甚至持反对意见，还能希望他们能够执行像合作化这样复杂的政策吗？他们对中央的各种消极信号非常的敏感，他们懂得如何拖延不办，如何反其道行之，把上头指示执行到荒谬的地步，然后归咎于政策的失败。

世俗力量现在把毛和毛主义者斥为偏激、极左、乌托邦、唯意志论，同时却赞赏刘少奇和其官僚体系为一贯的、冷静的混合经济路线。确实，毛曾经高估过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端风潮兴起打开方便之门，但毛并不是像当前社会所指责的那样“左”，例如，他建议20个而不是2个5年计划（100年而不是10年）从集体所有转入共产主义所有制，并且鲜明反对集体剥夺私人财产和其他形式的平均主义如“一平二调”的蔓延。

形“左”实右

在相反的方面，有太多的证据显示，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复的在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之间摇摆。面对二战时国内战争的恐惧，他从土改退却，但当土地革命爆发出来并且无法遏制时，他跳出来开始执行“左”的“贫雇农路线”，这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由于疏远了中农和其他中间力量，几乎把革命变成了灾难。这条路线攻击那些真正执行土改政策的革命农民群众，说他们没有创造“平等”，破坏性的极左做法将朋友和敌人混淆在一起。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和后来的文革初期，刘均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说着超级革命的词语，反复的把斗争目标针对基层干部，却根本不触动上层的错误路线，这些都阻碍了毛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的战役。

然而另一件事情不太好证明，在大跃进期间，刘派官僚把农村搞得一片混乱的、形“左”实右的极左策略究竟是不是有意识的对毛的反击。他们所有的人都采取“一刀切”（"one stroke of the knife"）的手法，当一项政策颁布下来时，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并把它极端化去执行。如果毛号召以粮为纲，他们就把所有的果树都拔掉去种谷物、降低油料改种粮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该种树的地方种粮食，如此等等。如果毛号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们就要求耕地两英尺、然后三英尺，就这样将劳动浪费了无效的工作上。密植、大炼钢铁、集体食堂、供给制以及农村劳动军事化等问题上都是同样——把每一件事都极端化。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尤其中层的领导干部，是由刘派提拔的基层干部组成的，深受刘的路线制约和影响，既然如此，就很难把所有的一切罪恶都归于毛派分子身上。在中国的官场上，挑衅是一种进攻的最有力武器。要将一件事情罪恶化，没有一种办法比将其以夸张的手法极端执行更好了。如果你无法战胜它，就先加入它，将灾难将要发生的预言化作自己去执行的计划。我相信这样的行为确实发生了。

换一个视角，考虑到如下的因素，所有的争论都不相关：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农业合作生产的生存能力。58年运动脱轨后最后明确下来的东西，就是“队-大队-公社”的三级所有体系，6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70年代、直至80年代，它在亿万农民中完好的发挥着作用。集体经济应该从它们取得的成果来进行评价，它的意义深远、潜力巨大，它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机械化提供了基础社会结构，而中国农村现在却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深束缚着，农村现代化完全被打断。

迪恩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跃进期间水库，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他还尤其提到中国北方平原的盐碱化问题。毫无疑问，大跃进确实给某些地方的环境造成了一些损害，然而，那些损害远比不上大跃进期间为环境保护而进行的工程。而且，大跃进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比起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对环境的破坏，简直是没法比。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的口号下，亿万农民争相做那些可以短期迅速增加收入的一切事情。牧民不顾一切的在草原上过度放牧，农民则烧掉草地开始无限制拓荒耕种，守林人不顾一切的砍伐他们能够找到的树木。到处是这样的现象，尤其在山西北部黄土高原、四川西部的多山地区和河北北部山区（我自己曾经亲自观察到的地方）更是如此，农民将所有的山坡都开为耕地，而那些地方从来都未大块开垦过。毋庸置疑，历史上从未这样大范围的开发过，中国现在到处都发生着这样的对环境的破坏。

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中国最近在黄河下游执行了几个排水和脱盐的工程。我参观了其中之一，

这个工程完成还没有两年。短视的农民已经堵塞了很多三级渠道，目的是为了给他们小的可怜的土地多增加一点点水。土地分割细碎化、让每个家庭仅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诸如此类的政策实际上也注定了这样的破坏。没有任何规章和劝告可以制止这样的行为。也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警察站在每一条沟渠旁边看着。

文化革命

还有人谴责毛，说大跃进的方向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文革是否像通常宣传的那样，是个大灾难呢？而且，即便如此，是不是只有毛一个人对此负责呢？这是一个比大跃进更大、更复杂的问题，然而它们的答案却是相同的——毛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为贯彻社会主义方向而进行的尝试。这里，又一次，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的基本分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事实已经证明，毛正确的评价了反对派的作用，毛提出要看他们代表谁、想利用权力做什么。自从毛逝世和华国锋下台后，邓和他的官僚们一步步的拆除了几乎所有前 30 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他们迫不及待的将剩下的一切瓦解掉。最近关于发行股票的建议预示了未来不久它将卖掉现在仍占 80% 工业比重的国有企业部门，而现在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是改革者们实践社会主义的旗子。看一看过去政权逐渐加快的私有化速度，似乎政权不会在 80% 或是以下的某一个比例停下私有化的脚步。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到那时社会主义还会剩下什么呢？

毛早看到了这一点，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把刘和邓称作“走资派”。他发动了史无前例（注：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和邓意见一致）的文革，主要就是为了从政权中清除这些人，阻止他们执行资本主义的路线。最后，毛失败了。这里要记住的是，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一场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一种革命战争的形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不仅仅是毛要执行的一些政策——“早请示，晚汇报”。正像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但却是在更广的范围内，文革释放出了革命和反动、主动和被动、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只谴责毛，说文革引起了生产的倒退和破坏，这跟国民党骂共产党发动解放战争中断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样的手法。“他们不会做任何建设”，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对我抱怨，“他们能做的就是炸毁铁路桥梁。”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造反的话，中国将早就得到和平和重建起来了，国民党总是这么说的。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要想执行一种政策，你必须掌握政权。1949 年革命胜利，共产党人继承了旧中国的烂摊子，同时也继承了原有的阶级对抗，虽然在致命的敌人面前这种对抗没有激化。解放战争硝烟未尽，关于土地政策的分歧和矛盾就爆发出来。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看，战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所有的力量都碰撞在一起，所有问题都被提出来——往往都反映到党内。这样斗争形式就变成了对党内控制权的争夺，通过控制党来控制整个国家。毛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现象，很早就开始对反对派进行斗争。随着时间发展，斗争也不断升级，终于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尽管毛在过去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赢得过战斗的胜利，但他发现当他号召“炮轰司令部”时，一切都差的太远了。毛把工人阶级的理想、文化、习俗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但这些都没有巩固下来，相反，文革事实上在僵局中结束，双方纠缠在一起，如迪恩所描述的，社会面临三重失信——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未来失去信心；当然是多重的危机。

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四人帮极左的思想和行动造成的，他们把局面无限复杂化。我不同意“五人帮”（四人帮加毛）的说法，虽然毛要对一开始提拔他们而负责。他们很粗暴的歪曲毛的政策和指示，将合理的能动性推向极端，将黑白颠倒，把他们能碰到的一切东西打翻。虽然早期毛能够纠正右倾和“左”倾错误，但在 60 年代他发现，在“左倾主义”问题上他已被逼上梁山了——实质上，因为同右的尖锐对立，在处理“左”时不得不有所顾忌。²²但在 60 年代他还是发现，由于“极左”的干扰，自己可能要重上“梁山”——实质上，他认为他必须得处理“左”的问题了。

文革毫无疑问结束于危机之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萧条是否就要转向市场，技术落后是否就要

²² 主席在 1967 年 7 月 8 日给江青同志的信中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世界开放呢。邓派官僚们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这是他们一向的计划，但这种做法对中国而言是否最有利呢？

迪恩认为这些政策从 50 年代中期起就一直是毛主义的替代方案。但我不同意这一点。人们可以辩解中国今天可以走刘邓路线（即使我并不这么认为），但却很难表明在 1950 年代可能有那样的选择。

首先，“开放”并不由中国掌控。毛从来没有想把中国同西方隔离开来，他非常愿意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正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封锁了一切联系，断交、撤回侨民、禁运、贸易封锁等等，尤其禁运最为严厉，甚至我每个月想寄给北京的女儿 25 美元都不行。在敌视性贸易制裁下，我只能每 6 个月去搞一个外国资产支配许可证来把钱寄去。[0]《中国日报》社的编辑吉恩·莫伊为一则关注海外华人汇款问题的广告接受了中国银行的资助，结果被送入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不利监狱。

其次，当时中国经济太弱小，无法同国外资本在同等水平上进行竞争。中国的金融体系很脆弱，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无论重工轻工都是如此，就连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运输、船舶工具、能源生产能力、自来水供应——也都是如此，商业网络不发达，还有非常落后的农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像今天一样实行开放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使国民经济步入任由外国资本宰割的地位。

再次，把外国资本的问题放在一边，如果中国那时就只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那么其发展只能是极其片面的——沿海某些地区极快的发展，而其它地方则陷于停滞。中央计划则能够将投资分配到全国各地，在内蒙古、山西东南、四川和云南建立钢铁工业，在山西、甘肃、黑龙江建立化学工业，在山西、湖南、湖北、四川建立纺织工业，在云南、湖南、四川、湖北和其它地方建立重工业和工作母机基地。1974 年版的泰晤士中国地图，展示了 20 个主要的工业基地和 20 个次要的工业基地，分散在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一些是老的工业基地（但是已经极大的发展了），但其中大多数是新兴的。30 年的艰苦奋斗造就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自然资源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各地较为均衡的发展也得到了保证。

第四，57 年以后合作农业可以将冬天农闲时的劳动力充分调动起来，中国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极大的改善了农业的基础结构。他们将上百万亩的荒山改造成梯田，翻造河堤使灌溉系统大大加强，防风林的建设有力的保护了农田，所有这一切都为高产稳产创造了条件，这是前所未有的。自从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仅没有新的资本和建设投入，连原有的工程体系都逐渐荒废了。每一个地方的基础建设，都是 60 - 70 年代苦心经营的结果，现在竟都七零八落，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完全逆转。

认为邓派官僚混和经济、自由市场的新政策能够取得超越毛时代的成果——不管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农业领域，都不过是纯粹的臆想罢了。将集体财产私有化、将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公共财富转移给占据优势地位的少数人——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短期刺激经济繁荣是一回事；而在之前创造出这些财富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卖方市场环境下为私营企业提供宽松的信贷、为了促进以利润为目的的商业生产将公有资产赠与私人经理、通过最终将危害到中国的经济独立和自主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搞活经济”是一回事；而在残酷的海外经济封锁条件下建立起一个有实力同西方平等贸易的经济基础则是另一回事——在此经济基础之上，中国能主动在经济交往中制定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从而不致沦为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

可疑的政策主张

这又必须回到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宣称关于对当前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上。迪恩认为，比起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增加了两倍，GNP 翻了一番。从国家统计局一年两次的报告中，或许可以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正如迪恩自己承认的那样，中国统计数据非常值得怀疑。

所谓的农民收入在集体解散以后增长两倍确实值得深思，众所周知，谷物的价格改革后上涨了 100 % 多，所以问题就在于收入增加多大程度上来源于价格的上涨？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果集体经济仍然保存下来的话，谷物价格上涨会给农村经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数据有没有修正此后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有人还会问，既然收入组成在集体向个体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迪恩所列举的改革前后的收入数据，是否比我在前文中分析过的大寨的类似数据更具有可比性？

考虑到通胀的因素，GNP 的数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推测起来 GNP 包括建筑领域的投资，这一项因素就使得 GNP 增大了很多，其中的问题在于：首先建筑投资多

少是用于生产性的、多少是用于非生产性的？所有的报告都指出，投资的比例是失衡的，消费比例大幅上升，这直接引起了通货膨胀。在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上，任何改革前后的对比都表明前者更高。当然，现在指控原来的积累率和投资率太高。如果说过去积累率太高可能存在问题，那么现在积累率如此低也确确实实是极大的错误，因为这样的话国家就只能靠印钞票、借钱、吃老本生存下去。

自从 1979 年，农村副业毫无疑问的取得了较大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并不是从农业生产中取得，而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非农生产大幅增加。但这里的数据对比也经常无法反映实际情况，就如在大寨发生的情况一样，过去就已经存在的副业所作出的贡献被完全抹煞了。整个的成绩被报道为没有改革开放就取得不了，这纯粹是歪曲。如果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采取正确的政策，集体经济的副业生产可以取得比现在的小农经济更快的发展。

还有相关的论断，说中国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了，这恐怕得看如何衡量各项影响因素了，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政治上，人们或许感觉到更加自由，但是在社会角度上看，他们必须面对所有新生的罪恶——如卖淫、乞讨、买卖儿童、胎儿流产、私人资本的剥削、各种疾病的流行（从梅毒到血吸虫病）普遍蔓延的腐败，还有现在最糟糕的，日益加速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令人不满的事物都在大量的增加。

迪恩写道：“一些系统的破坏在农村发生了，例如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对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以及通过政治手段获取资产和经济权力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中国复杂性的组成部分。”确实如此，但问题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部分吗？迪恩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于农村地区，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

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还存在一些搞得非常好的农村集体经济，它们比附近的个体经济强了许多倍。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一些人非常有勇气去质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也有机遇躲过、有勇气顶住私有化的风潮，果断的坚持了强有力的集体领导。如果政府决定重建集体经济，为期不会太远，集体经济部门就会显著的复苏起来。但迄今为止，政府没有这种倾向，很明显，没有任何有利于集体经济的意见和舆论在党的高层形成。那些勇于抵制分田的基层干部现在仍然遭受着惩罚，不时的被降级和调任。当权者现在热衷于讨论如何将大量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股东或是法人股东最好，而不是怎样在农村改革或者重建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要想生存下去并壮大起来，必须有稳定的政策土壤。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机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必须都要有利于集体经济。文化导向上必须鼓励“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伦理原则。类似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自己富足起来”的口号则是截然相反的方向。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倒退——某些无产阶级的反攻至少对当前的独裁者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最后，迪恩说我们需要毛时代的令人不快的真相。确实，我们需要真相，但我们能从改革者及其拥护者那里找到真相吗？我们找不到。如果事实确像迪恩描述的那样，谁能解释毛仍在广大农村、车间和很多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改革者拼命给毛泽东的名字抹黑，已经有 10 多年的时间了，许多年前当权者就命令党委会将毛的肖像从墙上摘下去，去年他们派一些人用手提钻拆除北大的毛泽东雕像，在这件事前后毛的形象突然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虽然还没有从天安门上消失。

但尽管如此，毛的肖像和胸章仍然可以在千百万农民、牧民、工人的家里和党委会的墙上发现，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这样说：“毕竟，老人家是对的！”

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毛主席断言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主席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

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因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工人阶级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援助。现代时期，这个由毛主席定义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无疑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而也无疑是社会主义走向繁荣的时代，这种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将会使中国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

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充分地动员了成千上万地工人和农民，不仅仅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且要没收所有帝国主义及其官僚买办阶级走狗的财产，所以这场革命的首要的目的决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计划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那就是一种有利于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和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一个民主革命的过渡时期，一个在土地改革完成和对四大家族垄断的财产（工业的，商业的，金融的）实行国有化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此后，高于一切的工作就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初一革命的边缘，因此毛主席无可辩驳的说明中国只有选择社会主义而别无选择。现在 50 年过去了，当恢复活力的资本主义证明了其暂时性的稳定性，而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困难地往前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资本主义下实现了经济的起

飞，于是幻想家就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时代错误的，缺乏时代性的，奇怪的逻辑。

在 10 年的国际国内战争，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 10 年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苛责却同西方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使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的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在改革开始时，设计师们乐观，自信，甚至骄傲自大；但当他们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足够的恶果，使人民开始怀疑整个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否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提上了议程。

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来说，仍同 20 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70 年代一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有着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一些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产生的，在土地改革和 30 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其中，至关重要的阻力是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中国的国家本质，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农民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贫穷的农民在所分得的小块土地上的能够生存的能力。

考虑到世界经济，改革者的策略是沿着“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化国家。那就是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外部的资本从而建立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业。这些日用品是供应世界市场的，它们首先是纺织品以及电子和电气用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创建了自由贸易区，在这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投资了数十亿，贷款了数十亿。他们对本国的加工产品的出口充满了希望，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想获取一个巩固的市场份额的努力仍然失败了。

这个失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经能够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胀的世界市场，现在它的膨胀速度变慢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商品的过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扰着全球。此时，韩国和其他的“ ” 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已经结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国为了建立针对中国的前进基地而进行的两场长期的战争从而为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提供了经济上的强有力的支持，四小龙是不可能走上跳跃式的快速发展的道路的。因为美国在这十年对外战争期间对侧翼包围中国的国家进行了大力援助。虽然现在很多中国人由于羡慕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而得出中国走了错误道路的结论，但是他们无法了解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引起了对美国的世纪的挑战，今天就决不会有环太平洋的“四小龙”。

其次，即使快速发展的机会仍然敞开着，即使市场是和往常一样有很大的吸收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输出的产品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吸收的了。对于一个只有数百万劳动力的小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的大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却是不可行的。中国复制环太平洋的“四小龙”这样的小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合理的。只有少数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的现在也正在走下坡路，更何况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这样同样走这条道路的竞争者因为无力偿付外债的而陷入严重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策略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国投资者让步从而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向国际市场开放：提高本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贷款的依赖性。由于无法偿还快速增长的外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冻结工人的工资，使货币贬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同时，内需的缩减也破坏了出口国家的经济，并加重了市场上产品的过剩。所以，这个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整个发展策略破产了。

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国家避免经济破坏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进行多元化的投资，为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国内市场从而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渐进性的税率（累进制税制），保障工人权力——以前中国所做的，中国在改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发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然寄托在一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上。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国家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的可用性，这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不会为中国提供一个适当的发展框架。

饭碗：金的，铁的，瓷的

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和外部的阻力一样巨大。可以这样来概括：金饭碗，铁饭碗，瓷

饭碗。金饭碗指的是那些国家系统中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者享有的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的工资，福利收入，和非法暴利收入。

他们使用的权力从本质上说是封建性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习惯势力深深扎根于中国旧社会，并获得高度发展。在官僚体制下，权力不是与财富、土地等等，而是和政府机构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作为革命的结果，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经济形态，官员得到了巨大的空前的经济权力。所以现在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用“权力经济”来描述中国的体制特点。华生，张学珍，罗小平（音译），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的文章用到了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的体制，说在政府的干涉下，自由市场规则是难以达到的。他们哀叹中国建立全国性市场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政治权力与经济管理权分开。中国经济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权力的操纵……真正的价格改革要求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进行革新。”他们宣称“真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需要政府放弃他对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直至经济实体的权利和职责。要允许市场参与者完全掌握他们的资产根据价格导向作出投资决定。”²³

但是有人要问：这个掌管一切的官僚体系的权力拥有者们怎么会自己清算他们的由历史得来的统治的特权，而让位于技术人员与暴发户操纵的不可捉摸的市场？历史没有这样的先例。实际上，这种观点在最近另一篇文章中争论得很厉害：“改革派无论怎样想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打破保守主义，他们都做不到，”理查德·史密斯写道，“因为允许真正的市场力量的存在并盛行，官僚们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也无法维持本阶级的再生。”²⁴

至今中国的改革已经把一部分中央的权力下放到低一级如省、主要的市，还有特别贸易区，但是这仅仅促进了低一级的官僚们通过行使手中的垄断权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这还常常意味着在损害周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条件下，保护与发展本地区经济利益。如果说改革的确打破了一些“职位特权”，它也绝没有削弱整个权力系统。同时，那些下派的权力已经无用了的独立王国事实上已经对中央的控制有了免疫力。

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官僚系统的阻力下怎样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是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中没有谁认为削弱传统的官僚体制是充满希望的，更不用提废除。所有这些现象与对发展社会主义一样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了一个同样大的障碍——这也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铁饭碗”指的是终生有保证的工作，适用于所有国家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改革者把这种工作保证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总工在国有企业中是相当普遍的，”华，张，罗写道。“他们依存于国家，实际上独占了他们所占的工作岗位……他们被终身雇佣不必担心失业和破产。”

改革者希望把岗位竞争与企业破产的“魔棒”投向这些工人。他们要改变生产关系，把受到终身雇佣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一样。

但是从工人的观点看来，终身的工作保障及相关的权力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是需要珍惜和保卫的东西。正是这些使得“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样的话语有着实际的意义。如果老板们可以随意雇佣和开除，如果失业储备军随时等待着占据为任何理由而空缺的位置，那么工人还有什么权力留下？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留下？

“如果只看到缺少自由缺少职业联盟和罢工的权力，[局外人]会以为工人阶级是无助的党控制下的牺牲品，”詹姆斯·帕特斯²⁵写道。“更近一点的观察一下中国工厂的情况，不管怎样，就会发现中国工人阶级是处在一个严密的关系网络下，可以保证工人们不被解雇，不被催逼过分劳动，不被任意管制驱使，工作的安全条件远远超过大部分的西方民主国家，将会被我们这里许多失业的钢铁工人所嫉妒。”帕斯特得出结论说改革“不仅是经济的改革，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政治标准更趋向于恢复管理特权而打破紧密的合作关系和革命以来一直实行的规范与原则的改革。”

实事求是地看，工厂生产的滑坡不是“铁饭碗”——革命给与工人的美好的工作保障——的不可

²³ 《中国日报》1988年12月，第四版，华等《高级经济学家回首10年改革历程》（Hua, Zhang, and Luo, cited in "Top Economists Look Back Over Decade of Reform," *The China Daily*, four-part series, December 1988, pt. 1.）

²⁴ 理查德·史密斯《阶级结构和经济改革》发表于1987年9月12日举办的哥伦比亚的现代中国研讨会上，论文集的第7页。

²⁵ James Petras, "Contradic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in China," unpub. ms., 1987, pp. 5-6.

避免的结果，而是由于给予政府官员，管理者，老板们的“金饭碗”而造成的。当干部们利用自己的职位特权来为自己为子女“与稀缺商品，合意的住房，出国与提升的机会等等建立联系”的时候²⁶，为什么工资劳动者要卖命？在过去，那些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可以发动劳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他们可以鼓舞起社会主义的生产热情，完成“更好，更快，更多，更省”的目标。但是获取这样的结果，他们必须对所有人用同样的标准。他们不可能先是自己富起来，然后再想着承担为人民服务，建设国家的义务。可惜在过去这样的干部太少了，今天更是不存在了。

然而，改革者并不关心“金饭碗”产生的问题。正好相反。一面说一些社会主义道德的空话，他们更相信以工人的权力为代价的全面管理特权。他们坚持使工人面临总体被解雇或者因破产而失业的境地。他们相信恐惧是勤勉的首要的来源。

这样的意识不可避免的要使改革者面临一场与工人阶级摊牌的战斗。而他们面对的工人阶级已经经历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不会轻易放弃任何来之不易的权力。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改革者还没有赢的把握。

小土地的保障

“瓷饭碗”指的是使用土地的权力，这项权力农民还保留着，作为土改中获得的土地的延续。我把它叫做瓷碗是因为从这一来源的收入是脆弱的。不像工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农民的收入是从土地的回报中获得的，它更多是汗水、病虫和天气决定的。农民播种，施肥，除草，收获，但是就绝大部分地区来说，他们所获得的多少往往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他们的瓷饭碗可能很慷慨的回报他们，也可能什么也没有。与金与铁不同，瓷饭碗更易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是靠老天爷的怜悯吃饭。

为了实行资本主义把市场变成中国最高的统治原则，必须创造原始积累的条件，也就是首先和首要的是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还要保证他们除了双手的技能外一无所有，——一句话，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

但是在 1950 年代早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个农民都分得一份最珍贵、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在合作化时期，他们把土地集中在一起，一个村一个村的，形成了集体所有并耕作的大片土地。几十年后国家开始把集体所有变为国有。这样，改革开始后，每个农民新获得就是在有限的年头内使用国有的一小块土地的权力。很正常，改革的推动下，公社首先按人口无论男人女人小孩分配了口粮田，然后承包出去所有余下的土地，给那些要种田生活的家庭种植商品粮，——其中一部分以规定价格卖给国家，余下的便到市场上卖掉，无论什么价格。这样的体系下，中国相当大比例的农业地区落在了经济发展的范围以外。土地成了不关心宏观经济情况的农村大部人的食物来源的最后的手段。无法充分就业又缺乏装备的农民，在好的天气状况下，还或许可以依赖微薄的产品维持生存。要发展，不管怎样，他们中的能人、壮劳力就要建立副业，或者到乡村外寻找工作。无论哪一条路，当挣的工资多起来，运输业繁荣，商贩们赚钱的时候，他们都倾向于忽视掉土地，耕作起来漫不经心，甚至就撂荒；然后当低迷时期来临时，他们就会从被忽视的土地上为获取一点收获而费尽努力。

改革者的如意算盘是打破大锅饭后，种田能手就能从不太爱种田的乡邻手中得到土地的承包权而使土地集中到很大的程度，可以使用机械化可以科学管理。但是既然多数的农民还把土地作为抗拒失业、企业破产或者个人的疾病与衰老的社会保障，很少人愿意转让出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即使他们并不亲自耕作。这对整个中国农业就意味着国家本已贫乏的土地——所有这些都该最大可能的利用——中一个很大的部分还要长久在其生产潜力以下生产。

新近的情况——信用的忽然收紧，成千的建设项目关停，成千的乡村企业的破产，从非农工作上剥离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这可以很好的说明，勉强接受人均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尽管对不愿一辈子守在地上，但对土地仍有一定的依赖性，民工可以在失业的时候回到土地上生存。但是不情愿离开土地也意味着中国的原始积累的条件不会很容易就达到。改革无法轻易把农民的劳动力变成一般状态的商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土地市场化。人均的土地使用权力，也便是承包权，尽管理论上是可以转让和购买，但是人们通常是不会放弃的。长远来看，粮食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威胁。掌握着承包使用权的大多数农民，不可能而实际也没有完全发挥土地的作用；另一面那些可能开发土地潜力的种田能手，

²⁶ 《中国日报》1988 年 12 月，第四版，张华等《高级经济学家回首 10 年改革历程》

又无法插手进来。

种田能手只能承包到人均分配后还余下的土地，只能在分散的一条一条的土地上耕作，“面条”，这就是中国农田的特点。因此，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低，很少人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能超过做其他工作的所得。所以为了让农民们留在村里继续耕种，一个又一个公社不得不给承包者提供免费的原料与服务。

于是私有化就造成了农业的停滞不前的状况。没有农业的雄厚基础，其它产业的繁荣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北京的权威们指责我们今年的煤矿开采不足，然后呢，他们把这归咎于运输能力低，最后归结为我们国家资源短缺。但是如果一个人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会发现，今年山西整个冬季煤矿供应不足，是因为在私人矿场与国营矿场工作的临时矿工——他们支撑了全省近一半的原煤产量——大量的辞职回家。而所以辞职的原因是由于自由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他们的工资还不够买粮食。因此能源的短缺本质上是由于粮食短缺。上面的种种现象——日用品市场上的过剩，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的过剩，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没有一样能够容易的解决，这就使得在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极其艰难和不稳定。

即使中国可以某种程度上逐步克服这些障碍，它所能达到的，如帕特斯指出过的，仅仅是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样的满是病痛的经济状况，“短期的增长，长期的停滞；对外的依赖，导致繁荣时期的资本流入和危机时期的资本流出；使竞争最大化，也加剧了阶级间对抗的管理控制。”²⁷这些后果却很少能与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自力更生才能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达到一个合理的富裕水平。

²⁷ Petras, "Contradictions," p. 1

天安门屠杀：1989 年的 6 月²⁸

大回溯 天安门屠杀： 1989 年的 6 月

不可能描述尽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我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可以当作分水岭的那两天——6 月 3 号和 4 号，前者是实际胜利的最后一天，而后者呢，就在当天一部分军队制造了惨案。3 号我幸运地全天呆在广场上，那儿不再聚集着学生。当时只有离散了的小群学生们还滞留在广场中，其中大多数来自外地。大量的首都学生已经离开了，但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社区和工厂去组织动员，依旧活跃的他们还试图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学生们在最开始——具体日期我不能确定了——就建立了一个广播站，其实实际就是一个喇叭——在广场的一角，3 日清晨那儿有个记者用喇叭在叙述前夜的事件，其中很多比较怪异。起初，一队身着短裤和 T 恤的兵士从长安街跑来，佯装成平民，试图进入广场。自然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他们并没离开长安街太远就被挡住并往回赶。西边一辆小货车紧急刹车，但还是撞开了一道栅栏，并撞伤了四个骑车的人，其中一名当场死亡。趁人们阻拦货车之机，与之伴随的三辆汽车溜走了。人们在车里发现了身着便衣的士兵，他们带有武器和用于捆绑脖子的钢索。可以说，这是一次秘密军事行动，只不过由于司机的刹车和事故意外地暴露了。这在 3 号成为大新闻。

全城都密切注意着军队和公安的一举一动。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表明究竟有多少人受牵连了，但我确信戒严令宣布之后的整整两周里，到 6 月 3、4 号，无疑百万北京居民变得活跃了。但不知为何媒体上居然没有表露，我想，或许是因为记者们都去关注广场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在广场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灯，世界的视线正聚焦于天安门广场。

但是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城市的边沿，人们在外围的环城路一带阻止着军队的开进。每晚，整夜的，成千上万的人封锁住每一个十字路口。碰巧我是住在城区东北角的，靠近三环路，那儿不是一个主要的入口。但夜晚仍有人聚集在那里，有一两千吧。他们到公交车站徒手把车推倒十字路口，来封锁四方的交通。由于其间还会有些缺口，他们就让运煤的卡车、货车停在那里。还有一队骑摩托车的人在支持学生们，他们出没于夜里，300 个壮汉在绕城巡逻，显得狂热无比。我记得一晚当他们经过时，正好有一个缺口足以通过，人们都集中了观望着。那儿本有一辆被说服停在那的卡车突然决定开走，但没有人感到很不安，他们之后是拦住了开过来的下一辆车——一个农民开的一辆带有小拖车的两轮拖拉机，拖车里还有条渔船，里面是他的家小。人们说服他去填补那缺口，农民于是就和家人以及渔船一起在那过夜了。我不忍去想象如果军队来了的话对那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3 号学生们在广场上播放了前夜的所有新闻，还有一个年轻的教授站起来宣布了前夜在广场上创立的人民的大学的概况，那或许是世界上一个非常短命的大学。我认为，它虽然起步了，但存活不了多久。如果有人能在那呆上一整天并且听到广播里传来的一切的话，他应当会着魔的。但是不久有传闻散布说人民大会堂西边确有士兵。这是第一次报道士兵距广场如此近，我们便过去调查。毫无疑问，大会堂北台阶的西侧有一些凹陷处，就在那里有 200 名士兵。有人在那辱骂他们，也有人试图鼓动他们。但是士兵们有规定禁止和人们交谈，因此他们都不好意思地背坐在那，从而避开人们的指责。我们走的非常近去瞧他们，就在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8000 名军人从大会堂中冲了出来。看起来就像是一端由防暴武装力量形成的急流，虽然没有带什么明显的武器，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包——其中不是手榴弹就是催泪弹或者是武器。他们出动显然是要进入广场的。接着，他们化作三股形成八列，往北奔向街道。人们出现了，似乎从天而降，刹那间他们就塞满了街的北端。有年轻人还冲过去

²⁸ 本文作者韩丁（William Hinton）六四时身在北京，有许多亲身的见闻。六四之后，他同中共决裂了。

他这篇关于六四的报告，本来是 1989 年 7 月 13 日在美国纽约市大学的演讲词，后来略加修订，编入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年出版的《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书中，作为最后一章。网上文章的题目是《六四的真相和前因后果——一位在场者的报告》。

用身子去撞士兵，有些还反弹回来摔倒了。士兵们继续前进着，但人民也坚持朝南行进，到最后，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向前推但士兵们还是一步也前进不得。这 8000 人的队伍滞留着就像一架手风琴，军官命令他们朝左运动，于是便往左边移动，接下来又一道命令说：“不，不，不要那么远，回到中部来！”巨龙就这么在街上进进退退。我们认为这将相当无聊，就沿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小路向西去。就在我们到达下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有大群大群的人涌到街上来，还一边尖叫着：“催泪瓦斯！催泪瓦斯！”有武装警察已经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前施放了催泪瓦斯，我们认为那边不是最理想的离去之所。因为骑了自行车，我们便掉头往回走并发现了一条通往南边的小巷子，顺路一直到了肯德基。

回想一下试图从 8000 人那儿脱身以及差点尝到催泪瓦斯，而现在是空调间、三层小楼、身着短裙戴着小帽的女孩和冰可乐，真是黯然销魂。虽然饥渴未消但我们还是爬上二楼去看看广场上到底将要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广播哑了

最后我们还是离开那里回到了广场。那时候政府已经指明了一个逮捕天安门前演说者的办法，并开始谴责学生们竖立反映民主政治的雕塑。许多人认为那是自由女神的一个翻版，当然，它是从自由女神那获得了某些启发，但不过那确是一件相当中国化的雕塑。那个“女孩”有点象抗日战争时的女英雄刘胡兰，她头上没有桂冠，双手擎着一把火炬。不象美国新闻所宣传的那样，简单地说它是自由女神的翻版。她传达出了学生们在民主进程中的许多想法，广播最初指责她为外国干涉和嘲讽中国文化的表现。我们看到，许多学生一个挨一个爬上杆子去剪断广播的线，它们想必是有 220V，因为学生们在用老虎钳剪时受到了强烈的电击，他们还要了衣服和手套保护自己的手。无数的人堵住了广场和长安街的接口，看着学生剪掉一根根线，那儿共有 10 个广播。当老虎钳停下来后，你可以再次听到学生们自己的宣传。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

之后我们回去看看军队那边的情况，他们依旧滞留于大会堂。我们把车停在紫禁城的墙脚下，墙面上飞舞着粉笔书写的颇具煽动性的口号。有一幅模拟邓小平和李鹏谈话的，大意如此：“邓叔叔，咱们现在怎么办？”邓回答：“嗯，我还没想好。我们还需观望，但我以为对我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牺牲你来保全我！”不远处另有一幅粉笔写着类似预言性的标语“最好听邓的——他有枪！”我们走回去，发现大多数军人坐在街上，精疲力竭，医科院校的学生们在试图让他们感觉轻松些。他们为他们的水壶灌水，给食品，以此来结交这些人。人们还唱着革命歌曲，每当他们唱完一首，就喊道：“解放军，来一个！”后来，当太阳渐渐落山时，一个兵站起来想组织一次回应，恰好那时军官们指示队伍回到大会堂去。他们是否是正在阻止游说还是命令才下达，我们就不清楚了。士兵们是单列回大会堂的，等到他们全部跑回去，半个多小时已过了。每一个人都在那欢呼着，感到人民是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附近有一个学生——我们和士兵们刚才跑过的地方仅隔 2 英尺——他正在警醒着人群，说：“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有 8000 人，还有 300000 多不在这里，他们随时可以占领广场，所以最坏的还没到来。”我认为他有些悲观，但实际上他的话被准确地证实了。

夜里开火

最后我们是在九点多离开广场的，因为迷上了冰淇淋，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就在建国宾馆停下来吃点冰淇淋。我认为那儿有一个门卫对我停车的地方不满，他放了我车胎的气，大概十点时我们只能推着没气的车回家。凶兆似乎显示出了——一大群人在前面的天桥下围住了一辆军用卡车。我们不顾车胎没气，还是骑着回家，那时已 10:30 了，然后精疲力竭地睡去。那个时候西城一带已经开火了。第一起人员伤亡肇始于 27 军的部队在长安街西端的军事博物馆前向人们开火。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事件正在发生，却依旧睡得安稳。在两点左右，我们被东城猛烈的交火惊醒了，不仅有枪声，还有炮声，象是坦克的炮。装甲车也有火炮，但那都称不上炮兵武器。我们听着声音就感觉军队从东西两面过来了。如果我看到的“夜间新闻”(Nightline) 节目是电视典型报道的话——它是说装甲车到了广场就被人们攻击，这就给人一种错误的关于事情进展的印象。那看起来人民好像是在主动进攻而军队只不过是被迫防卫。而实际上，当这些车辆到达广场，它们就已经扫清了路障并杀了差不多 2000 人。

到广场只是攻击的尾声，而不是开端。当军队开始去朝人们射击时，他们会变得非常残暴，会疯狂并采取一切能办到的手段进行反击。中国的电视节目采取同样的方式，把尾声当作开端播出。他们先播出周日下午人们焚烧坦克和武器运送车辆的画面，士兵们说：“在周六下午，人们就是如此对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军人的，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还击。”事实上，他们颠倒了日期，做出他们是受害者的样子，这完全是谎言。军队过来杀人，尸体遍街可见，而且当他们控制了广场后还接着在杀。

士兵们确实没有杀光广场上的所有学生。的确，那不是真正意义的灭绝行动。大概还有 4500 位学生幸存下来，他们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士兵们谈判，求得脱身，这被同意了，但其中大多数没有走。有人在离开时被后面追来的坦克碾死，我想大概有 11 个死了，坦克从后面冲来，从他们身上开过去。但有可靠消息说还有 100 多人拒绝离开，依旧留着广场上反抗着。我有朋友整晚都在北京饭店，他们说大约凌晨 4 点广场上激烈交火过，当时所有灯都打开了。有相当多不同版本的说法，真是难以确定真相。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媒体都是跟大部分学生离开的，当剩下的小拨公然向军队挑战并被杀时没有记者在旁边。

但是，不管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主要的屠杀是发生在长安街的东西两边。周日早上，我们跑去看住在北边昌平县的我姐与姐夫。因为我的姐夫刚动过大手术，所以我们雇了辆小巴士前往。司机整夜都在长安街的东头漫游，他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他说军队在前面开火，后面还有救护车在捡尸体，带走藏匿起来。他认为至少有 100 人在那被杀了，至于其它地方他没有谈及。当然，所有的这些数据都只是估计的，大概会有些夸大，因为你所面对的是那么可怕的屠杀，你会极度恐惧，自然很容易把数字想得很大。不管怎么说，他是相当的气愤和不安，在往北走的过程中，每当看到正在燃烧着的军车他会表现出很开心。

我们去乡下，在那呆了一段时间，5 点左右才回城。到德胜门时看到了一队车辆在燃烧着，有 18 辆卡车和一些用于指挥的汽车，火焰烧到空中 40 到 50 英尺多高，油箱爆炸、轮胎融化——那是很壮观的场面。很显然，士兵们因机械行进受阻就步行进城了，于是人们就焚烧那些车。后来，又一队车停在了那里。到周一下午，德胜门外已有 33 辆被烧毁的车。

午后的死亡

下午 5 点我回城，顺便去了趟北京饭店，那儿我一个好朋友在高层有间房，我去那看看广场还在发生着什么。广场完全无须忧虑，有两排士兵把守着长安街，他们后面有一队坦克，再之后就是一大片的装甲车。还有坚持从东边过来的人群，最大胆地去向军队靠近，朝士兵们叫喊着，大多数试图劝说他们停止屠杀。一旦那聚集了 200 到 250 个人，士兵们便会开枪把他们解决掉。我只看到了最后的这一幕，但我的朋友整体都呆在那，他还做了记录，说共发生了 6 次。就在此刻之前，每隔一小时他们就要放倒一批人，他们还统计出少了 50 个应该被杀死了的人，但没有提及伤者。由于军队不让救护车进入，人们只能通过三轮车带走尸体——其中有些人有平板车。即使正在交火他们也会冲进去带回伤员，这我是看到了的，那次长达 5 分钟的交火绝对激烈。有人是如何幸存的，我真不明白。受害者唯一有的警告就是士兵们在开火前会向前跑几步，然后才瞄准、射击。因此当他们向前跑时，人们可以匍匐在地上。但是，每次人们不是死就是伤，或者在往回跑时被射中。那真是最可憎的画面。其实这些杀伤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整个长安街都已经被控制下来了。军队都已经清理了广场，没有理由说那 200 人其中大部分只是来叫喊叫喊罢了，这样就能吓住那些士兵！人们最后的回应就是放火烧了最后的一辆巴士，现在在北京饭店，火还没有灭。火焰和烟尘翻腾着，吹过士兵的脸，遮住了被杀的人，所以那时很难说有多少死亡了多少受伤。

我是在当晚 10：30 左右离开饭店的，沿王府井往回走去王府井饭店去找出租车或通过其它方式回家。一个年轻人双手缠满绷带从协和医院（PUMCH）出来，他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回家。他就住在我家附近，还告诉我他是被射伤的，当时我正在观望着，他的自行车已经完全毁掉了。我们找到了一辆三轮车，于是我就送他回家。在路上，我们自然有时间长谈，我问他为何偏往地球的那个地方去，难道不知道他们还在射杀吗？他回答说自已必须去并且应告诉他们不要再开枪了，告诉他们我们是人民，而你们是人民军队，那么你们不应当杀害人民。他说自己以为他们只会朝天上开枪，而实际确实向前的。他摔倒在地地方上，不巧一颗子弹打到路面，炸裂并伤到了他的手。他仅仅受了这点伤，因此他是很幸运的。

后来，当我们去附近一家医院检查时，我们发现那子弹原来是爆炸性的，它们往往只留下小小的伤口，但对目标内部却造成极大伤害。它们就象掏空弹（hollow bullets，伤者创口小，但对体内组织破坏严重）或者螺旋弹或那种致使严重伤害引发内部大出血的达姆弹（dumdum bullets 一种击中目标就马上扩散的杀伤力很强的子弹头）。很多原本不严重伤者变得相当严重了。人们不敢呆在医院里，他们认为军队会来逮捕他们，因此仅仅得到初步护理就回家，所以很多人死在了家里。截至那发生后第一个星期的周三，协和医院差不多就有 100 具无主尸体，复兴医院有 67 具，附近的其它医院也有差不多数量尸体。所以仅仅医院太平间里的无主尸体就突破了政府所宣布的被杀数字，而且，这些数字仅指那些来医院治疗之后死在医院的人。还有很多是死在街上，或是去了医院后死在家里。所以死的人应高达 2000，同时，还有上千上千的人受伤。这是对人民的重大攻击。

给人民一次教训

我觉得攻击的目的和学生们关系并不大，很显然如果政府等到另外一周或其它时候，广场上可能就基本没有学生了。学生们尽最大可能去宣扬观点和组织动员，他们迎来全国各地的同志，但是更多的人每天都在离开，因而数量一天一天减少。如果当局等到另一周，可能广场上会是一片寂静。而如果广场上没有动静，那人们将不会在夜里被动员去阻挡军队靠近广场。那将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军事伤亡。但我想邓可能因人民动员起来、因那运动中的百万之众而感到极度不安。他被吓着了，于是就开始惩罚他们。你应该知道，邓是一个喜欢教育人民的人。他出兵越南也是去教育越南人民的，当然，越南也教育了中国军队。本没有必要去动用武装力量，但是他要向中国人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让他们知道谁是头儿，这样他动用了军队。

你或许要问他为何不行动更快点，为什么他不再宣布戒严令是动手？事实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是 5 月 20 号或 21 号，北京附近可以动用的军队——38 军拒绝开枪，拒绝向人民动手。当士兵们试图进入市区时，他们为路障和人群所阻，如果不杀人以夺路进城，他们只能驻在那，要不就撤回。邓撤了 38 军的司令并军法处置了他们，但他还是不得不到全国各地找其他将开枪的部队，这花费了两周时间，然后他又调他们进来。这支将开枪的部队据说是 27 军，它是军委主席杨尚昆过去的嫡系部队。如今由他的侄子掌握，这个军是由四川的武装组建起来的。在北京的人都说他们来自沈阳，外地的说是来自石家庄或者内蒙古，但北京的都认为他们来自沈阳——一个东北的城市。勿庸置疑他们是川军——杨尚昆是四川人，邓小平是四川人，李鹏也是四川人。在中国，很平常，人们称四川人为四川蛮子（Sichuan rats），因此现在有三个蛮子支配着中国大局。但实际上这支军队是自愿开枪的，他们好像确实参与过 10 年前的越南战争，还在那杀过平民。人们说他们平均比 38 军、40 军以及其它集团军的兵年长 10 岁，不论什么缘由，他们也不会不思考就去开枪，但他们在行军前与新闻隔绝，他们被告知说人们在杀战士、在虐待他们，因此他们被唆使去保卫自己、去保卫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来开杀戒的。邓会命令军队开枪我不奇怪，但我惊讶的是他能在那种情况下找到自愿开枪的军队。所以说延宕只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军队。

在屠杀后的一些天里，政府投入巨大精力去追捕并惩罚有关的学生领袖和引导人们攻击军队的头目。他们随意抓人指控说他们烧过卡车，再如象在上海，还指控说他们烧了一列火车。在审问之后就判处死刑，然后再给三天时间申诉，再就是行刑。他们还通缉 21 个学生领袖，逮捕了其 6、7 个。至于剩下的，你可以想象，逃走了。国家领导人花费特别精力向人们和激进分子报复，很自然，他们判处整个事件为一起“反革命暴乱。”

对强权说真理

这个时候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英雄之一是杨宪益。他因为编著过熊猫系列的汉英译著（the Panda serie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红楼梦》以及其它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而为西方许多人所知。宪益和戴乃迭（杨妻，英国人）从事该项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在周日晚上，也就是 7 月 4 号，BBC 电视采访了他，他斥责整个事件为法西斯暴行，认为它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残暴的。他的立场非常坚定，还说自己可能立刻就会被捕，第二天他的家人劝他出去躲一躲。他就躲了一些天，后来觉得不值得这么做，于是又出来了。就在我回国前的几天里，我曾去看他，还交谈了很久。他同意我

的看法，说“你知道的，我是共产党员。”十年前改革开始时，他们动员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他似乎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加入共产党的。他说：“我不会去申请退党，我认为他们弄脏了党的名字，他们已把军队拉进泥潭，我要站出来斗争。”当然，他是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的，不过他依旧坚持着强硬立场。

当我打算离开时，我的自行车还在外面街上。他把我送到自行车旁，在市场门口当着许多熟人的面，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后目送我上路。我想，他大概已 74 岁了——一个老人，而我，只有 70，我感觉他已做好了任何事情发生的准备，他认为这是应该公开表露立场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考虑什么将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就我所知，很奇怪，他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当然那也能政府的一点明智之举，但他们同时还在干着那么多无理的事，因此他们是否会在这件事上做得更聪明点还不太明朗。如果有某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闻名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国，并且毕业于牛津大学，那么，他便是杨宪益。

他的立场影响了我，在很大程度上，我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我要尽可能有力尽可能大范围地宣布真相，我要公开声明我不会再为中国政府做任何其它工作，直到它推翻对学生运动所做的裁决。不到他们准备认定那不是反革命暴乱而是爱国运动，我将不会再做任何更多的关于农业建设的事情。我在那儿的工作是帮助设立一个方案，我努力说服政府执行，已经说了 10 年。大致是在中国不同农业区建立能够使用最好机械的典型农庄，10 年的努力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付诸实践。它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金支持，10 月就要开始的。它将持续 3 年并附加 2 年，是一个总共 5 年的项目。我将不再多做任何事情除非什么时候定论被推翻。

被糟蹋的统治权

你也许要问在这种情形下我对于未来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政府很不稳定，邓小平实际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邓和他的同事已经使军队严重分裂，已经使党严重分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不是靠腿站立，而是被枪和恐怖行动统治着。唯一支撑着政府的就是邓小平，他有远大的政治计划，怂恿一个司令去和另一个争斗，挑拨一个领袖去和另一个对抗，还号召那些八十多岁的人靠后站。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强硬路线者，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我想如果你审视一下他所提拔笼络的那些人的名单，你将发现几乎个个都是毛泽东点过名的走资派。恰好相反，他们不是一伙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尽管他们也许不如赵和胡耀邦那般粉碎社会主义，但也是完全不同意这条路的。

这个统治集团的人有许多分歧，从私有化的速度和比例到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如何并存等等。他们肯定不是要去建设社会主义——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具有强烈买办倾向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度。致使中国卷入这次运动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对腐败的厌恶。中国腐败的程度已经差不多达到 1949 年前导致国民党灭亡的那般地步了。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定价、配额和强烈的干预。在重要部门的官员，通过权力，可以以极低价格在国有商店里买到日用品，转身又在自由市场高价卖出。依靠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牟取巨额的中国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的财富，并通过瑞士银行帐户或者房地产交易等方式洗钱。我认为这是真的，而且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是高干的子女们。虽然李鹏的儿子们没有参与，但赵的儿子们都是在从事的，邓小平的儿子们也在干。杨尚昆的全家都与之相关，而且，他们还牵扯到整个军队。

政府官员们控制大量工业并把它们联合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和外部的资本家做买办交易。有一个说法讽刺整个北京的局势——新的大酒店都是风险投资。北京饭店，是中国全资所有的，但事实上已经被抛弃了。屠杀之后在那你不能找到任何食物，连大厅的灯都不亮。前门上方的玻璃上还有个弹孔，新闻单位订了高层的那些可以瞭望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房间，但一旦军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旦他们停止射击，那时候在那拥有一间房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常有传闻说军队将要扫除每一个人，因此北京饭店事实上已经关闭，大家都转移到王府井饭店了。那儿另有一番景象，它非常新，是全市最豪华的酒店。在大厅里有一个两层的人造瀑布，水流持续流到下方的基座里，地下还有一个大超市。很奇怪的是，它为军队和一伙马尼拉资本家所有——这就是买办产业。美丽的服务员看起来象中国人但都不说中文，她们说塔加路语和英语但没有中文，回头以毫无表情地看着我。对了，昆仑饭店也是一家新兴的——它是用德克萨斯现代样式的不锈钢和其它材料建造的。它是安全部门和外国资本家合伙的。

当然，你们中很多人都知道自从中国着手改革，也就是从解散农业合作社开始，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评论家。对我来说很奇怪的是速度，改革带给中国的危机竟是今天的一切。危机是改革政策的直接

结果，是农业私有化和工业试图私有化的恶果，是自由市场和把重要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的产物，尤其是沿海地区，导致它们自由地、飞快挣钱，还通过经济优势和内陆地区竞争稀缺商品尤其是原材料。条件的改变几乎把国家经济带入混乱状态。政府不能保障供应，因为能源严重不足工厂都只能开工2到3天，而不是过去的6天，价格被严格卡死，腐败成风，旧社会的种种陋习死灰复燃。

这里出现了公开卖淫，这里出现了乞讨，这里有大量的失业者——去年冬天有5千万人离开乡村，但也没有在城里找到工作。为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停止了1万个工程，这又致使4或者5百万失业。有这么多的重大矛盾是改革直接造成的——计划生育基本失败，出生率比中国承认的要高，教育出现危机。不仅是农村地区，连城里也因经费太少而不能完全发放教师工资。他们说你没钱当然就得再找活去挣啦，于是就有了教师在教室里制冰淇淋和汽水这样的怪事，他们这么从事第二职业第三职业，当然会忽视教学。整个社会基本保障和保障标准瘫痪，每个人都很愤怒。

农民们已经深刻理解了邓——在他们印象中，每次一旦问题出现，邓就会做出果断决策，好像是要去解决它，然而，最终结果总不尽人意。然后他又做出决定，却比前面的更加糟糕，就如此进行一系列国事决策。因而农民们说：“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而且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都在上演。我认为对北京人民的屠杀是邓的严重错误之一，他要努力去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了更多更坏的问题中。

西方媒体正把此事报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喘息和革命开展的结果，但根本不是这样的，这是10年前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我没有时间回头去找那些毛主席判定邓、刘少奇以及其他人是走资派铁证如山的论述，在许多私人场合他说如果这些人将来重握大权，我们党的颜色就会改变，我们最终会因法西斯政权而灭亡，中国人民又将重新革命来改变它。对我而言最难理解的就是这句话如此神速得到了验证。10年前，邓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了出来，通过引入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自由市场和解放性的改革把中国再次推上正路。然而现在，10年过去了，这里纯粹只有军事专政，每个人都被迫去同意爆发的是反革命暴乱、军队所做的合情合理、运动的组织者应该受到惩罚和制裁。

就在我回国前夕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身为党员的老朋友跑来对我说：“昨晚我们开了党员会议，我们都得表态，我们都要说军队不过是在镇压反革命暴乱罢了。我当然得说这些话了，而我实际是在撒谎，我经常这样，我都为这么多次的撒谎内疚，但我只能在这儿生活，还要养活家人。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得不撒谎啊，但是我只希望你能回国并且能够将这里发生的一切真实的告诉别人。”

广大的进步联盟

事实是这样的，学生们根本不是在举行起义，他们并不是要推翻政府。而只是要求邓辞职，因为他已经84岁、老年昏昏，他的政策妨害中国发展。至于要求李鹏下台，主要原因是他宣布了戒严令。戒严令发布之前，他们只是在要求着谈判、舆论自由、更多政治权利以及公布高级干部的财产。这不能等同于要颠覆政府，也谈不上是要求几个领导人辞职的起义。类似的事其实经常在其他国家发生，最近在日本就有两次。但是邓认为它是公开冒犯，是骚乱，是暴动，他必须惩罚他们。

许多持“左”态度的中国人为学生们的政见担忧：他们不会是右派吧？他们不会是在传达资产阶级的呼声吧？他们不会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吧？其实，学生们的政见有许多种，他们中很多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他们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市场，并对两者抱有严重的幻想。但他们并不是中国政治中的右翼势力，右翼是由邓和他的党羽组成的。学生们是进步者联盟——中间人士、中间偏左人士甚至中间偏右人士联盟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反对真正的反动分子。况且，运动本来是必然会向左发展，事实也正如此。学生们如果单独依靠自身力量，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要改造的话他们必须溶入人民中，一旦他们溶入其中，他们就须面对农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实质。他们必须捍卫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反对价格剪刀差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和工人站到一起，支持拒绝向管理者上交权力，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因为工人工作的权利是从革命中获得的。

美国有些人号召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并发起一次新的革命。据我估计，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和军人愿意为共产主义奉献，那么改变的可能性将缘自人民自发的联合——或许是通过一些能团结军队、党和社会各种革命力量的激进官员来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

总而言之，我认为从学生到他们的支持者都有些天真烂漫，但我也觉得，在6月3号和4号他们

已经抛弃了部分天真。